

2017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调研报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目录

1	摘要：核心发现	3
1.1	退休愿景与预期：新生活方式凸显，对未来信心回升	3
1.2	退休准备：2017 退休准备指数回升	3
1.3	退休规划：个人和企业的责任意识 and 努力均需加强	4
1.4	专题研究：居民需要具有资产保值、疾病保障与护理功能的养老金融产品	5
2	项目背景及概况	6
2.1	项目背景	6
2.2	项目概况	8
2.2.1	项目的提出	8
2.2.2	调查对象、内容及目标	8
2.2.3	问卷的设计	9
2.2.4	施测过程	10
3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	12
3.1	退休生活愿景	12
3.1.1	退休生活的联想：总体乐观，财健并重，半退休者发挥余热	12
3.1.2	退休愿景：旅游+陪伴+爱好，健康情况影响“体力活”	14
3.1.3	对退休年龄和退休后寿命的预期较为乐观	16
3.2	退休生活信心	18
3.2.1	退休生活信心总体较足	18
3.2.2	经济向好，居民对退休生活的信心正在回升	18
3.2.3	退休前与退休后相比信心过高，风险事件难预期	20
3.3	退休生活预期	20
3.3.1	经济状态回稳促使居民对经济发展和自身收入的预期回升	20
3.3.2	对退休生活收入与状态的预期较乐观	22
3.3.3	收入和健康状况成为重要影响因素	23
3.3.4	对今后几代人的生活保持乐观	24
4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	26
4.1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26
4.1.1	2017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有所回升	26
4.1.2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排名上升	29
4.1.3	个别省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有较大变动	30
4.2	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因素	30
4.2.1	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居民退休准备越完善	30
4.2.2	机关和事业单位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较高	31
4.2.3	年龄、性别、收入是影响退休准备的重要因素	32
4.2.4	婚姻状况、子女等家庭因素共同影响退休准备	34
5	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	37
5.1	退休收入来源	37
5.2	个人责任：着眼长远，提前准备	38

5.3	政府责任：主动引导，回应期待.....	39
5.4	企业责任：提供资源，多样发展.....	41
6	专题研究	44
6.1	养老金融产品	44
6.1.1	疾病保障、年金回报、长期护理产品受欢迎.....	44
6.1.2	个人养老产品中医疗保险服务增值服务最受期待	46
6.2	健康评价	47
6.2.1	健康水平的评价与关注程度.....	47
6.2.2	对健康状况的关心程度.....	48
6.2.3	工作和生活中的健康活动.....	50
6.2.4	对生活方式直接影响未来健康的认可度.....	52
6.3	长期护理保险	53
6.3.1	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	53
6.3.2	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意愿.....	56
6.3.3	阻碍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因素.....	58
6.4	金融素养	62
6.4.1	较高的金融素养有利于提高居民的退休准备	62
6.4.2	大力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素养.....	62
6.5	智慧养老	63
6.5.1	智慧养老的概念.....	63
6.5.2	发展智慧养老的建议.....	63
6.6	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	64
6.6.1	税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64
6.6.2	税延型养老保险对提升居民退休准备的作用	64
7	建议	65
7.1	居民自身应做出的努力.....	65
7.2	政府可做出的改善.....	65
7.3	雇主可做出的改善.....	66
7.4	金融机构在产品与服务方面可做出的改善.....	66
8	附录	68
8.1	统计分析方法说明.....	68

1 摘要：核心发现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来势猛，所以无论是从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来看，还是从老龄产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来看，我们都尚未做好妥善的应对之策。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体系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产业格局，居民、政府、企业以及金融机构都应当担负起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避免出现养老准备不足的风险。

为了对中国居民退休准备的现状进行系统、科学、全面的了解和分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与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从 2012 年起开始，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每年从全国抽取 2000 名受访者进行调查，至今已持续五年，发布了 5 期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年度调研报告。

2017 年度的调查报告从中国居民对退休生活的愿景和预期、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和相关专题研究等 4 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现状，并针对居民个人、政府、雇主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1.1 退休愿景与预期：新生活方式凸显，对未来信心回升

总体说来，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较为乐观。相比 2016 年来说，2017 年居民对退休愿景预期的新变化集中体现于新生活方式的凸显和对未来信心的回升：

- 对退休后继续工作、出国生活和创业等新型生活方式的追求，正在成为收入较高、身体状况较好的居民的新选择。居民的心态和对退休生活的愿景正在改变，“半退休”人群的广泛存在使更多的人正在将“机会”“兴奋”作为对退休生活联想的关键词，希望在退休后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发挥余热”。
- 新生活方式自身的门槛也在逐渐降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升级”的不断进行，“旅游”和“发展新爱好”等基本需求已逐渐从“奢侈品”转变为“必需品”，也使高层次人才将对“游山玩水”“琴棋书画”的向往转变为对更丰富、更具挑战性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 随着 2017 年初经济开始回稳，居民对国家、个人的未来都有了更强的信心，2017 年度，44% 居民认为未来 12 个月内中国经济会变好，显著高于 2016 年的 29%。同时，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自身经济状况变好的居民比例也在回升，2017 年的 46% 高于上年度的 35%。更多的居民对中国经济、个人财务以及未来退休生活持乐观态度，对今后几代人的生活也保持有良好预期。

1.2 退休准备：2017 退休准备指数回升

2017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6.31，较 2016 年有了一定回升，主要原因是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等均较去年有小幅上升，提升幅度最大的是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几乎与 2015 年时的水平相当，表明人们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较好，对宏观经济的预期较为乐观，这一变化与 2017 年中国经济形势向好发展的趋势不无关系。另外，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也让居民对经济发展前景恢复了信心。

2017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在被调查的 15 个国家中排名上升，位居第 6，仍位于全球前列。

就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因素而言，地域、经济发达程度、工作状态、就业单位、收入、储蓄习惯、婚姻状况、子女数量都会影响到退休准备情况，具体来说：

- 全国各地区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达地区情况更好一些，如广东、山东、江苏、上海、北京等地，居民退休准备指数高达 6.35，远高于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地。
- 居民的退休准备与就业单位性质相关，政府管理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非营利组织的群体会有更好的退休准备，均高达 6.6，受访者对取得未来的期望收入有更高的信心，并且在退休储蓄方面也更加充分。
- 高阅历、高收入男性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更为充分；而像年龄，收入和性别等因素，对构成退休准备指数的所有指标均会产生影响。
- 婚姻状况和子女等因素会共同影响退休准备，已婚人士优于单身人士，但同居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仅次于已婚群体，达到 6.13。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可能会淡化婚姻的契约关系，而更在意实质的伴侣关系。无子女的受访者退休准备最差，但子女数量和退休准备指数二者并不存在确切的正相关关系。以上的因素都与受访者的责任意识相关，责任意识更强的群体会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更负责任，准备得也会更加充分。

1.3 退休规划：个人和企业的责任意识和努力均需加强

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需要从财务收入来源、退休准备参与主体等多角度来综合衡量。总体来看，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居民退休收入各项来源所占比例较为均衡，政府 40%，企业 25%，个人 35%。其中，越接近退休的受访者对政府给予退休生活财务支持的期望越高。我们认为，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应当加强对退休规划关注：

- 对个人而言，个人、政府和企业是居民退休规划的参与主体，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尤为重要。居民个人的退休收入结构较为稳定，主要依赖于存款和社会养老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有待增强。
- 对政府而言，民众对政府在养老金税收优惠、社会养老金贡献比例等政策改革方面抱有较强的期待。
- 对企业而言，企业普遍为员工提供了各种养老保障福利，其覆盖面和多样性尚待加强。
- 居民退休收入的 60%来源于个人、家庭和企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4%），主要原因是中外养老保障体系的差异，中国居民更多依靠家庭养老。
- 70%以上的未退休工作者认为人寿保险是养老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增加产品供给的期待。
- 42%的受访者偏好一次性领取所有退休储蓄，远高于选择投资税收递延型养老工具的受访者（19%），表明递延养老金融工具亟待政策的支持，使 2017 年底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承担了人们的更多期待。

1.4 专题研究：居民需要具有资产保值、疾病保障与护理功能的养老金融产品

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水平以及财务规划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居民对于养老金融产品的认知与需求有了提高，具有资产保值、疾病保障与护理功能的养老金融产品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需要。

- 整体来看，中国居民对退休后的保险产品有很大兴趣，并更为青睐具有资产保值和疾病保障功能的保险产品。与 2016 年结果稍有不同，选择比例最高的产品是疾病保障型产品和年金回报型产品，二者的选择比例均达到三成。其次，约有 14% 的被调查者愿意选择长期护理保险。
- 中国居民更加看重养老金融产品中的增值服务，选择提供医疗服务和医院绿色通道等增值服务的养老金融产品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53% 和 25%。养老产品中的医疗保障服务受到关注。
- 随着中国居民预期寿命的提升，失能人口会不断增加，对长期照护的形式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接受程度有了稳定提升，约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称自己肯定会购买长期护理险。
- 年龄越大者越认为自己需要长期护理。在 20-69 岁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有点可能需要长期护理的比例最大，其中在 40 岁以后，认为自己有可能或已经接受长期护理的比例不断增加，超过七成的 60 岁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可能会接受长期护理服务。
- 难以负担的长期护理费用不再是制约长期护理产品发展的最大障碍，而认为子女太忙、家内护理空间缺乏、远离长期护理机构等现实问题逐渐成为接受长期护理的主要障碍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49%、23% 和 29%。这一方面反映出居民对商业化长期护理服务认可度和需求的提升与长期护理机构和人员缺乏难以提供服务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反映出居民依然偏好在家庭内接收长期护理或由家庭成员护理，养老观念以及对于长期护理的认知仍需要进一步改变。
- 高收入群体不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因素是认为自己能够依靠自身、家庭以及政府获得足够的退休保障，而低收入群体不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因素主要是认为缺乏必要性以及资金上的压力。

2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 项目背景

近年来中国老龄化程度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速放缓，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依然存在，老年人的退休养老问题对整个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大。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表现出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1) 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上升

近二十年来，中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攀升，老龄化问题加剧，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攀升。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16 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 138271 万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308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6.7%，比 2010 年“六普”时上升了 3.44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 0.57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50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0.8%，比 2010 年“六普”时上升了 1.93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 0.32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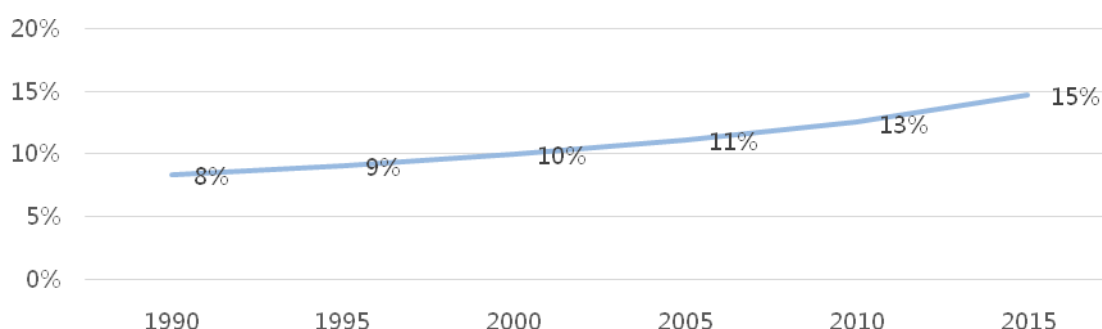


图 2.1 老年人口抚养比逐步攀升

注:老年人口抚养比=65 岁以上人口数/15-64 岁人口数

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人口年龄金字塔受到了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的“夹击”，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从“少年中国”到“银发中国”，我们仅用了 18 年(1981—1999 年)时间，而西方国家的“变老之路”一般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来势之猛、速度之快是十分惊人的。

2) 老龄化发展不平衡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人口分布不均。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次分布，中东部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此外，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现象严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大量青壮年流入城市，在减缓城市老龄化的同时，加剧了农村事实上的老龄化程度。从城乡角度看，2000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乡村比城市高 0.82 个百分点、比镇高 1.50 个百分点。到 2014 年，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乡村比城市高 2.60 个百分点、比镇高 2.63 个百分点，城乡差距明显扩大。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的现象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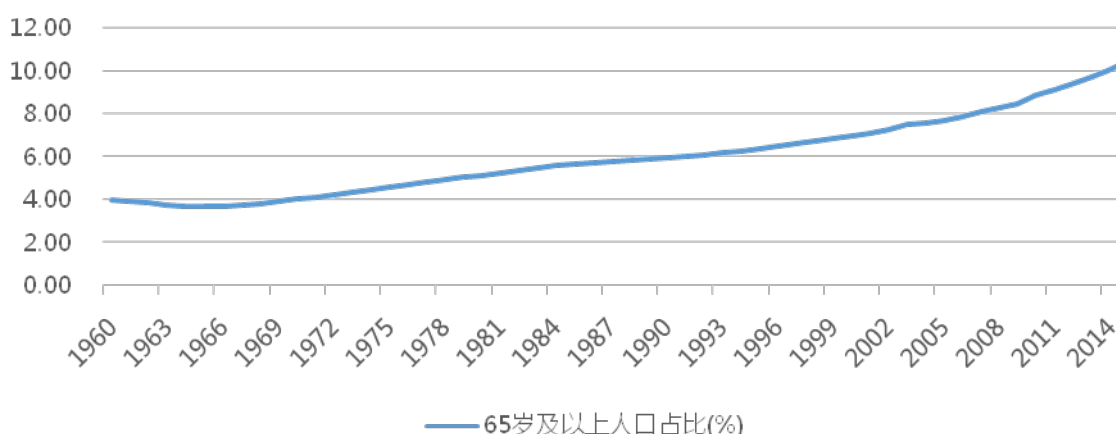


图 2.2 中国 2000 年就已经跨入老龄化门槛

3) 高风险老年家庭增加，养老需求激增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5 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为 4063 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18.3%。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至 2015 年，我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突破 1 亿人；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 10%，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占 41.9%。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披露，2012 年，全国失独家庭已达 100 万个，而且正以每年 7.6 万个家庭的数量持续增加；全国约有 2300 万老年人属于贫困和低收入者；农村留守老年人达 5000 万人。高风险老年家庭的迅速增加，必将放大社会风险，扩大养老保障需求。

4) 养老金入不敷出，基金运行压力逐年加大

综观世界其他人口老龄化国家，基本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典型的“未富先老”。2000 年我国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 GDP 仅为 856 美元，物质财富积累相当不足，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国家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应对老年人口的迅速扩增带来的诸多问题。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5 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报告》显示，2015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6554 亿元，比上年增加 3281 亿元，增长 14.1%；支出 23092 亿元，比上年增加 3295 亿元，增长 16.6%，支出的增幅高于收入的增幅。除此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有 3893 亿元来自财政补贴。若剔除财务补助，2014 年的收入仅为 22661 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经进入入不敷出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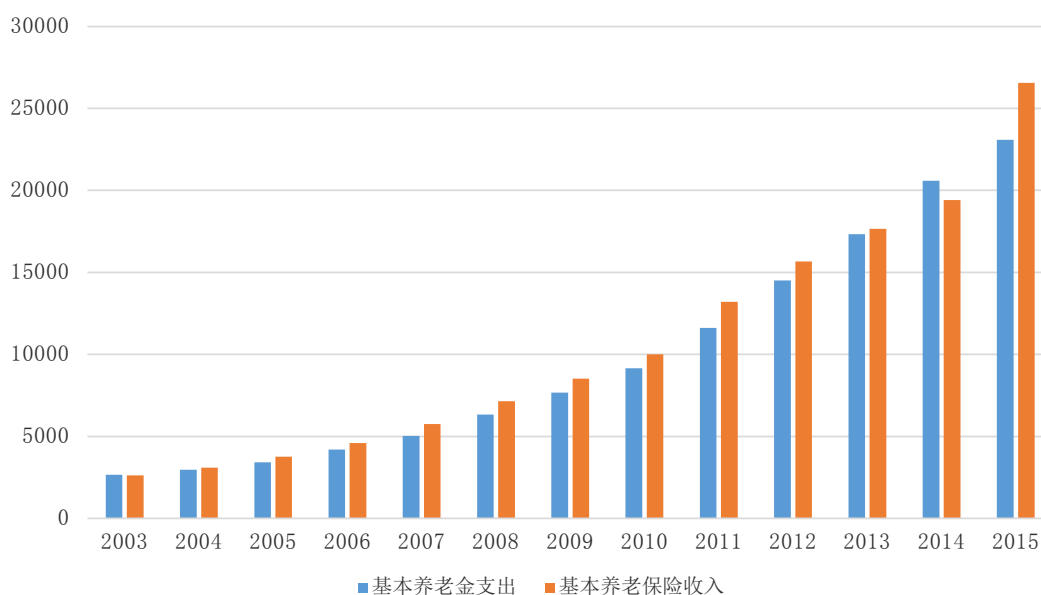


图 2.3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已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

注：基本养老金包含企业职工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情况

2.2 项目概况

2.2.1 项目的提出

为科学系统地了解人们对未来退休生活的准备状态，2012 年[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启动了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调查范围主要在欧洲、北美等地区。从 2013 年开始，中国作为亚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被纳入调研范围。调研通过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无锡等五座城市进行抽样，发放了问卷 1000 多份。2014 年，中国区的调研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了除西藏、香港和台湾以外的全部 31 个省、市、自治区，样本数量也增加到了 2000 个，由 1800 名在职人员和 200 名已退休人员构成。2016 年的调研范围集中在内地，不再对澳门展开调研，但覆盖了西藏自治区，囊括了中国内地 31 个省、市、自治区。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是荷兰全球人寿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成果的一部分。由[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根据著名调研公司 Cicero Consulting 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施的问卷调查回收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撰写而成。

2.2.2 调查对象、内容及目标

本次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科学系统地了解中国居民对退休准备的预期及其采取的行动，调查对象来自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2000 名居民，调查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受访者对退休准备的认知、预期、态度以及已经或即将采取的行动，受访者对雇主提供福利的认知，对延迟退休和长期护理等问题的看法等，具体分为以下几部分：

- (1) **受访者对经济发展、自身财务状况和退休生活的预期。**受访者对自身未来财务状况和国家未来经济状况的看法，对退休后的经济来源、退休生活年数、退休方式的预期。
- (2) **对待退休生活的态度。**受访者对待退休生活的态度，例如：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期待的，还是恐惧的。
- (3) **退休准备指数——综合反映居民在退休准备认识和退休准备行动方面的指数。**这个指数是在引入受访者对退休准备的认知能力、理解水平、计划完备度、退休收入变化、准备方式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相应的权重和相互关系，计算出来的。
- (4) **退休收入来源。**受访者的退休收入来源、理财方式。
- (5) **退休收入责任。**受访者对退休收入责任的认识，即退休责任应该如何在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的认知情况。
- (6) **雇主提供的福利及服务。**中国雇主为其职工提供的养老金福利和其他职业福利情况，以及职工对雇主提供的福利和服务的预期。
- (7) **退休理财计划。**退休储蓄与支出的情况、退休储蓄的信息与建议的来源、对退休理财产品的希望和建议。
- (8) **养老危机感与对外依赖性。**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对养老产生了危机感，对外部（来自政府、雇主、子女等方面）支持的依赖性有多强。
- (9) **中国居民是否已经开始了对退休生活的合理规划。**如果已经开始，又是从哪些方面着手的，购买了什么样的理财产品；如果还没有开始，他们又有哪些理财方面的预期和需求。
- (10) **影响对退休计划的认识与行动的因素。**哪些因素影响了受访者对退休准备的认知和所采取的行动。

本次调研的最终目的是：**针对中国居民在退休准备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与政策、企业了解员工的退休生活需求并据此制定和完善员工福利计划、个人制定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退休养老计划提供参考。**

2.2.3 问卷的设计

本次调研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在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设计的**全球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居民养老准备的现实情况，进行了适应本土化的修改，形成了既能体现中国居民退休准备专属特色、又能与全球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进行横向比较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共包括 9 个方面：

- (1) 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主要居住地、工作状态、年收入、婚姻状况、子女、学历、受雇单位类型、职位等；
- (2) 对未来经济和财务状况的预期，包括：对一年后中国经济和受访者自身的财务状况的预期；
- (3) 对退休生活的感性愿望和理性预期，包括：退休生活的设想、如何取得退休后的经济支持、（预期）退休年龄、（预期）退休后生活年限、对今后退休者情况的简单预期等；
- (4) 退休准备情况，包括：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应对自己在财务方面的退休计划负责、对其在退休计划的认知水平进行自我评估、退休计划的实际制定情况等；

- (5) 退休储蓄的动机，包括：受访者为退休进行储蓄的原因和措施、阻碍其为退休而储蓄的障碍、与金融危机的关联等；
- (6) 为退休生活所购买的金融理财产品，包括：产品的种类、选择的原因、相关信息来源、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可持续的时间等；
- (7) 政府和雇主责任，具体指在受访者看来，政府和雇主应该在帮助其步入退休生活这个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 (8) 受访者预期的退休储蓄的支出方式；
- (9) 对延迟退休、长期护理等问题的看法（中国区专有）。

2.2.4 施测过程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先由专业调研公司 Cicero Consulting 植入问卷调查系统，通过互联网呈现给受访者，由受访者在线独立填写。这次调查共分层抽取了 2000 个样本，样本分别来自中国 22 个省（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4 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5 个自治区（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共计 31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在职职工约占 90%（含全职、兼职、半退休，不包括学生、无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等），退休者约占 10%。在性别构成上，男性和女性受访者各一半。

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000 份，所获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 (1) 年龄分布较平均，年轻人较多，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受访者都超过了 100 人，平均年龄 42 岁，详见图 2.4；
- (2) 性别分布均衡，男女比例接近 1: 1，详见图 2.5；
- (3) 教育背景主要为大学本科，72%以上为大学本科，专科占 8%，高中及高中以下为 11%；详见图 2.6。
- (4) 家庭年收入均值为 23840.16 美元，中位数为 14804.78 美元，详见图 2.7；
- (5) 职位以工薪阶层为主体，“中级管理人员”和“初级管理人员”分别占 41%、40%，其次为“高级管理人员”（10%）和“熟练体力劳动者”（5%）等，详见图 2.8；
- (6) 样本取自 31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样本数量抽取最多的是北京、上海，最少的是青海、海南，详见图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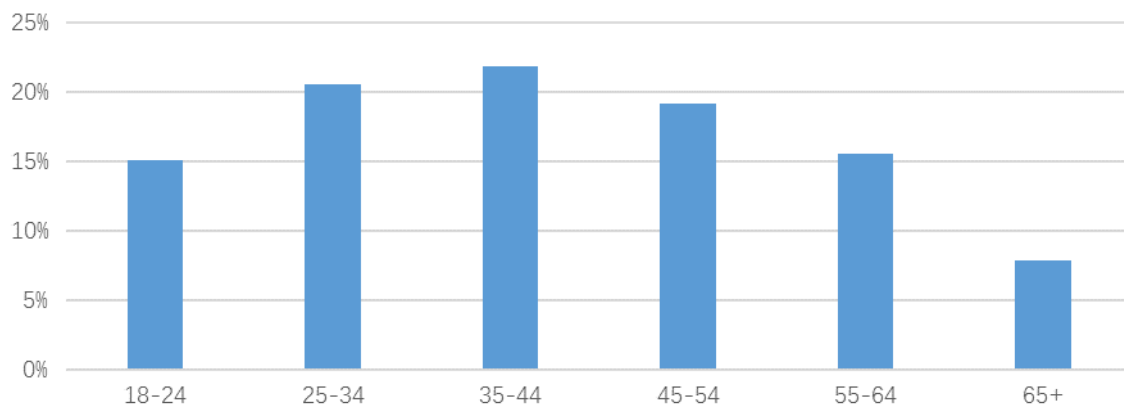


图 2.4 样本年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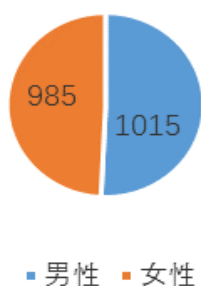


图 2.5 样本性别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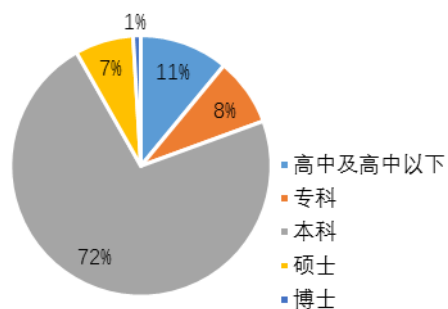


图 2.6 样本学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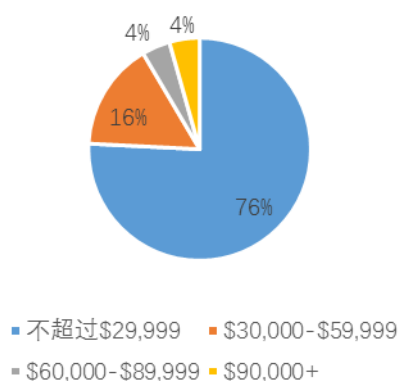


图 2.7 样本家庭年收入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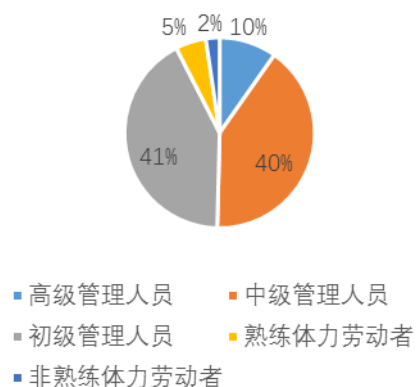


图 2.8 样本职位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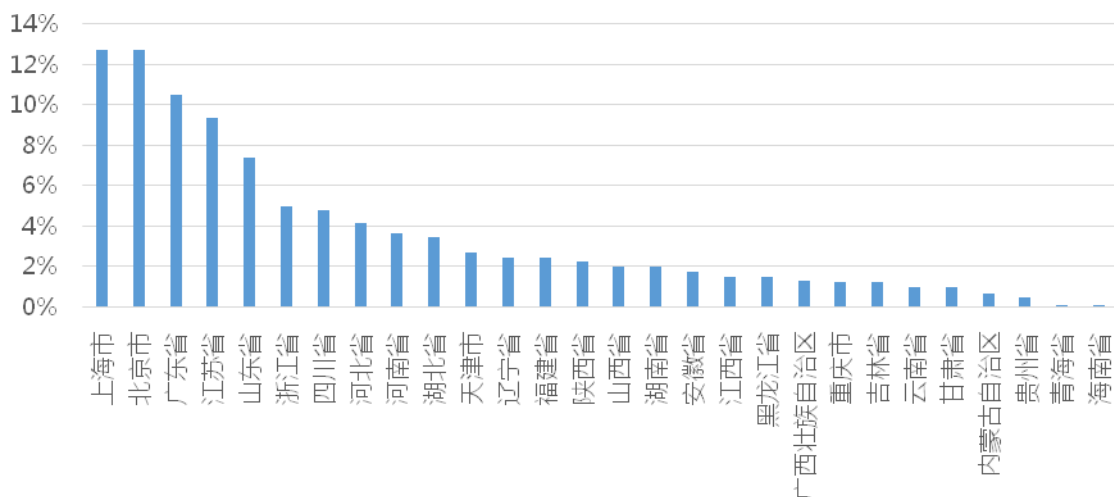


图 2.9 样本区域分布

3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

3.1 退休生活愿景

3.1.1 退休生活的联想：总体乐观，财健并重，半退休者发挥余热

为了解中国居民对退休后生活的预期，我们在文献分析和个案访谈的基础上，在问卷中列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居民退休生活密切相关的词汇，让受访者依据最容易联想到的程度，从中选出三个词汇。其中，积极性词汇包括“自由、机会、悠闲、享乐、兴奋”等，消极性词汇包括“贫困、无安全感、孤独、身体状况欠佳、依靠他人、疲倦、遥远、无聊”等。根据这些词汇被受访者选中的频率进行制图和词云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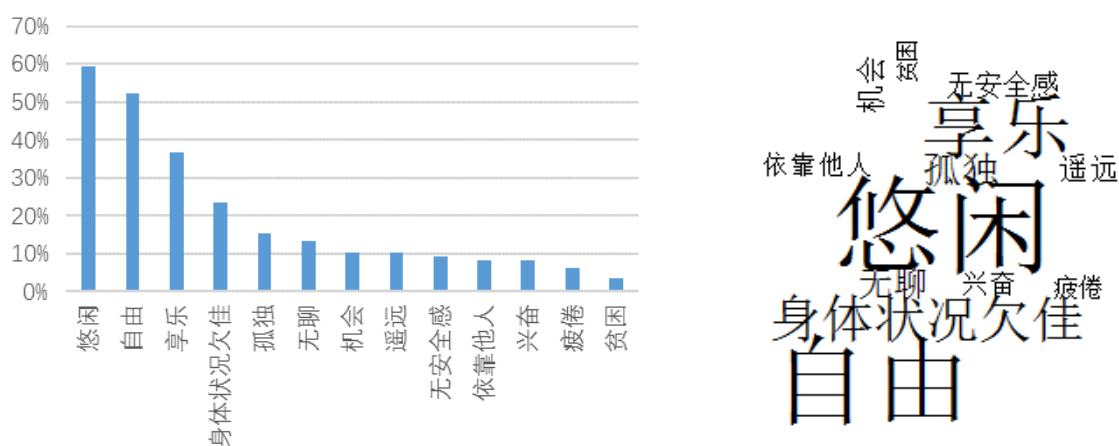


图 3.1 2017 年对退休生活的联想

从图 3.1 就居民对退休生活联想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积极性词汇出现频率较高，其中“**悠闲**”位居第一位，“**自由**”、“**享乐**”分列二、三位。相比而言，消极性词汇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频率最高的三个词依次为“**身体状况欠佳**”、“**孤独**”和“**无聊**”，表现了对**身体健康**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担忧。总体而言，和前两年调查结果相似，居民对退休生活的预期依然是非常积极乐观的。

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退休生活联想的差异，我们分析了退休生活关键词频率与健康状况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见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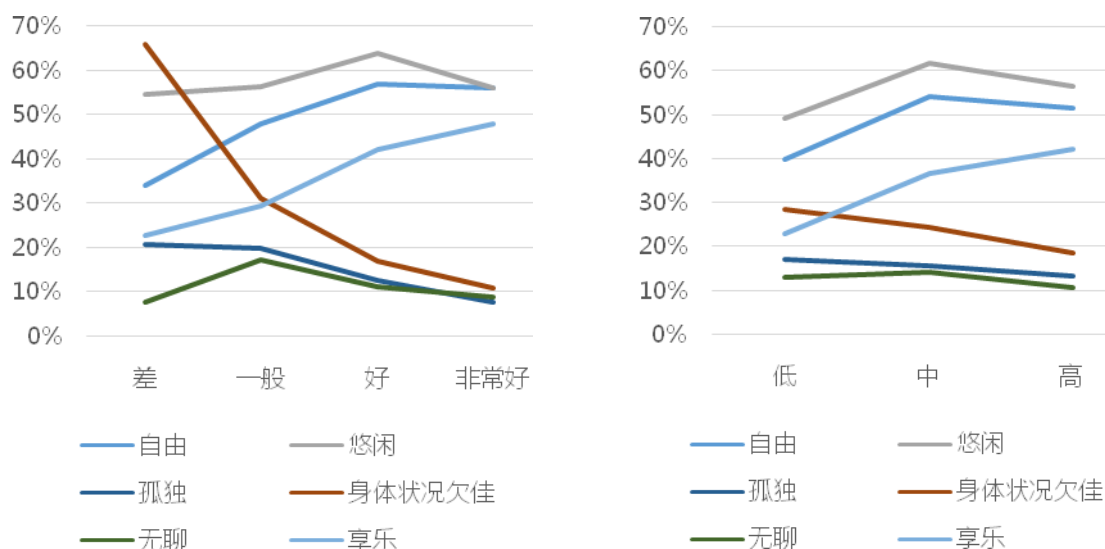


图 3.2 2017 年对退休生活联想与健康（左）、收入（右）之间的关系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悠闲”“自由”“享乐”等正面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与健康状况和收入均呈显著正相关；而负面关键词中，除“身体状况欠佳”一词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外，“孤独”、“无聊”出现的频率与健康、收入在总体上虽也呈负相关，但相关系数不如正面关键词那样显著。可见，在对退休生活的联想中，正面联想比负面联想更容易受到居民自身健康状况与收入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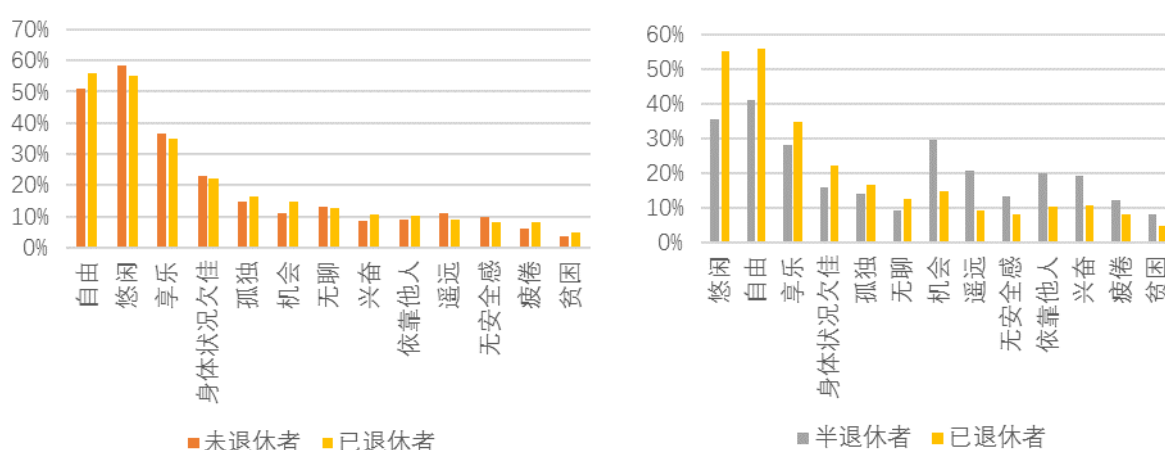


图 3.3 2017 年对退休生活联想的对比（左为未退休者和已退休者，右为半退休者和已退休者）

根据受访者目前的工作状态，我们将他们分为已退休者、半退休者和未退休者。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已退休者和未退休者在选择积极性词汇和消极性词汇时的频率在整体上基本一致，可以认

为两者之间差异不大，这表明未退休者对未来的退休生活有着相对准确的预期。但对半退休者进行分析时我们却发现，半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联想和未退休、已退休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半退休者而言，“自由”、“悠闲”、“享乐”出现的频率都比未退休和已退休的居民小，而值得注意的是“机会”、“兴奋”出现的频率却比未退休和已退休者高了很多。这表明，虽然半退休者中包含了很多在退休前几年“退居二线”的职工，但退休后再被继续“返聘”或者与其他形式“发挥余热”的居民正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本身希望退休后能多做一些事情，不愿意只过“悠闲、自由、享乐”的退休生活，而更希望抓住机会，在退休后获得新的成就。

3.1.2 退休愿景：旅游+陪伴+爱好，健康情况影响“体力活”

我们通过对居民退休生活愿景的调查，了解居民退休后最想做的事情，探究当前居民退休生活模式的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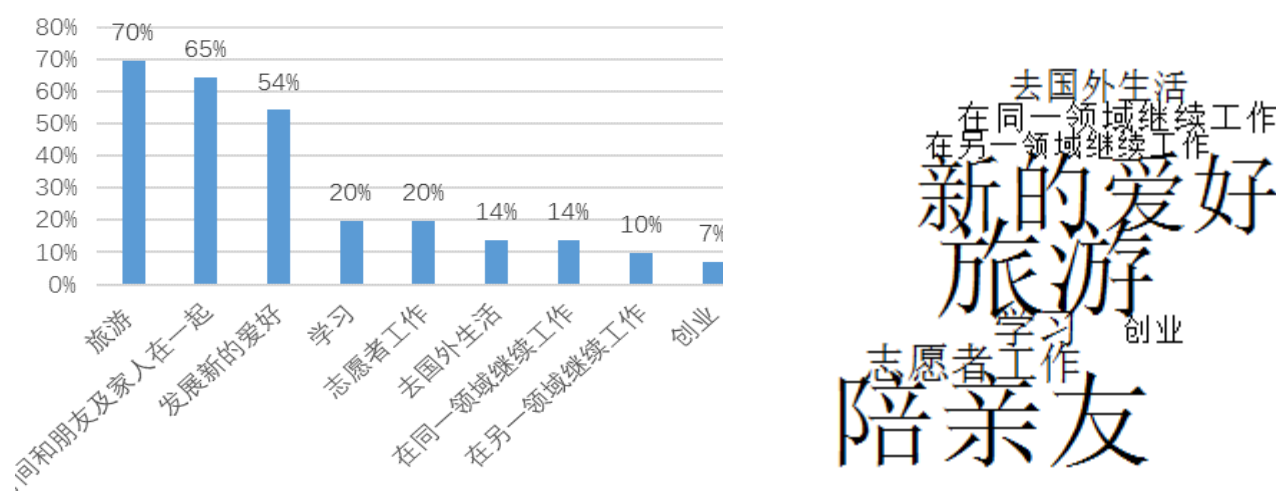


图 3.4 2017 年退休后最想做的事

图 3.4 总结了受访者关于退休后最重要愿景的表述。受访者最重要的退休生活愿景是“旅游”（70%）、“陪伴亲友”（65%）和“发展新的爱好”（54%），这与他们对退休生活联想的描述是一致的。同时还可以看到，受访者对学习、工作和创业等有助于未来发展或具有开拓意义的事物并不热衷，他们更偏好稳定、享受型的退休生活。

与前文相同，为了了解居民退休愿景与健康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关系，我们将不同健康程度、收入水平群体的生活愿景单独列出，选取了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关键词“旅游”、“陪伴亲友”和“发展新的爱好”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3.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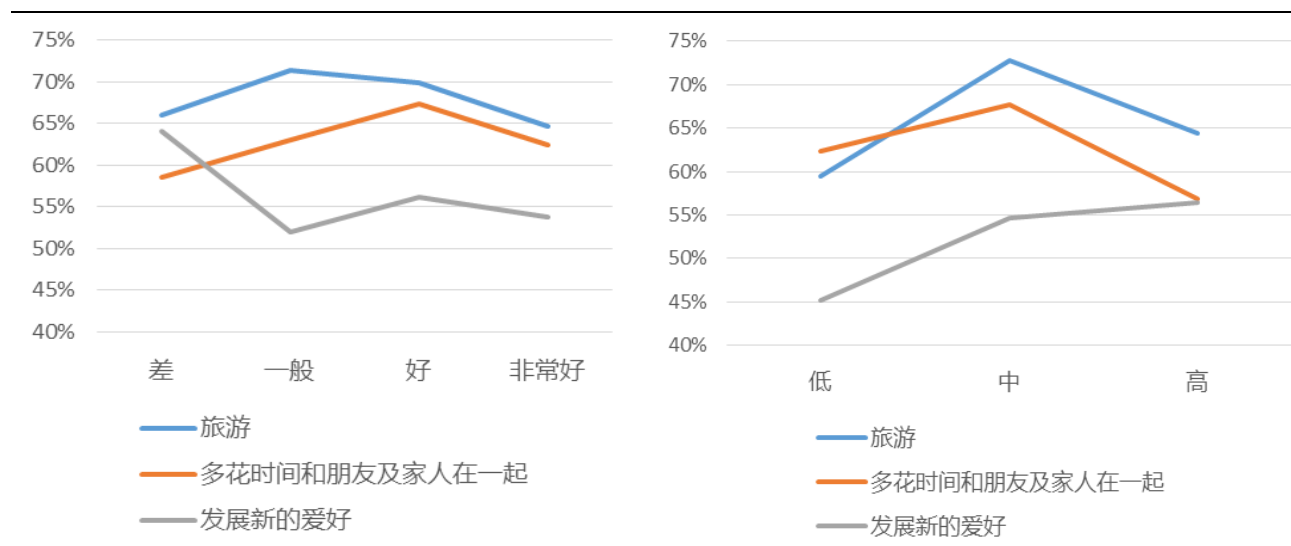


图 3.5 2017 年退休生活愿景与健康（左）、收入（右）之间的关系

与往年不同，在今天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旅游”、“陪伴亲友”和“发展新的爱好”这三个愿景并没有与健康、收入产生显著的相关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的升级，旅游和新爱好等已经由“奢侈品”变成“必需品”**，居民对消费升级的需求已不再受制于收入水平，甚至也因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而不再受制于健康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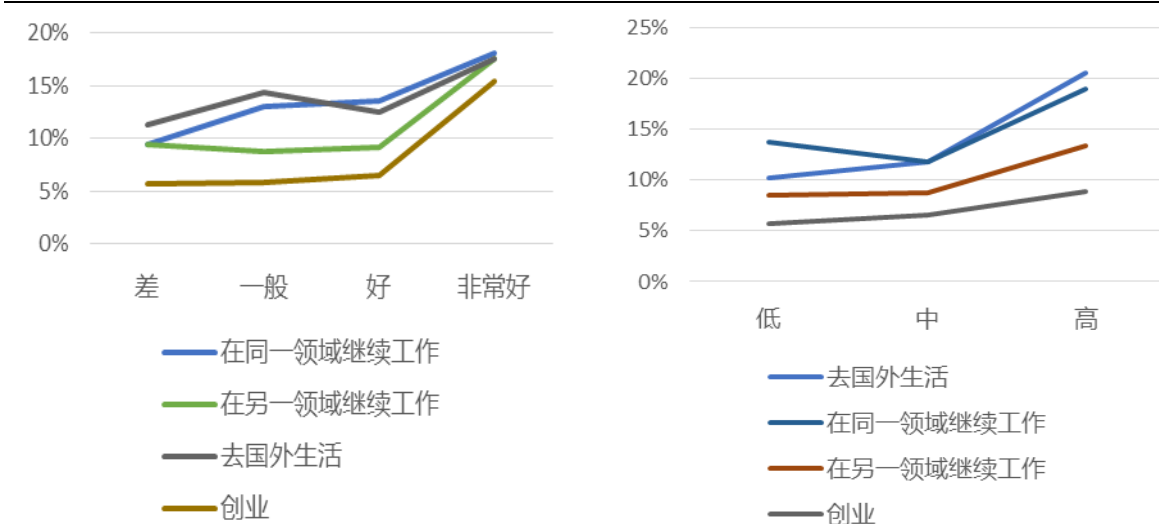


图 3.6 2017 年工作、创业、出国愿景与健康（左）、收入（右）之间的关系

除了旅游、陪伴亲友和新的爱好之外，我们对居民退休生活愿景中的其他一些关键词也进行了分析。发现，**对于工作、创业和出国的愿景，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由于工作、创业或者出国都需要较多的体力和精力，其中出国和创业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成本，因此这些“体力活”会受到健康、收入状况的影响，还不能在消费升级后被消除。

为了了解居民退休愿望的实现情况，我们同样将样本分为未退休者、半退休者和已退休者，对他们退休后正在体验的或曾经体验到的相关经历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 3.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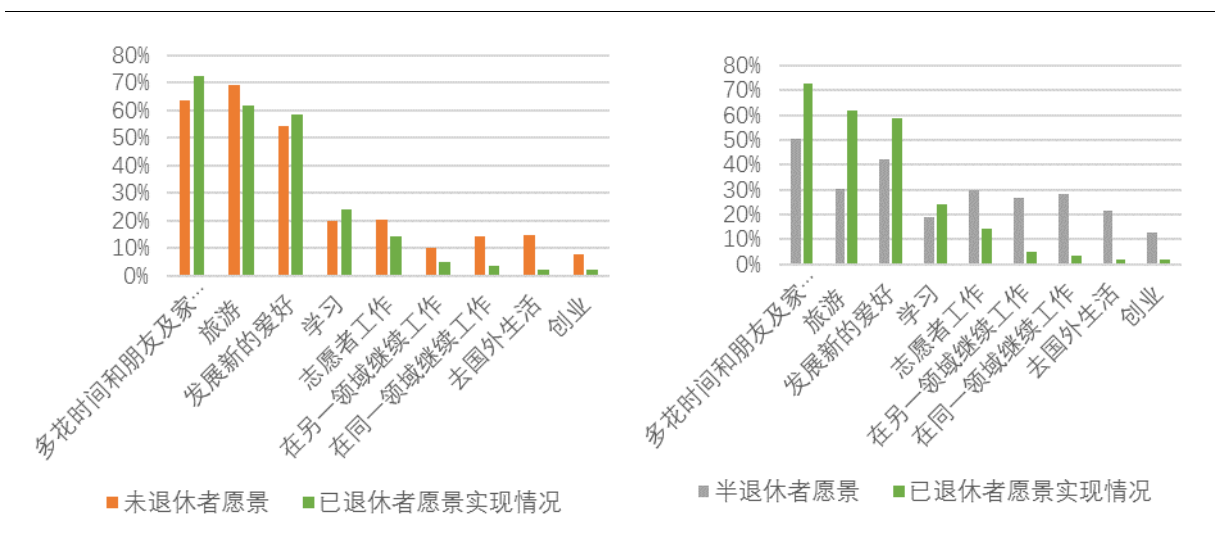


图 3.7 2017 年退休愿景的实现情况

我们发现，在退休愿景方面，未退休者与已退休者对各个关键词的期待也呈现基本一致的状况，表明了未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理性预期；而半退休者对“旅游”、“陪伴亲友”、“发展新的爱好”的选择频率依然显著低于已退休者和未退休者，而更倾向于选择工作、出国、创业等，这进一步说明了半退休者希望“发挥余热”的特性。

3.1.3 对退休年龄和退休后寿命的预期较为乐观

为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养老负担，很多国家采取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措施。近年来，我国针对法定退休年龄偏低的情况，提出了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面对新的退休政策，我们调查了受访者对自己未来退休时间的预期，包括预期退休年龄，预期退休后的生活年数及预期寿命，以便为进一步了解退休准备情况奠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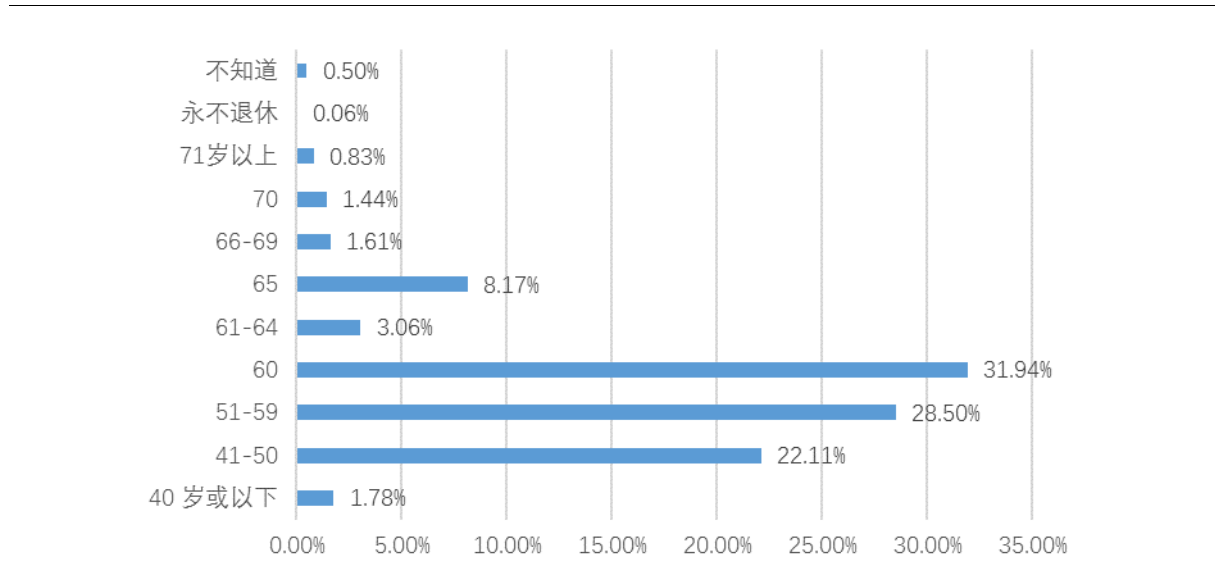


图 3.8 2017 年预期退休年龄

我们首先对居民的预期退休年龄进行了调查，结果如图 3.8 所示。绝大部分（82.55%）未退休受访者期望自己在 41 至 60 岁之间退休，其中 22.11% 的未退休者希望自己在 41 至 50 岁之间退休。总体来看，未退休受访者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56.53 岁，相比于去年的 56.04 岁和前年的 55.54 岁，

正在以稳定的速度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中预期 65 岁及以上退休的比例为 12.11%，而 2016 年为 9.61%，2015 年为 4.89%，这表明随着国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逐渐推出，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接受更晚一些时间退休，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力逐渐显现。

接下来，我们调查了受访者预期退休后生活年数，并将其与预期退休年龄相加，得到受访者的预期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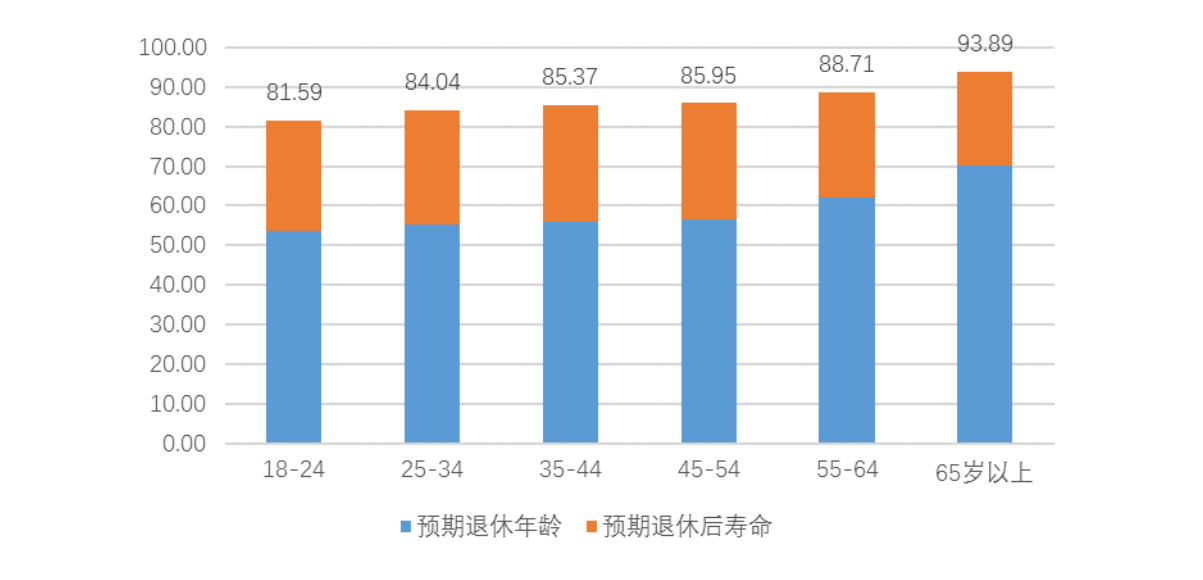


图 3.9 2017 年预期退休年龄和退休生活年数

如图 3.9 所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受访者对自身寿命的预期越乐观，表现为“预期退休年龄（蓝色部分）+预期退休生活年数（黄色部分）”越来越高。对受访者的预期寿命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主观预期寿命均值为 85.2 岁，与去年持平。结合 2016 年国家卫计委公布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6.34 岁来看，受访者对自己寿命的预期依然非常乐观，大大超过国民的实际平均寿命。这也启示我们，在医疗、养老等社会条件尚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居民如何为退休后的健康生活做好准备，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3.2 退休生活信心

3.2.1 退休生活信心总体较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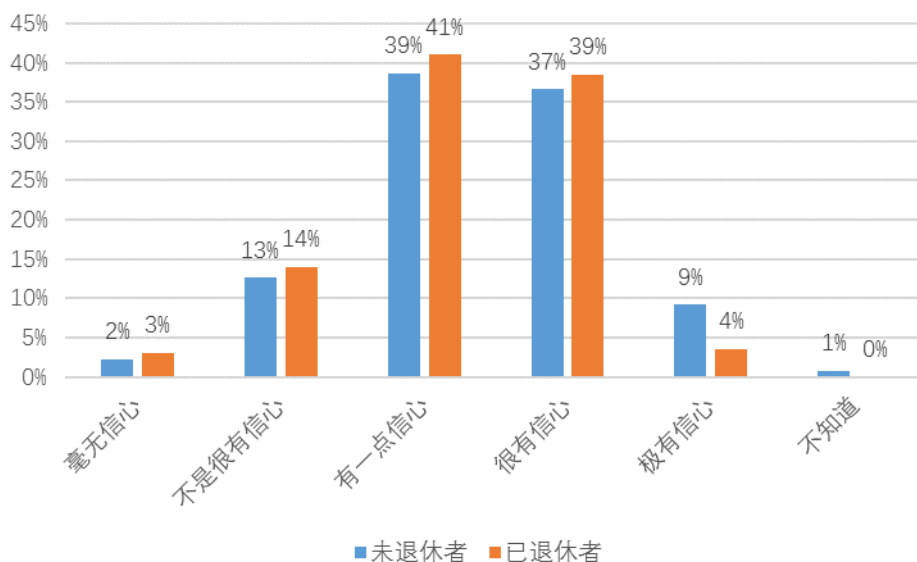


图 3.10 2017 年未退休者和已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信心程度

如图 3.10 所示，我们调查了未退休者和已退休者对退休后过上舒适满意生活的信心，并进行了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到，未退休者和已退休者对退休后过上舒适满意生活的预期基本一致，其中分别有 46%和 43%的受访者对过上满意生活表示很有信心甚至极有信心，但也分别有 15%和 17%的受访者对此表示不是很有信心，甚至毫无信心。

相比未退休者而言，很可能是因为对退休生活有了更深了解和体验的原因，已退休者在“极有信心”的比例上略逊一筹。但对“很有信心”、“有一点信心”、“不是很有/毫无信心”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均不大。已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信心相对略趋保守，可能是由于其财务状况已相对稳定，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小所导致的。

3.2.2 经济向好，居民对退休生活的信心正在回升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将未退休者和已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信心与 2016 年进行了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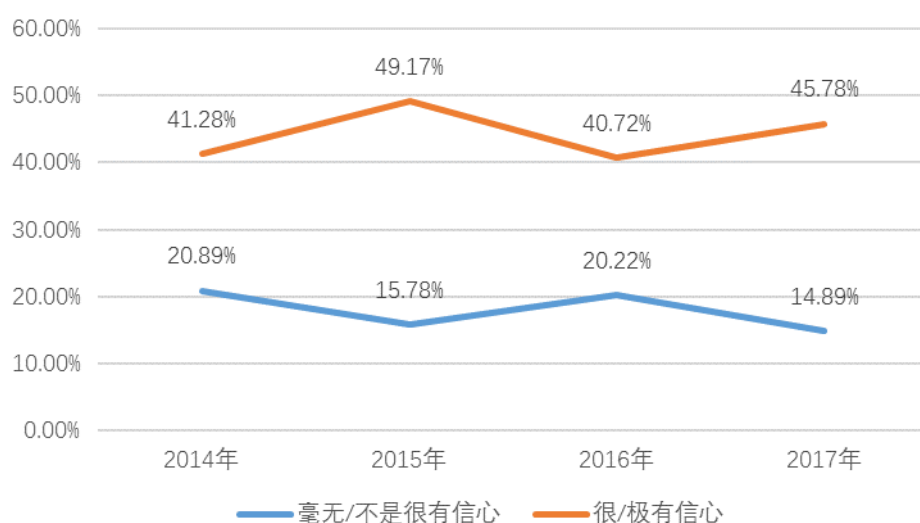


图 3.11 未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信心程度对比（2014-2017）

如图 3-11 所示，与 2016 年相比，未退休者选择“很/极有信心”的人数上升了 5.05 个百分点；而选择“毫无/不是很有信心”的人数下降了 5.33 个百分点，且已经低于 2015 年的水平。这表明，未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信心相比去年有明显提升，持积极态度的人数增加。通常，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变化，会对未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信心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我们推测，造成上述信心变动的原因可能包括：经济增速的回稳对居民整体信心产生了正面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迅速发展增添了年轻人未来的养老选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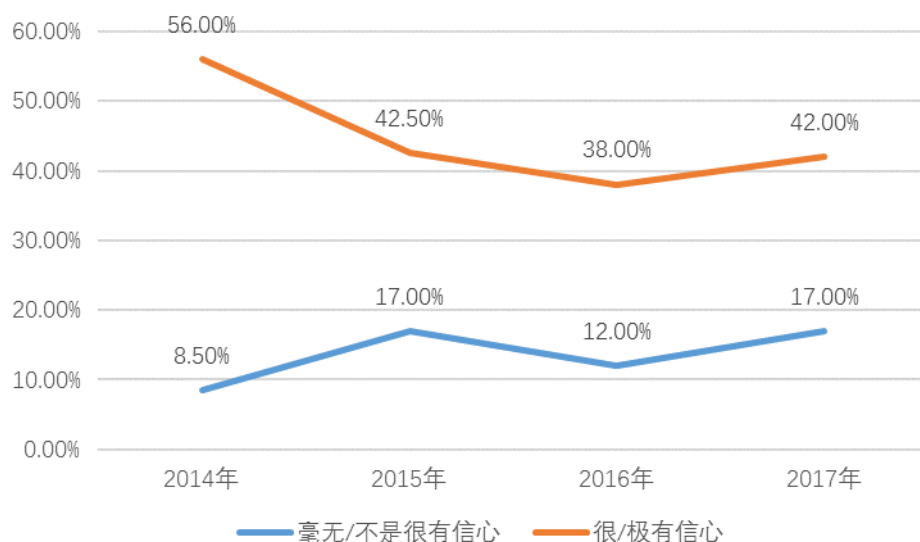


图 3.12 已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信心程度对比（2014-2017）

如图 3.12 所示，与 2016 年相比，已退休者选择“很/极有信心”的人数上升了 4 个百分点；选择“毫无/不是很有信心”的人数也上升了 5 个百分点。与未退休者不同的是，已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信心比去年更趋于分化，持积极或消极态度的人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持中立态度选择了“有一点信心”的人减少。这说明，已退休者由于已进入退休生活阶段，面临的确定性较大，因而相比

未退休者，已退休者更能够确定自己的退休生活状态是很好还是很差，选择“很/极有信心”和“毫无/不是很有信心”的比例也就上升了。

3.2.3 退休前与退休后相比信心过高，风险事件难预期

我们还调查了已退休者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与其退休前一年对退休后经济状况的预期进行了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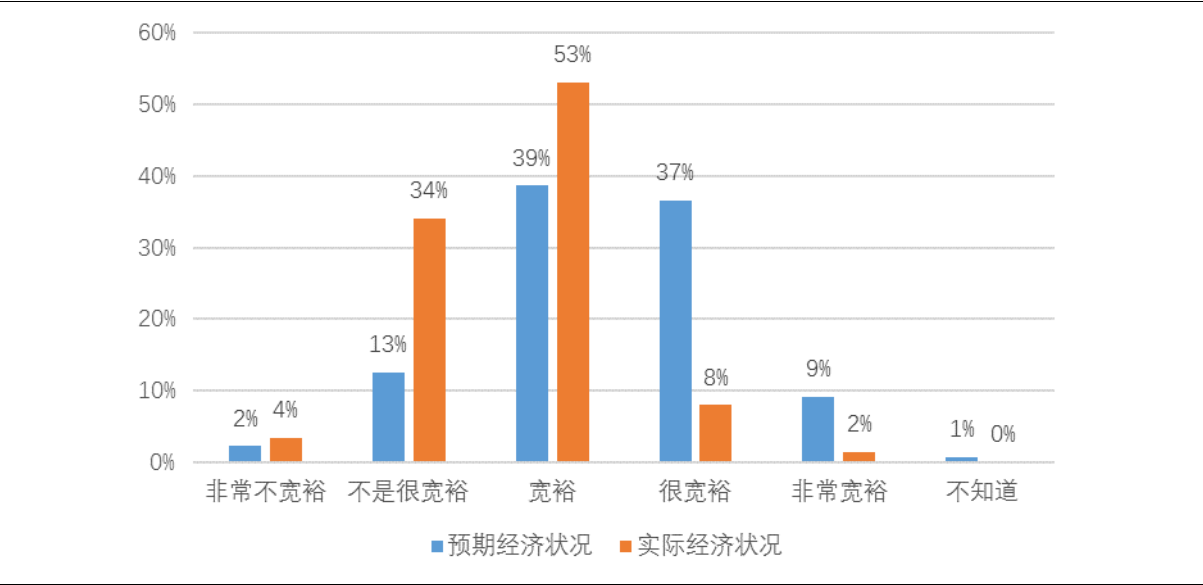


图 3.13 2017 年已退休者退休前预期经济状况与实际经济状况比较

如图 3-13 所示，已退休受访者目前实际经济状况与其退休前一年对退休后经济状况的预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大部分已退休受访者处于“宽裕”（53%）的状况，尚值得宽慰；但从整体上看，退休后选择“很宽裕”、“非常宽裕”的居民比退休前都少了很多，相反选择“不是很宽裕”的人则增加了 1.6 倍。结果表明，居民在退休前对退休后经济状况的预期基本上是准确的，但往往过于乐观，无法对退休后发生的意料之外的风险事件进行准确预期。为了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风险如重大疾病、失能等等，保障居民退休后的财务状况的稳健，购买重大疾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保险产品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3.3 退休生活预期

3.3.1 经济状态回稳促使居民对经济发展和自身收入的预期回升

我们调查了受访者对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状况发展趋势的看法，大部分受访者持乐观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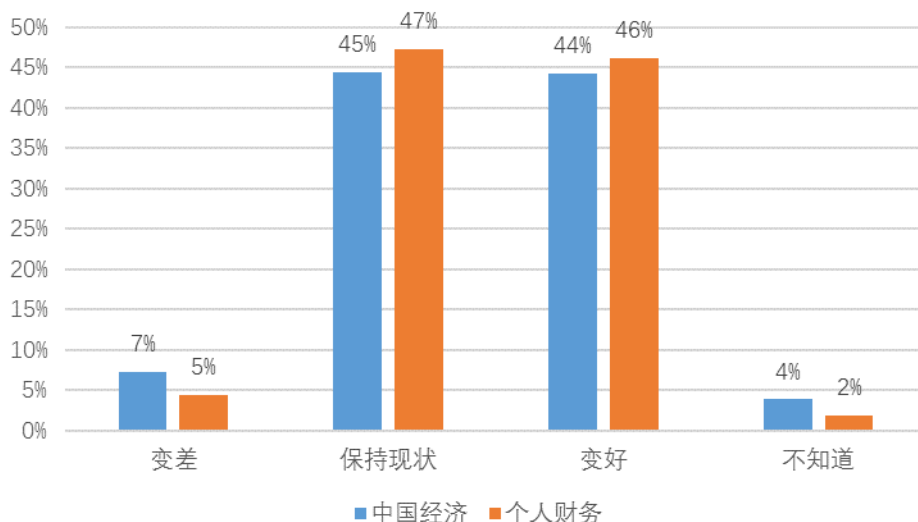


图 3.14 2017 年对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状况的信心

如图 3.14 所示，44%和 45%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将更趋良好或继续保持现有的发展势头；就自身而言，近一半的受访者（47%）认为个人财务状况在未来一年内仍会保持现状；也有近一半的受访者（46%）相信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在未来的一年内会有所改善。

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居民对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状况信心的平均情况，我们引入“预期水平”的概念。我们用选择“变好”的受访者比例减去选择“变坏”的受访者比例来衡量整体预期的乐观程度，称之为预期水平。根据往年的调查数据，我们列出了 2013-2017 年间的预期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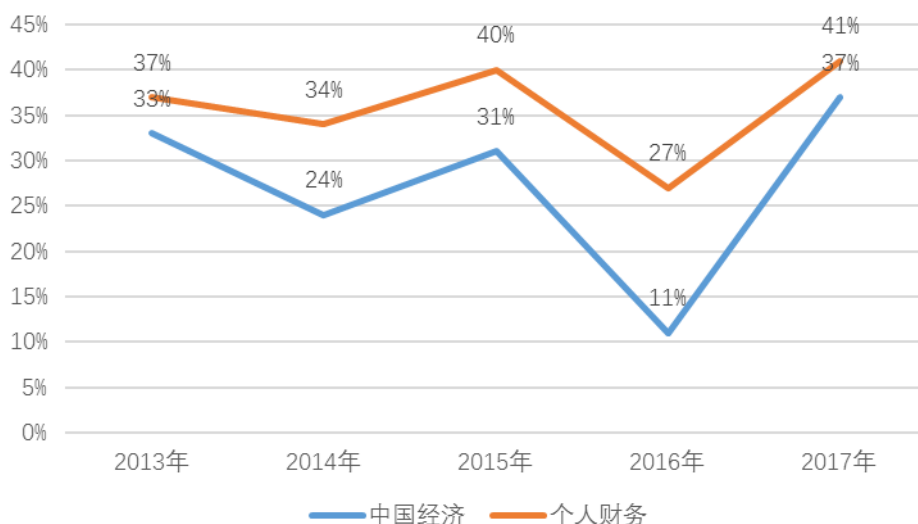


图 3.15 对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状况的信心（2013-2017）

如图 3.15 所示，2013-2015 年间，居民对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的预期水平在较小范围内波动，2016 年出现了显著下降，个人财务的预期水平降至 27%，2017 年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则显著改善，甚至超越了 2015 年的水平，修正了 2016 年时因经济形势低迷而产生的误差。近两年显著的下降—上升过程显示出，居民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长的预期开始回归正常轨道，并稳中有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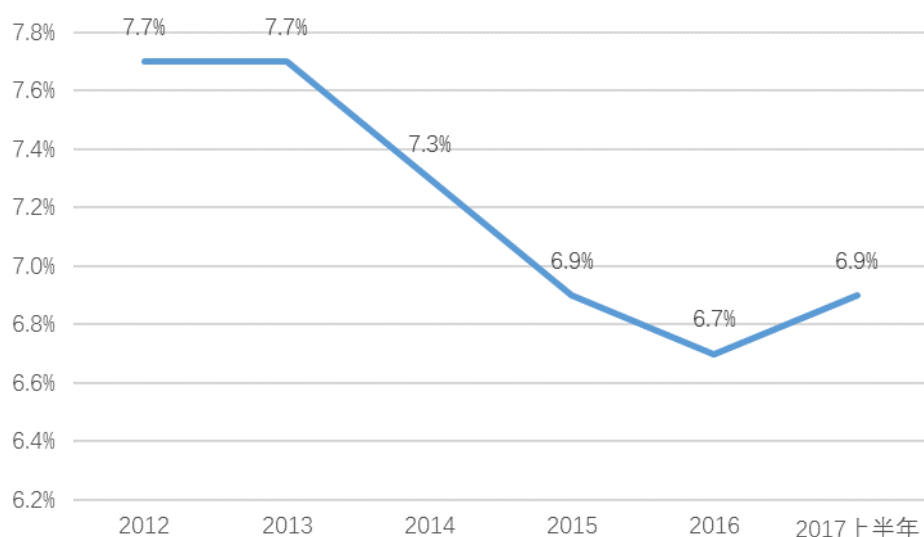


图 3.16 中国 GDP 增长率（2012-2017 上半年）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重要的转型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 增速不断下滑（图 3-16），存款利率也不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加深了对自身收入增长速度的担忧。而从 2017 年初起，经济逐渐回暖，让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稳定在了之前的水平。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长期的“L 型”中高速增长区间，居民对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的预期正逐渐趋于平稳。预期水平随实际经济增速的强烈波动也启示人们，在未来经济不确定的状况下应着眼长远，寻找合理、稳定的方式来实现退休后个人生活的保障。

3.3.2 对退休生活收入与状态的预期较乐观

在研究居民对退休生活状态的预期时，我们选取了 6 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令人期待的退休生活状态（如：可能获得的关心照顾、生活品质和经济保障等），供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态度对相应的分值进行选择，分值从 1 到 5，1 表示非常悲观，5 表示非常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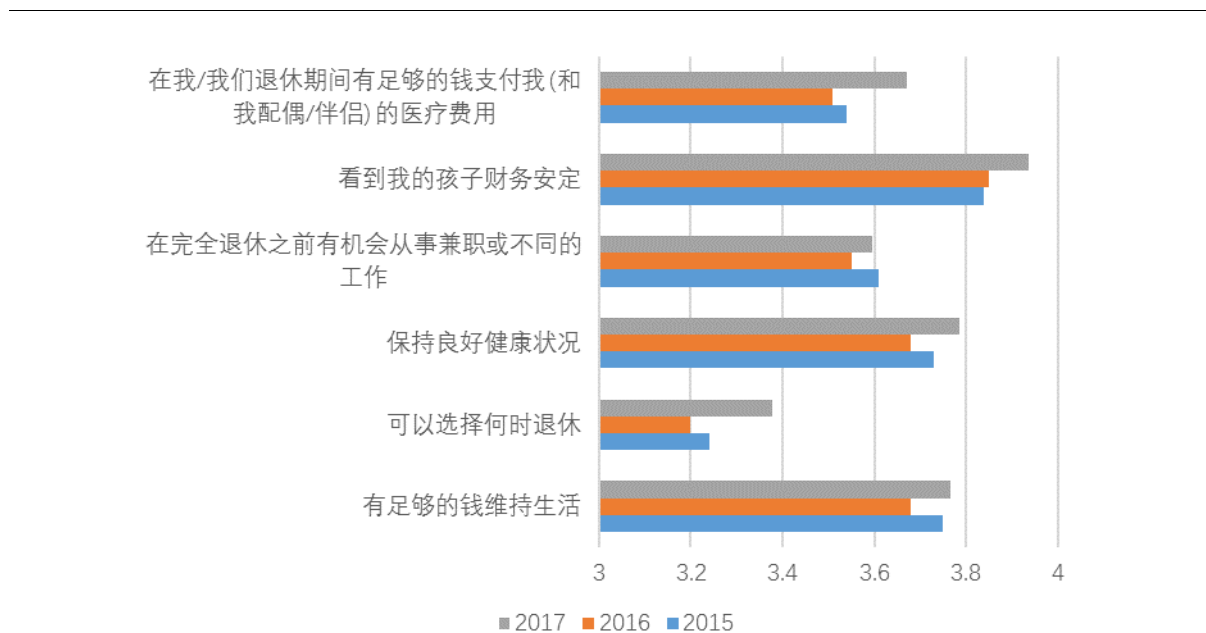


图 3.17 2017 年对退休后生活状态的乐观程度

由图 3.17 可见，受访者对大部分退休后的生活状态持乐观自信的态度（比较乐观和非常乐观）。总体来看，**大部分居民对退休后生活比较乐观**，尤其是对“看到我的孩子财务稳定”、“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保持良好健康状况”等信心十足。而对于“可以选择何时退休”这一选项，受访者的平均得分仅为 3.38，虽然相比前两年有所上升，但仍显著低于其余选项，**反映居民在自由安排退休时间方面仍存在较大阻碍**。事实上，我国的退休制度一直对工作者自主选择退休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在国家准备推进延迟退休的大背景下，居民对可以自由选择退休持更趋消极的态度。

与 2015、2016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可以看到 2017 年的调查结果中各选项均有了上升，修正了 2016 年因经济形势下滑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下降的信心。

3.3.3 收入和健康状况成为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将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作为自变量，分析居民对未来经济和自身财务状况的信心是否会受其收入水平的影响，我们仍用预期水平来衡量居民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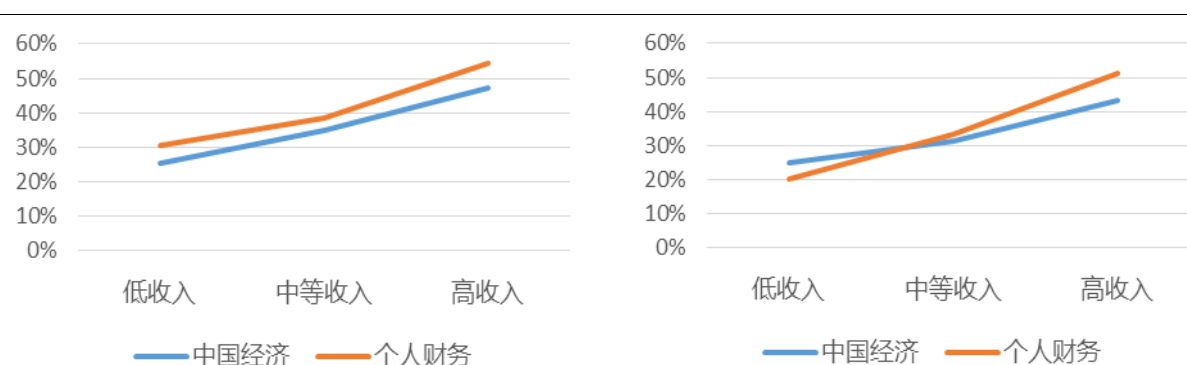


图 3.18 2017 年个人年收入（左）和家庭年收入（右）对居民预期水平的影响¹

如图 3.18 所示，无论是对中国经济还是对个人财务的预期，都与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收入水平更高的居民，对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会有更好的预期。另外，不同健康状况居民的预期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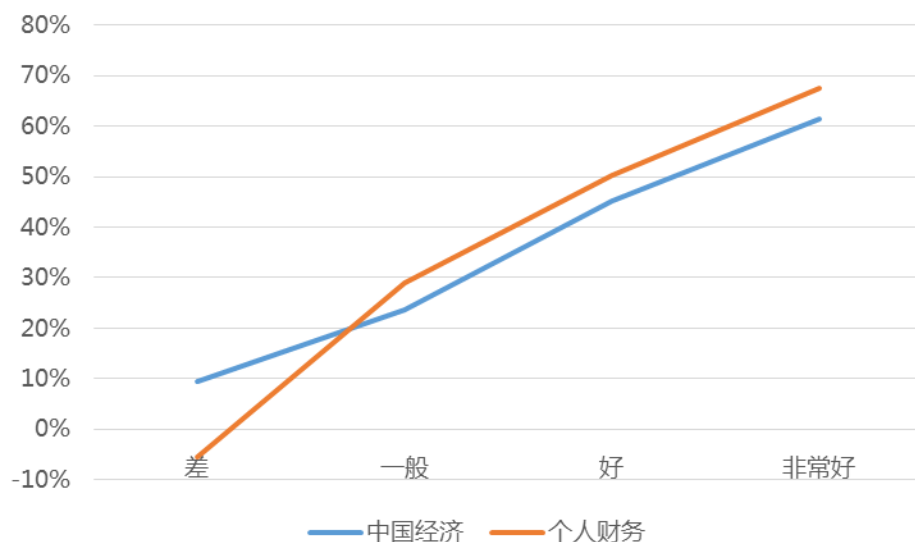


图 3.19 2017 年健康状况对居民预期水平的影响

如图 3.19 所示，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越好的受访者，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状况会有较高的预期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差的受访者，对未来个人财务状况的预期水平出现了负值（-6%），显示了较强的悲观预期。由此可见，健康状况对于居民的预期，尤其是在自身财务的发展状况方面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总体来看，收入和健康状况会对居民就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状况的乐观程度有较大影响。

3.3.4 对今后几代人的生活保持乐观

我们还调查了受访者对于今后几代人退休情况的预期，受访者基本保持乐观态度。另外，不同健康状况的居民的预期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

¹个人年收入分类：（低收入：个人税前年收入低于 30300 元；中等收入：个人税前年收入 30300-182099 元；高收入：个人税前年收入高于 182099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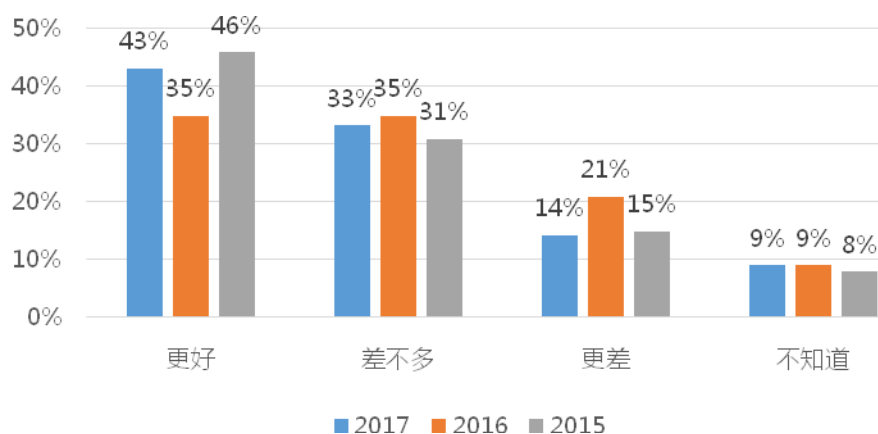


图 3.20 2017 年对今后几代人退休生活的预期

如图 3.20 所示，有 43%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退休情况会好转，有 14% 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差。相比 2016 年，认为“更好”的比例上升而认为“更差”的比例下降，基本与 2015 年的水平持平。这也体现了居民对于未来几代人退休生活的预期正趋于积极。同时我们发现，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越乐观的受访者，对未来几代人的退休生活的预期也越乐观。

4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

4.1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4.1.1 2017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有所回升

为了对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进行科学评价和分析，我们选取了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 6 个影响因素，并赋予相应的权重，构建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²。退休准备指数的取值在 0-10 之间，数值越大表明退休准备越充分³。

2017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6.31，相对 2016 年的 6.04 有所回升，但低于 2015 年的 6.51，和 2014 年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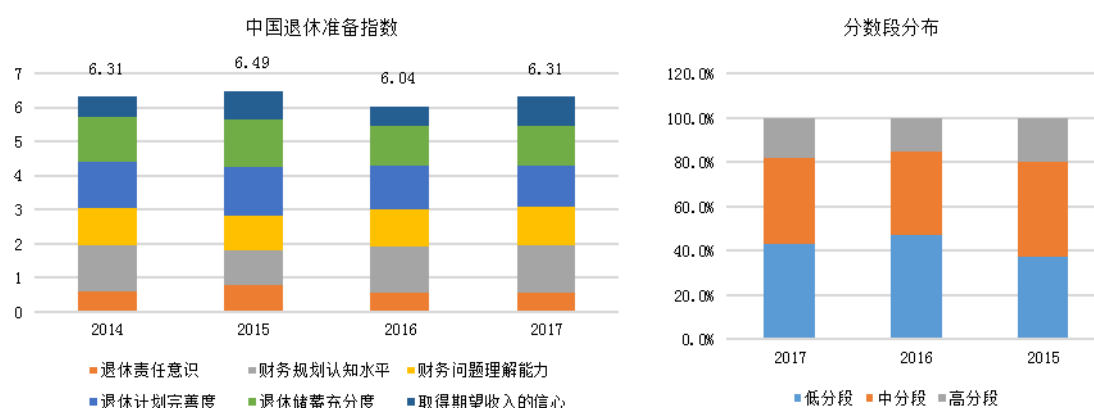


图 4.1 2014-2017 年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及近三年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分数段分布

注：Q40-退休责任意识（确保自己退休收入的责任），Q41-财务规划认知水平，Q42-财务问题理解能力，Q43-退休计划完善度，Q44-退休储蓄充分度，Q46-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通过比较发现，2017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构成和 2016 年有较大差异，其中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较上年有小幅上升，而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则连续三年下降。提升幅度最大的是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几乎与 2015 年时的水平相当，表明人们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较好，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较为乐观，这一变化与 2017 年中国开局经济形势较好不无关系；另外，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政策，让中国居民对经济逐渐恢复了信心。

² 计算方法详见附录 1。

³ 可以对不同分数进行划分：8 分（高分段）以上表示退休准备非常充分；6-8 分（中分段）表示已经有一定的退休准备，但还有所欠缺；6 分（低分段）以下表明退休准备不足。

在分数段分布方面，相比 2016 年，2017 年低分段人数比例明显下降，中分段和高分段人数比例均有所上升，说明受访者中退休准备不足的比例较 2016 年减少，有一定退休准备和准备非常充分的受访者变多，但都未达到 2015 年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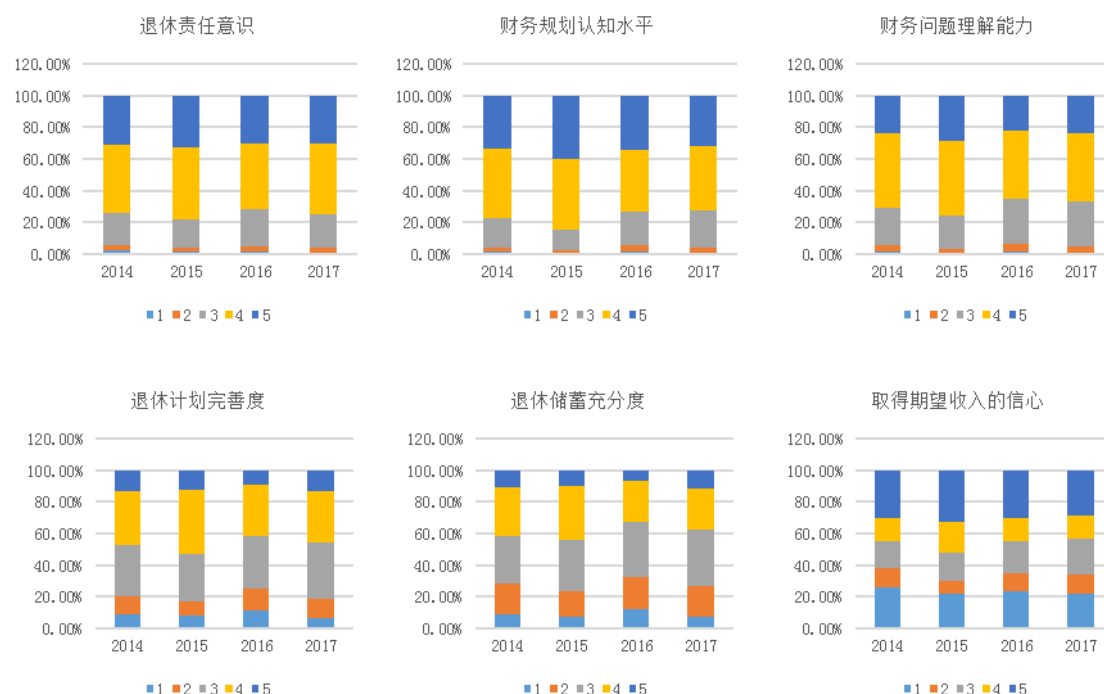


图 4.2 2014-2017 年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各部分情况

注：1 至 5 分别为问卷中的选项，1 代表程度最低，5 代表程度最高。

在衡量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的问题中，觉得自己要完全负责（选择 5 分）的受访者比例与 2016 年相当，都为 30% 左右，但总体上觉得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的（选择 4 分及以上）的受访者比例较 2016 年有明显的上升，上升约 3%。

总体上，受访者的退休责任意识较 2016 年是上升的。在回答对于退休收入来源于政府、雇主和个人的比例的问题时，虽然平均来看，政府依然是人们退休收入的主要来源，接近 40%，但个人储蓄所占比例较前两年有所上升，这一情况印证了前文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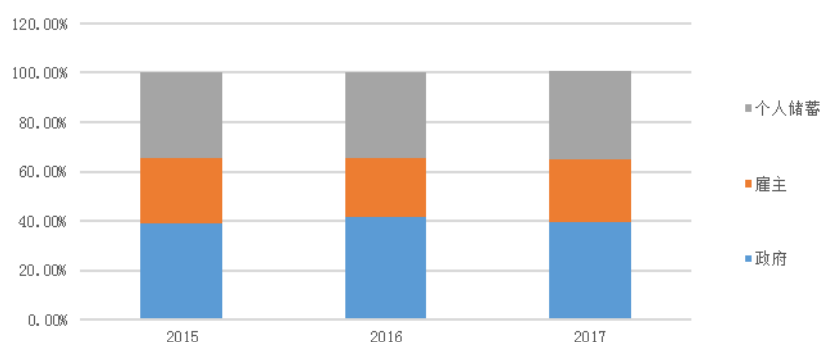


图 4.3 2015-2017 年退休收入来源比例情况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上，选择 3 分及以上的受访者比例总体上都较 2016 年有所提高，因此我们认为，人们关于财务问题的认识有了一定的进步。从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上来看，了解自己退休储蓄和投资总价值的被访者仅有一半，非常了解的仅有 18%。因此我们认为，**虽然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较上一年有进步，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居民的认知，这样才能更好地为退休进行储蓄和投资。**

我非常了解我所有的个人退休储蓄和投资（这可能包括养老金、股票与股份、与投资相关的保险、财产等）的总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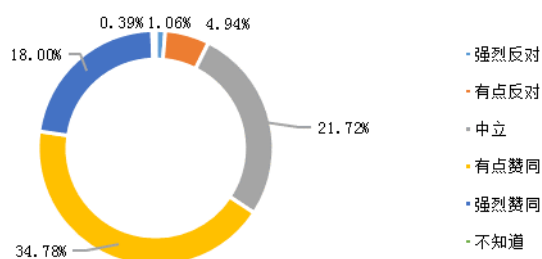


图 4.4 2017 年关于为退休进行储蓄的理解

在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方面，计划不够完善及储蓄不够充分（选择 1 分或 2 分）的受访者的比例较 2016 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而认为自己退休计划十分完善及退休储蓄十分充分的受访者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据此我们认为，人们今年有了更好的退休计划及更加充分的退休储蓄。**

从对于能够鼓励受访者进行储蓄的因素分析来看，**结婚会鼓励受访者为退休进行储蓄**，家庭的组成通常意味着责任和经济负担，这些变化会让被访者更加关注未来的财务规划，自然将退休放进规划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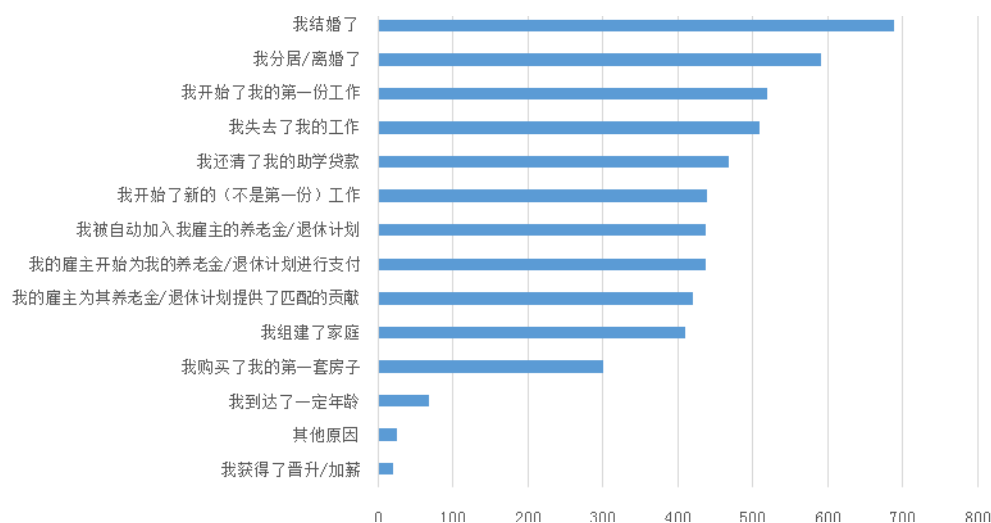


图 4.5 2017 年能鼓励受访者将来退休储蓄的因素

2017 年的结果显示, 更多的人对自己取得期望收入有信心, 体现在受访者比例变化中的低分段, 认为自己只能取得期望收入的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较 2016 年减少了 2%。

4.1.2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排名上升

根据荷兰全球人寿 2017 年的测算, 在被访的 15 个国家中, 中国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排名第 4, 低于印度, 美国和巴西, 而 2016 年时中国位居第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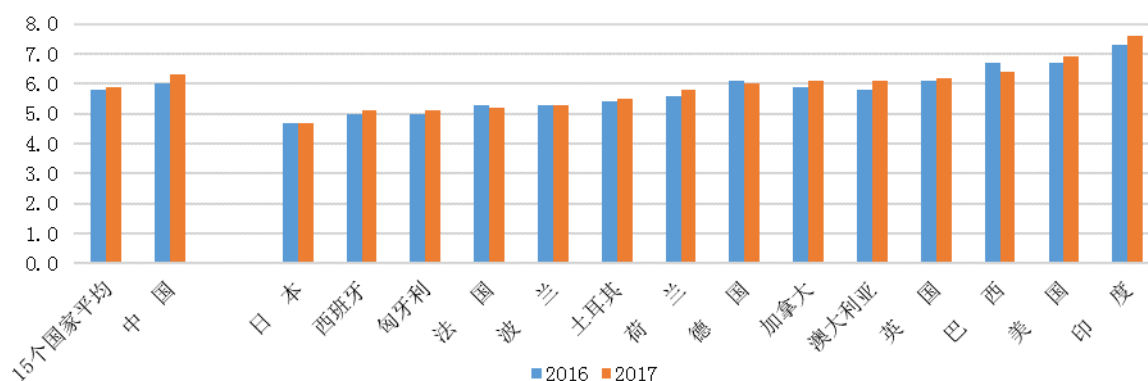


图 4.6 2016-2017 年 15 个国家退休准备指数图

注: 图中数据来自 The Aegon Retirement Readiness Survey 2017

除了德国和日本, 其他国家的退休准备指数都有所上升, 大部分国家的居民退休准备情况在改善, 据此我们推测, 人们对于未来全球经济的信心较 2016 年有普遍的提升。

4.1.3 个别省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有较大变动

基于全国的居民退休指数结果，我们对各省的居民退休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17 年全国各省的居民退休指数与 2016 年相似，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个别省份的变化引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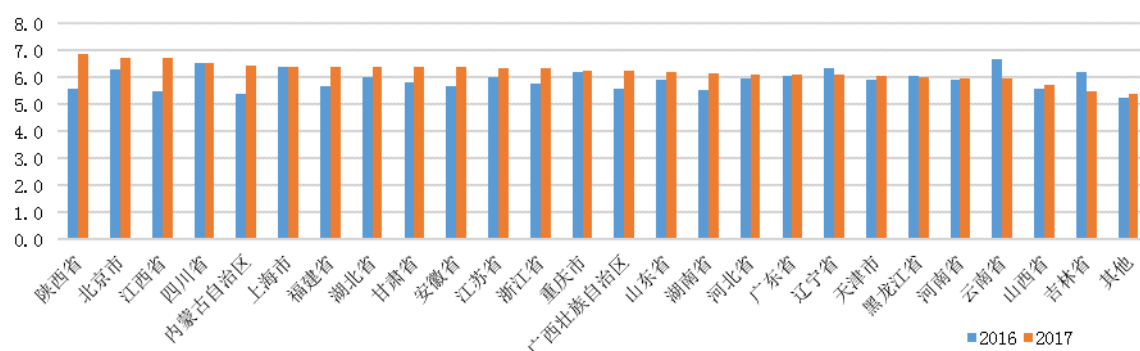


图 4.7 2016-2017 年各地区居民退休指数图

注 1：其他省份包括样本数量不到 10 人的贵州省，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6 个地区。

相较于 2016 年，2017 年大部分省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及省份，今年依然位于前列。**但个别省份的排名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陕西省 2017 年的居民退休指数较 2016 年上升了 1.3，在所有省份中变化最大，其次是江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这三个省份退休准备指数的各个方面较 2016 年都有很大的改善，居民退休准备进步了很多。

大多数省份的指数都呈上升趋势，云南、吉林、辽宁和黑龙江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有所下降。通过进一步比较发现，下降的 4 省份的退休准备指数的构成中，仅有一项——“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较 2016 年有所上升，其他项则都变化不大或有所下降，最终导致退休准备指数总体的降低。

4.2 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因素

4.2.1 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居民退休准备越完善

为了进一步探讨经济发达程度对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我们继续使用过去两年的划分方式，按照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分布情况，对 31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区域划分⁴，并且分别计算不同区域的退休准备指数，再对不同区域的退休准备情况进行对比。

⁴区域划分：重要业务市场包括广东、山东、江苏、上海、北京；其余业务市场包括湖北、浙江、福建、天津、四川、河北；北部地区包括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南、安徽、陕西、山西、重庆、江西；南部地区包括广西、云南、贵州、海南；西部地区包括甘肃、新疆、宁夏、青海、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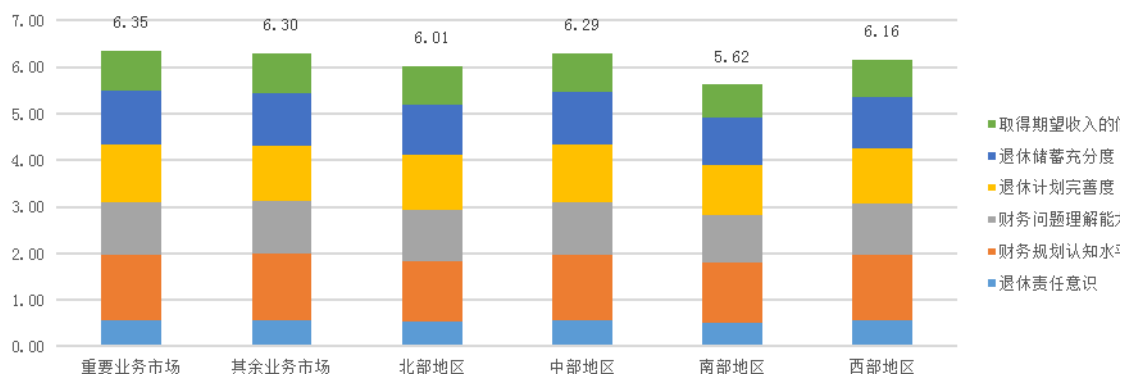


图 4.8 2017 年不同地区居民退休指数

同方全球人寿重要业务市场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要优于全国，其中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仍然是其最大的优势。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并无优势。

其余业务市场的退休准备水平较低，其中最大的不足仍然在于退休计划完善度与退休储蓄充分度方面。

与过去几年的结果相似，退休准备指数并不完全随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而上升，但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确实会改善人们的退休准备情况，在重要业务市场，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比较成熟，收入较高，金融投资渠道也会更加丰富，这进一步造成了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情况的差异。

4.2.2 机关和事业单位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较高

2017 年，我们增加了对就业单位的差异分析。不同就业单位的群体会由于退休后可能得到的来自单位的不同退休福利，而选择不同的退休准备，也会对自己未来的退休收入有不同的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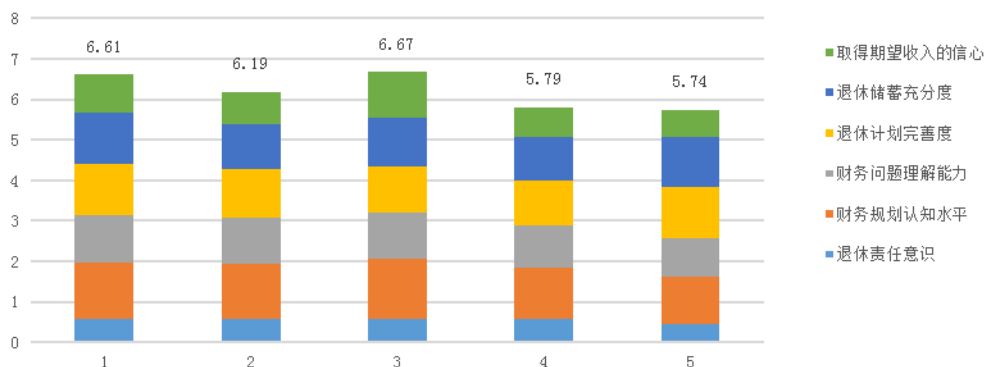


图 4.9 2017 年不同受雇单位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注：1 代表机关及事业单位，2 代表私营企业、合伙企业或其他组织，3 代表非盈利组织，4 代表以上都不是，5 代表不知道

从图中来看，机关及事业单位和非盈利组织的退休准备指数高于私营企业、合伙企业或其他组织，主要差异在于退休计划完善程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方面的优势。由于机

关及事业单位的收入较为稳定，并且通常有优于私营企业的退休后福利，而非盈利组织通常是财务较为自由的群体选择的对象，因此他们对获得期望收入有较大的信心，退休储蓄充分度也较高。

就业于私营企业、合伙企业或其他组织以及对于自己单位性质并不清楚的群体，可能更多从事的是不够稳定的职业，因此在退休准备的各个方面都不是很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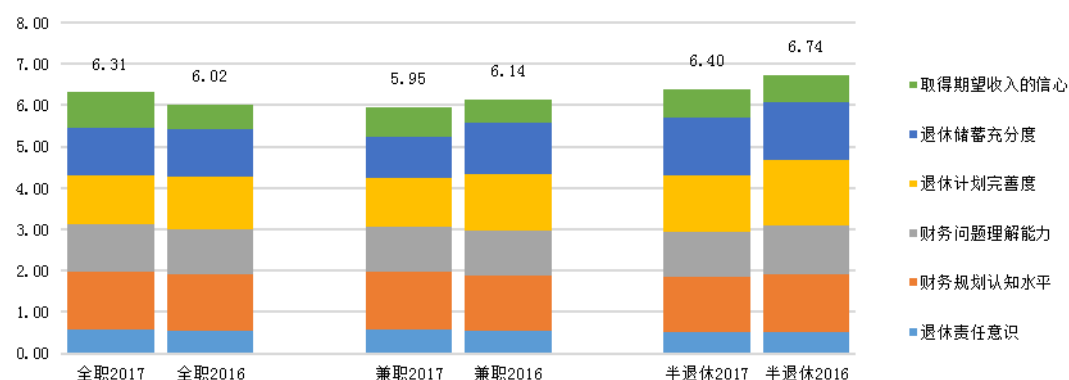


图 4.10 2017 年不同工作状态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除了受雇单位性质不同会影响退休准备之外，工作状态也同样会影响退休准备（见图 4.10）。在全职、兼职及半退休群体中，兼职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最低，主要是收入的不稳定性导致，兼职群体的退休储蓄充分度与全职及半退休群体有很大差距。

与 2016 年相比，全职状态的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升高，主要是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提高，兼职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是退休储蓄充分度及退休计划完善度分数的降低。由于全职的群体收入比较稳定，同时我国经济方面的改革成效渐显，人们的信心回升，因此 2017 年的退休准备指数提高。但 2017 年，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并不乐观，兼职及半退休群体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未来的通货膨胀对于他们的影响将更大，因此他们对于退休计划完善度方面，都有很大的下滑。

4.2.3 年龄、性别、收入是影响退休准备的重要因素

与前两年相似的是，越接近退休年龄，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越高，但在 30 岁到 50 岁之间，由于年龄造成的退休准备指数的差异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 30 岁以后，大部分人群的工作状态较为稳定，路径也更加清晰，时间不会对个人因素产生较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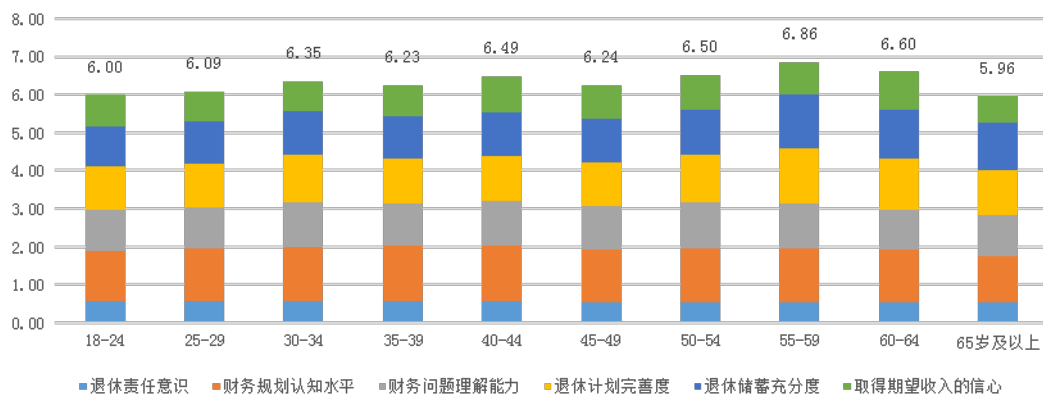


图 4.11 2017 年不同年龄段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对于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等问题，各年龄段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异，这些因素与年龄无较大关联。

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显著变化。收入的积累让人们更有可能制定完善的退休计划，同时提高储蓄充分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也会更足。时间跨度越大，不可预见的个人状况波动就会更大，因此年轻群体对退休后收入的预期更有可能信心不足，而年龄大的群体则对退休收入有更成熟的判断，也有着更长时间的储蓄积累以及更少的不确定性，他们对取得收入的信心也会有所提升。

性别依然是影响退休准备的一个因素。2014 年至今 4 年来的结果一致显示，男性的退休准备指数高于女性，并且差异主要来自于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方面。我们认为，女性更加保守谨慎的性格特点和男性更加具有挑战及冒险精神，可能共同导致了二者在居民退休准备方面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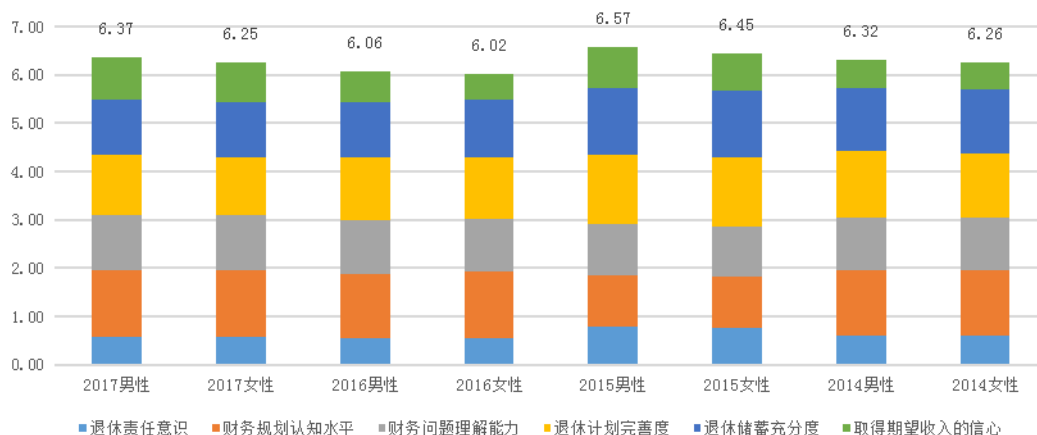


图 4.12 2014-2017 年不同性别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收入方面的差异导致的退休准备指数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我们将不同等级的个人收入水平及家庭收入水平按照从低到高进行了排序，并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从下图 4.13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随着个人收入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退休准备指数也在上升，这充分表明，收入的增长可以改善人们的退休准备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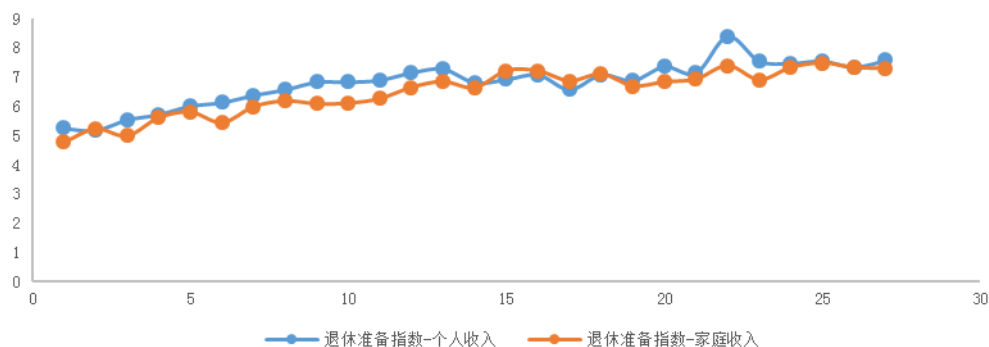


图 4.13 2017 年收入水平与退休准备指数

4.2.4 婚姻状况、子女等家庭因素共同影响退休准备

在 2017 年的调研结果中我们发现，**已婚及同居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大幅超过单身、分居和离婚的群体，其中分居和离婚的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最低**，差异主要来源于相对较差的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极低的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这与 2016 年的结果相比略有不同，今年同居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仅次于已婚群体。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可能会淡化婚姻的契约关系，而更在意实质的伴侣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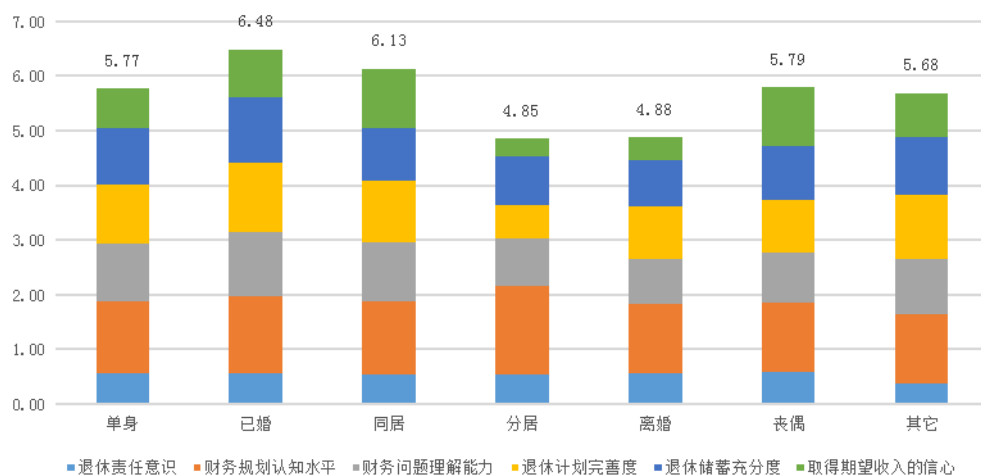


图 4.14 2017 年婚姻状况与退休准备指数

分居及离婚的群体通常存在比较严重的婚姻问题，婚姻的不顺利可能让这一群体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因而对未来的期望整体上较为悲观，导致了较差的退休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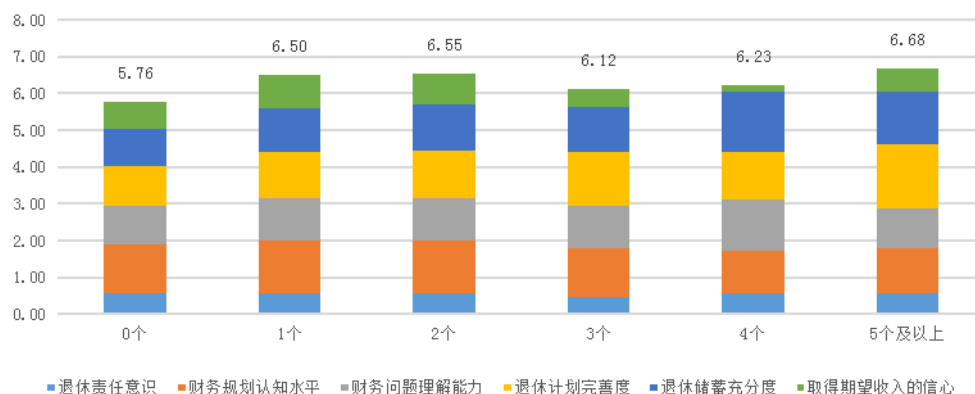


图 4.15 2017 年子女数量与退休准备指数

子女是被访者在进行退休准备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下图 4.16 给出了拥有不同子女数量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的构成情况。可以看到，**没有子女家庭的被访者的退休准备是所有被访者中最差的**，可见“养儿防老”在中国依然是十分适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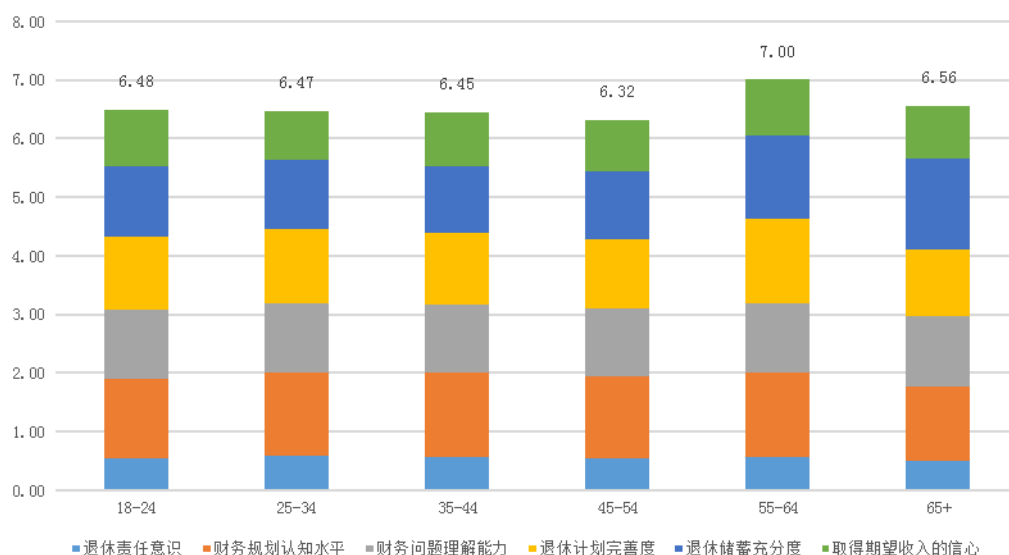


图 4.16 2017 年不同年龄段的有 2 名子女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在 2016 年的结果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拥有两名子女的居民退休准备情况会越来越好，但在 2017 年的结果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趋势。65 岁以上的群体的退休责任意识是所有拥有两名子女的受访者中最差的，这一点我们推测主要原因可能是年轻群体观念意识的改变，他们对养老责任的认知越来越自主化，不再单纯依赖子女，而目前的老年群体大部分还是依赖自己的子女，并且相较年轻群体，拥有较差的财务规划认知水平。从退休准备指数的构成可以看到，尽管指数从整体上来看没有发现明显的变化规律，但退休储蓄充分度依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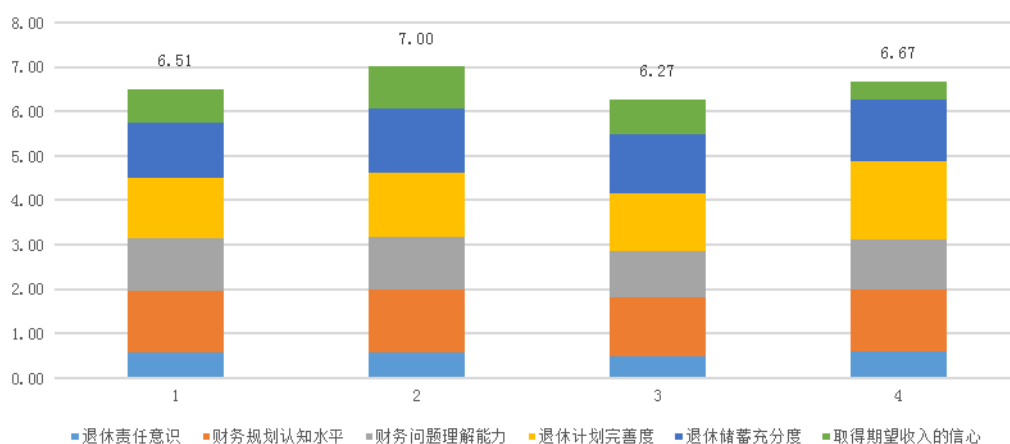


图 4.17 2017 年拥有不同子女数量的 55-64 岁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 55 岁至 64 岁之间的被访者，拥有两个子女的退休准备指数最高，同时并没有明显的趋势显示：子女数量越多退休准备指数就会越高，退休准备就会越好。但我们可以看到，在退休储蓄充分度方面，没有子女的被访者群体是最差的，据此也印证了前文提及的“养儿防老”的观点。

随着二胎政策的推行，未来可能会有其他的变化。目前看来，尽管一开始由于抚育子女会承担较大的经济压力，但退休后依赖子女获得的退休收入会更高，这种可预见的退休收入来源会让人们对退休后的生活有更高的信心，因此退休准备指数可能会逐渐提高。

5 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

退休规划是指居民对退休后生活进行的财务安排。财务安排是居民退休后享有良好生活水平的基础，对居民退休准备的衡量至关重要。考察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需要从财务收入来源、财务保障充足性及退休准备参与主体等多角度来综合衡量。

5.1 退休收入来源

居民退休收入的主要来源分为三类：一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计划，二是雇主建立的养老金计划，三是个人或家庭的储蓄和投资。表 5.1 给出了荷兰全球人寿调研得到的各国居民退休收入来源占比情况：

表 5.1 退休收入来源的占比（政府、企业、个人）

	总体	中国	日本	印度	荷兰	德国	英国	法国	西班牙	波兰	匈牙利	美国	加拿大	巴西	土耳其	澳大利亚
政府	46%	40%	50%	27%	42%	55%	42%	46%	65%	54%	55%	42%	41%	49%	53%	39%
企业	24%	25%	17%	30%	38%	17%	32%	27%	11%	20%	15%	29%	26%	23%	21%	26%
个人	30%	35%	32%	43%	20%	28%	26%	26%	24%	26%	30%	29%	34%	28%	26%	35%

对比中国与参与调查各国的总体平均水平，可见**居民退休收入来源中企业占比基本相等，政府占比低于平均水平，个人占比高于平均水平**。这一结果反映出不同国家养老保障体制的差异，部分国家居民由政府支付的养老福利水平较高，而中国居民更多的是依靠企业、个人和家庭进行养老财务准备。另一方面，从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险负担较重，企业年金规模较小，个人养老保险市场发展不足。因此，商业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发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出更贴近消费者需求的个人养老保险产品。

随着个人职业发展和退休年龄的临近，居民对退休收入来源及其占比的认知也会出现变化。我们选择了尚在工作的受访者，分析了他们对退休收入来源及其占比的估计随年龄的变化，见图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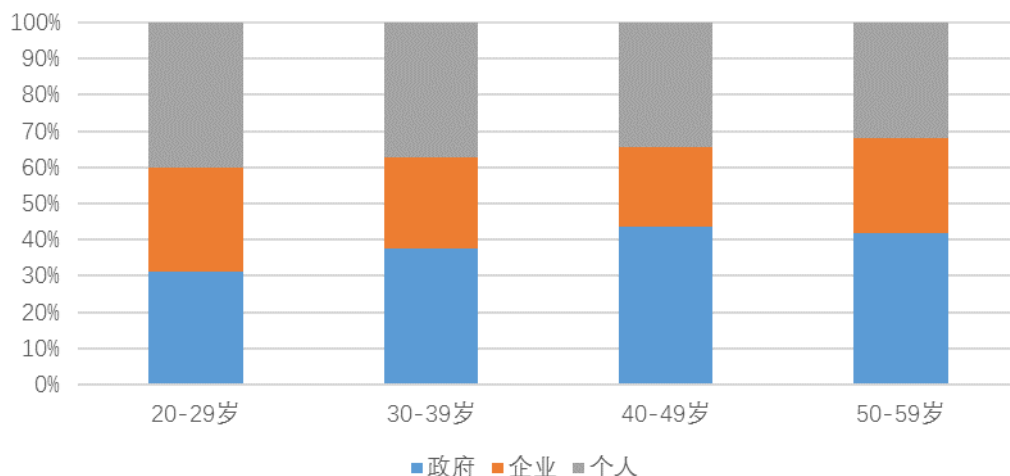


图 5.1 受访者预计退休收入结构随年龄的变化

结果显示，随着工作者年龄的增大和临近退休，居民对政府提供退休收入所占比例的期望更高，对个人所能提供的退休收入所占比例的期望降低。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年轻居民对个人收入在未来退休收入中的比例过于乐观，认为自身有能力承担较高比例的支出，待年老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二是年轻居民受到政策和新闻报道影响，对未来政府能够承担退休收入的比例持谨慎态度，主观上将个人收入所占比例上调了。无论如何，上述结果提示人们在职业生涯中应不断完善对退休收入的认识，结合经济情况和政策变动，尽早做出准备和调整。

5.2 个人责任：着眼长远，提前准备

作好个人退休规划是享有幸福退休生活的基础，决定了居民自身能够为养老生活所提供的财务基础，只有在完善退休规划的基础上，结合政府与企业提供的财务保障，才能完成全面的退休准备。目前，中国居民个人在退休规划财务准备方面的情况如图 5.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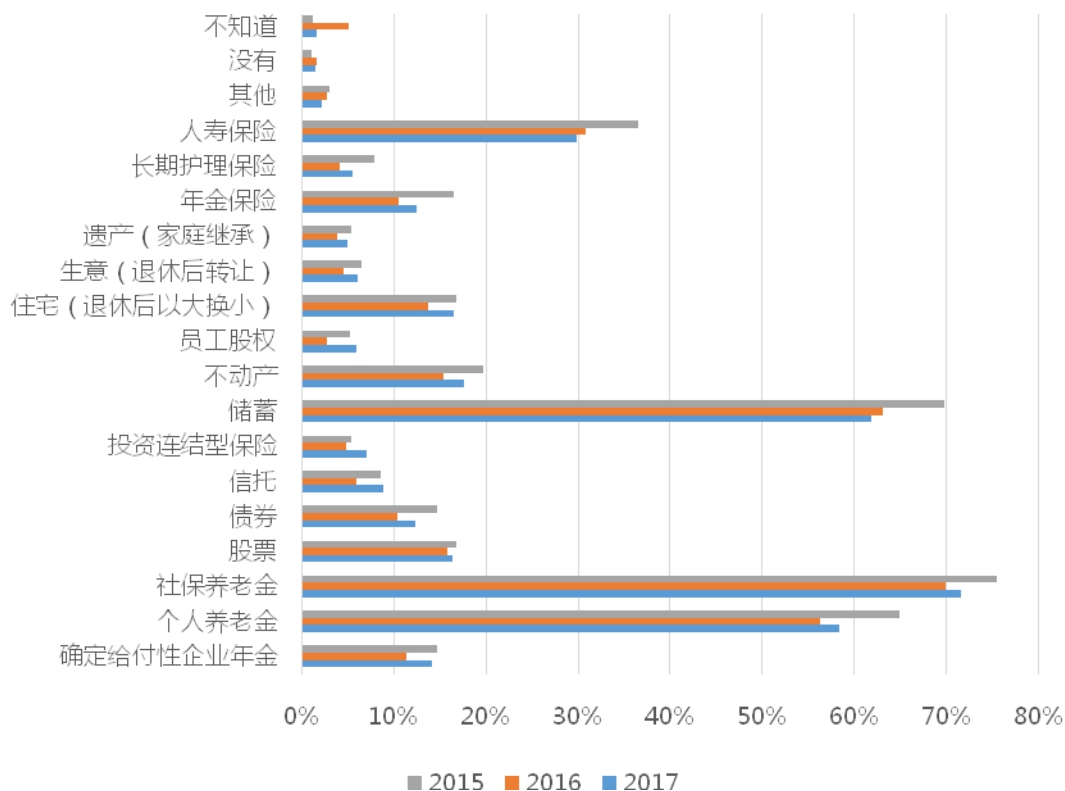


图 5.2 受访者认为的退休收入来源

图 5.2 显示，政府提供的养老金、个人储蓄、商业养老金和人寿保险位列中国居民退休财务准备方式的前 4 位，与 2014–2016 年间的排名情况相同。企业年金、长期护理保险等占比较低，体现出我国养老保障产品市场尚不发达，居民退休收入来源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5.3 政府责任：主动引导，回应期待

政府在居民退休规划中起到重要作用，不仅为退休者提供部分退休后的财务保障，也对未退休者面临退休时的财务选择有较大影响。根据世界各国情况来看，政府出台的社会养老保险相关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对居民选择退休后的财务安排有重大影响。

居民对退休后获得收入方式的偏好是影响财务安排的重要因素，很大程度受到政府的政策影响。按照我国现行模式，多数居民退休后是从政府定期（通常为每月）领取养老金。对未退休者调查得到的信息如图 5.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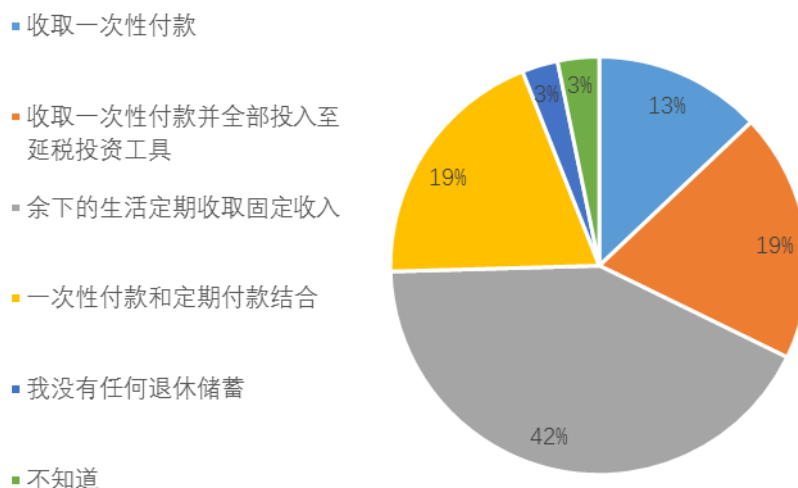


图 5.3 受访者期望接收退休储蓄的方式

可以看到，42%的受访者偏好退休后定期收取养老金，19%的受访者希望能将一次性获得的养老金投入新的延税投资工具。这表明，较多受访者还是保持传统思维，愿意按生存期限定期领取养老金，对未来资金运用不确定性持风险厌恶态度。一部分受访者愿意将养老金一次性全部投入税收递延工具，这种操作在西方国家比较常见，但在中国当前市场环境下，税收递延政策和金融工具还很不完善，类似选择的可行性较低。

养老金税收递延是发达市场国家的通用做法，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 401K 计划。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主动制定对策，引导居民利用金融工具做好退休规划，为老龄化社会提供政策保障。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提出在 2017 年底前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是对市场多年来呼吁的一个回应。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成效，未来能否铺开，以及中国市场的消费者是否接受这种新产品，仍尚待观察。

养老准备是民生大计，相关部门在制定决策前，首先需要了解居民的需要。在调查中，我们针对社会养老金成本日益增长的问题询问了受访者，并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受访者进行了区分，结果如图 5.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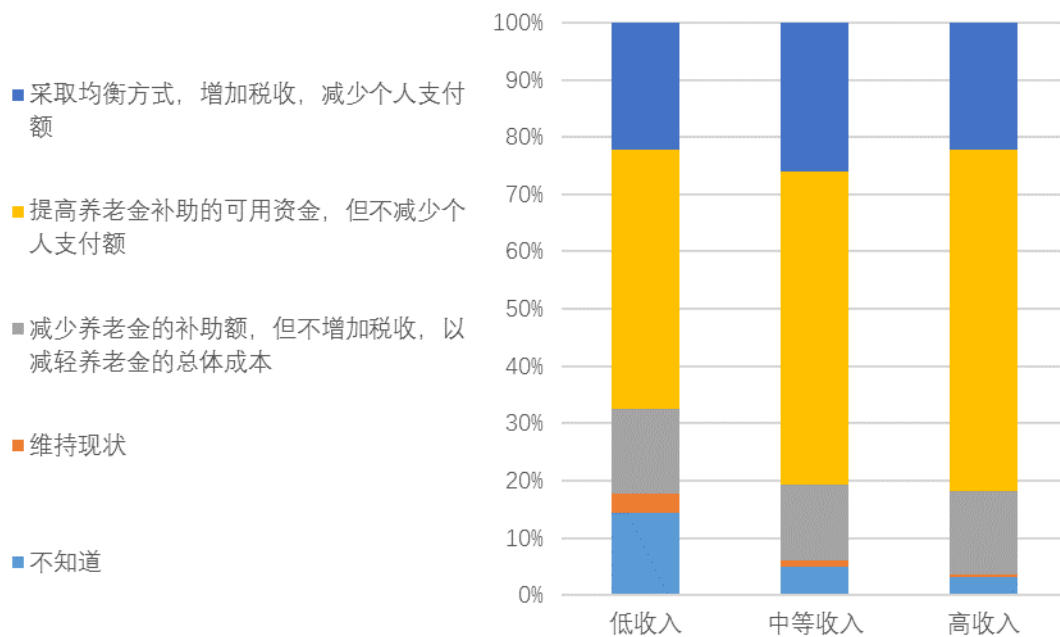


图 5.4 受访者对于社会养老金成本不断上升政府应当承担职能的期望

可以看出，选择“提高养老金补助的可用资金，但不减少个人支付额”的受访者占多数，说明多数受访者认同在当前社会养老金成本高企、账户紧张的情况下，居民自身应当为全社会做更多贡献。具体方式可以是增加缴税或提高个人支付标准等，这需要政府部门来制定规则。同时，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者认同这一观点的比例更高，达 55% 和 60%。这表明经济相对宽裕的居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养老金目前面临的困境，更认同居民自身需要担负的责任。面对民众态度的转变，社会养老金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或许是相关部门决策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5.4 企业责任：提供资源，多样发展

对于尚在工作的未退休者，企业通常会引导他们进行退休规划，并为其提供各方面的退休准备建议。我们调查了受访者对企业所提供帮助的态度，结果如图 5.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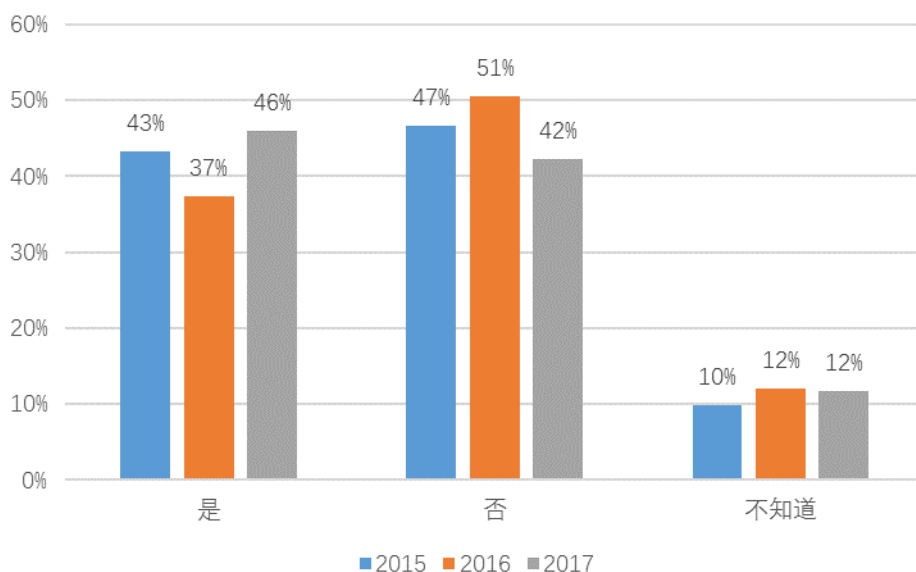


图 5.5 企业为员工提供退休准备帮助的情况

2015 年调查中,有 43%受访者认为企业提供了足够的退休准备的信息支持,2016 年降低至 37%,2017 年升至 46%。这一反弹引人瞩目,反映出中国企业意识到为员工提供退休准备帮助的重要性,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总体上看,对该项满意的受访者还不到一半,说明企业总体上提供的信息帮助是不足的,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为反映受访者对雇主提供的各项福利的评价,我们邀请受访者对列举的各项福利进行打分,结果如图 5.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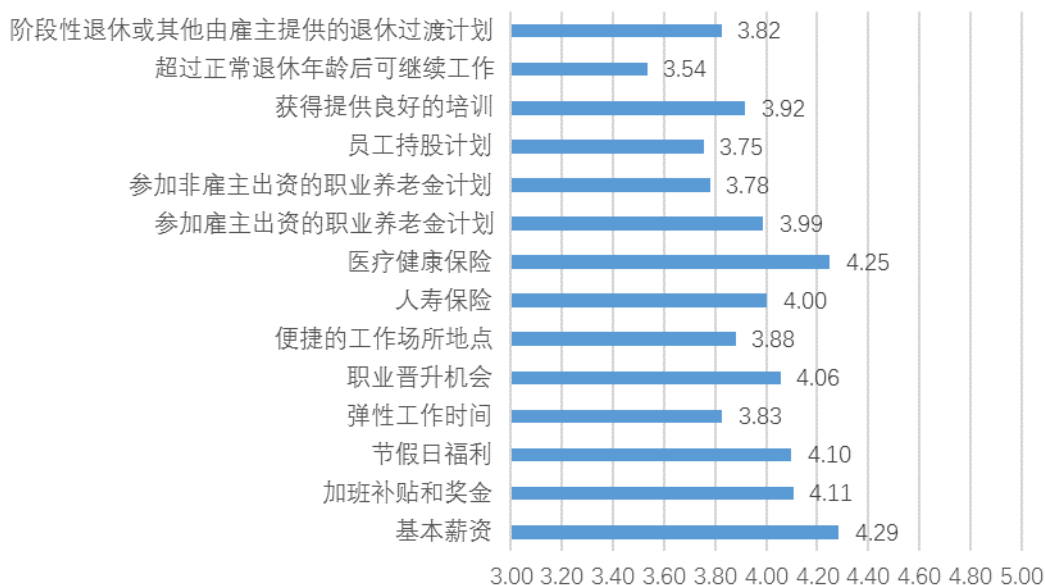


图 5.6 受访者认为未来择业时各项福利的重要程度的平均数（重要程度从低到高为 1-5 分）

可以看到,保险和退休福利方面,除“医疗健康保险”外,“人寿保险”和“参加雇主出资的职业养老金计划”的得分较高,反映出受访者对其重视程度较高。然而,根据本次调查,只有 44%和 49%的雇主为员工提供了上述两项福利,覆盖比例还不到一半。这表明雇主为员工提供的医疗和

养老保障覆盖范围尚不足，福利项目种类较为单一。未来，随着雇主和员工在养老保障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以人身保险、企业年金为主要内容的养老保障覆盖面会越来越广，形式也会更加多样。

居民退休准备规划不单是企业和居民自身的事情，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企业难以提供帮助时，保险公司可以以咨询服务和产品提供商的角色介入其中，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退休收入规划，促进保险产品的销售，形成一举多赢的局面。

6 专题研究

6.1 养老金融产品

6.1.1 疾病保障、年金回报、长期护理产品受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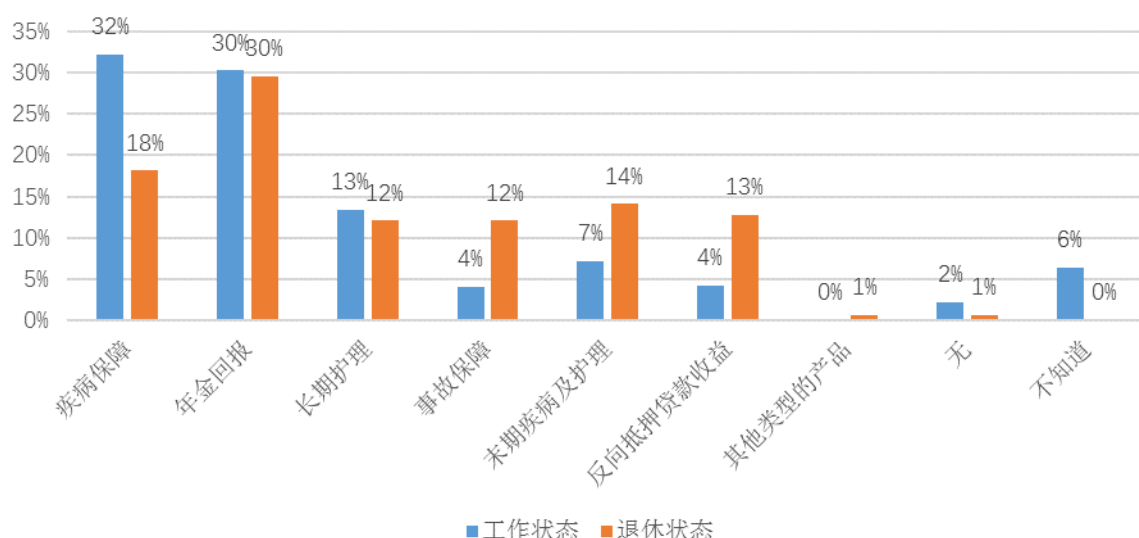


图 6.1 不同工作状态的人对养老产品的选择

当前，中国的个人理财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展并不完善，个人对保险产品的需求仍然主要集中在资产保值和疾病保障方面。调查显示：**工作状态的人群和退休状态的人群均青睐年金回报型和疾病保障型的养老产品，其中工作状态的人群对疾病保障的青睐程度显著高于退休状态人群。**而退休状态的人群对于末期疾病及护理、事故保障、反向抵押贷款收益的养老产品的青睐度均明显超过工作状态人群。

与前一年相比，处于工作状态的受访者对于各项产品的选择并没有出现太大差异。然而，处于退休状态的人员对于养老产品的态度有了较大转变，主要体现在对疾病保障的选择比例由 43% 变为 18%，出现大幅下降；年金回报的选择比例上升了 8 个百分点，达到 30%；而反向抵押贷款收益的选择比例上升了近 13%。该现象的出现可能是退休后人群重视生活质量改善的体现。近年来，国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医疗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异地就医本地报销、大病报销等政策逐渐落地实施，新农合在农村地区广泛推广。社会医疗保险服务覆盖面和覆盖程度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人们对疾病保障服务的需求。

从 2004 年起，我国开始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后，企业年金规模仍然不大，覆盖程度仍然不高。2015 年 10 月，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走向深入，职业年金计划成为强制性政策。结合调查结果我们认为，未来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年金市场将会有较大程度的发展。本次调查中反映出的退休人员态度的转变有助于政府在推动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发展方面的相关政策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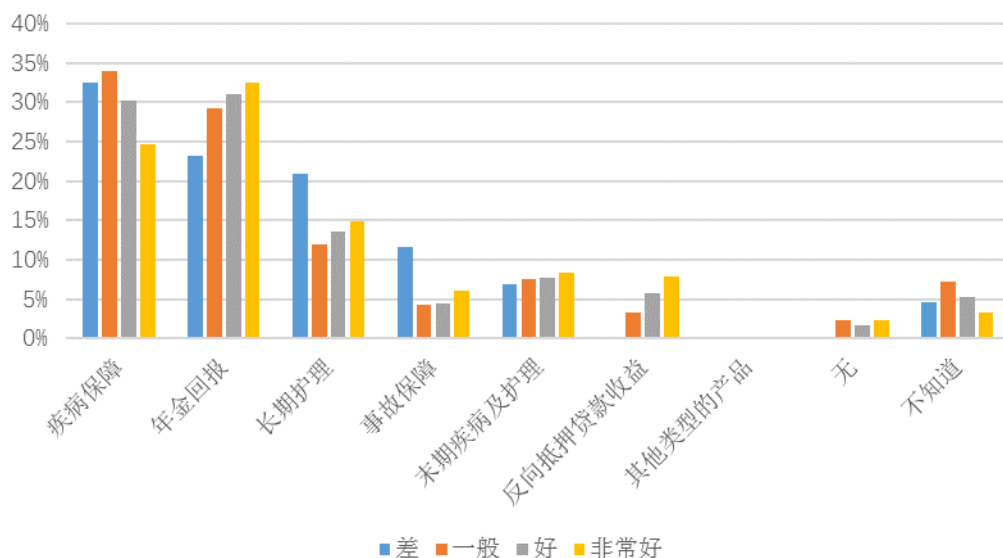


图 6.2 不同健康状况的人对养老产品的选择

从被调查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养老金融产品的选择的关系来看：相比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身体状况较好的人群对于疾病保障的青睐程度更低，对年金回报的青睐程度更高。其中，自我身体状况评价较差的人对于长期护理保障和事故保障的青睐程度要显著高于其他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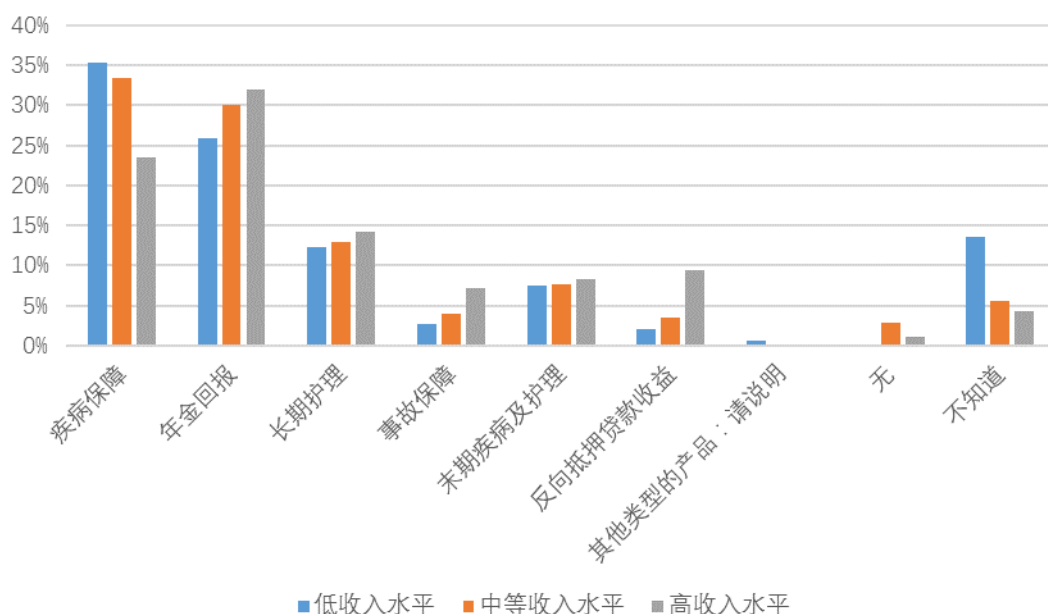


图 6.3 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养老产品的选择

从被调查者的收入水平来看，收入较高的人群更偏好年金回报、事故保障、反向抵押贷款收益等养老产品，而收入较低的人群偏好疾病保障产品，选择“不知道”的比例也更高。这一方面可能因为部分养老产品如反向抵押贷款收益等产品存在着一定的资金门槛，限制了低收入人群的选择；另一方面，结合低收入人群对自身健康状况相对偏低的评价，这一结果表明低收入人群对疾病保障等产品更为重视。

6.1.2 个人养老产品中医疗保险服务增值服务最受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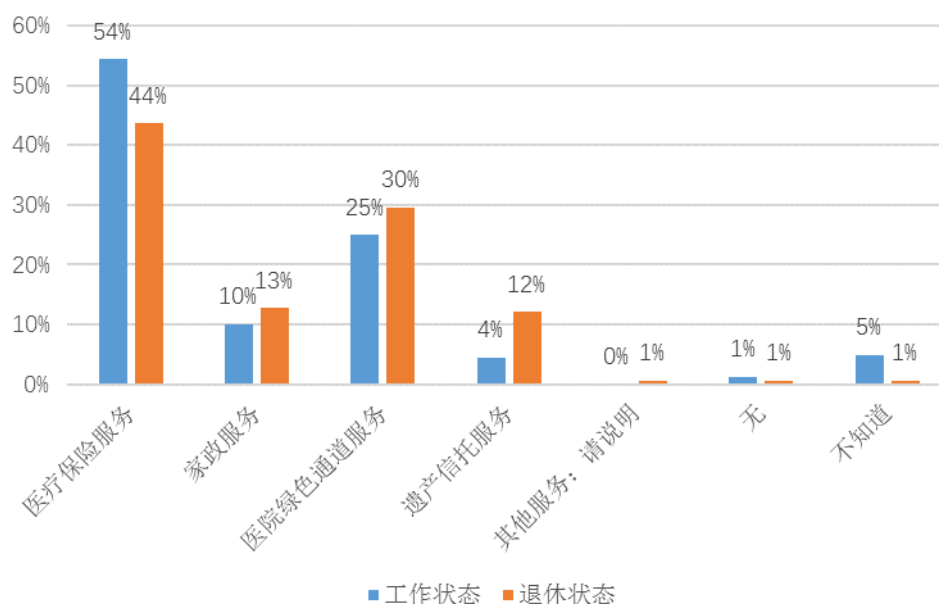


图 6.4 不同工作状态的人对养老金融产品中增值服务的选择

从图 6.4 可以看出：在所有增值服务项目中，工作状态的人群和退休状态的人群选择医疗保险服务的比例均最高。处于工作状态的人群相比处于退休状态人群对医疗保险服务的期待更高。商业医疗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体现着社会医疗保险服务的整体水平。与前一年相比，数据结果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退休状态人群对医疗保险服务需求的下降，而对医院绿色通道服务、遗产信托服务等方面的期待上升。这可能是由于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和覆盖深度的提升压缩了对商业医疗保险服务的需求，而退休人员是这场改革的直接亲历者，对于社会医疗保险变化的反应更为强烈和敏锐。

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及老龄化的加剧，退休状态人群对于嵌入养老金融产品中的医院绿色通道服务、家政服务等更为青睐。一方面，这体现出医疗行业、家政服务业等行业面临着需求快速增长和服务提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也预示着在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财务自主能力逐渐提升之后，退休者更加注重生活质量。

“新国十条”提出：“鼓励保险公司大力开发各类医疗、疾病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并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发展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提供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相结合的疾病预防、健康维护、慢性病管理等健康管理服务。”提供家政服务、护理服务等保障退休人群日常生活、医疗护理等增值服务的行业将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相应的政策支持。

6.2 健康评价

6.2.1 健康水平的评价与关注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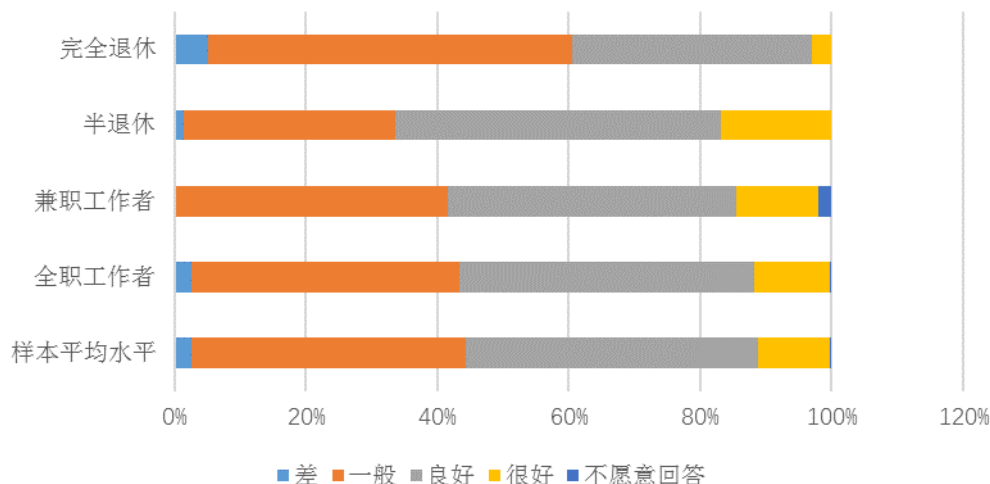


图 6.5 不同工作状态的人对自身健康水平的评价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自身身体状况一般或良好。半退休人员与兼职工作者对自身健康水平评价较高，完全退休人员对自身健康水平的评价比半退休人员显著偏低。从事兼职工作者可能认为自己在承担主要工作任务或学习任务时仍有余力，能够胜任其他兼职工作。这种“进入门槛”自动筛选过滤了那些对自身身体状况评价不高的人员。

相比于退休人员，选择仍然承担工作任务的半退休人员应当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更加良好的预期，对自身健康状况评价较低的年长者会减少自己的工作量或拒绝接受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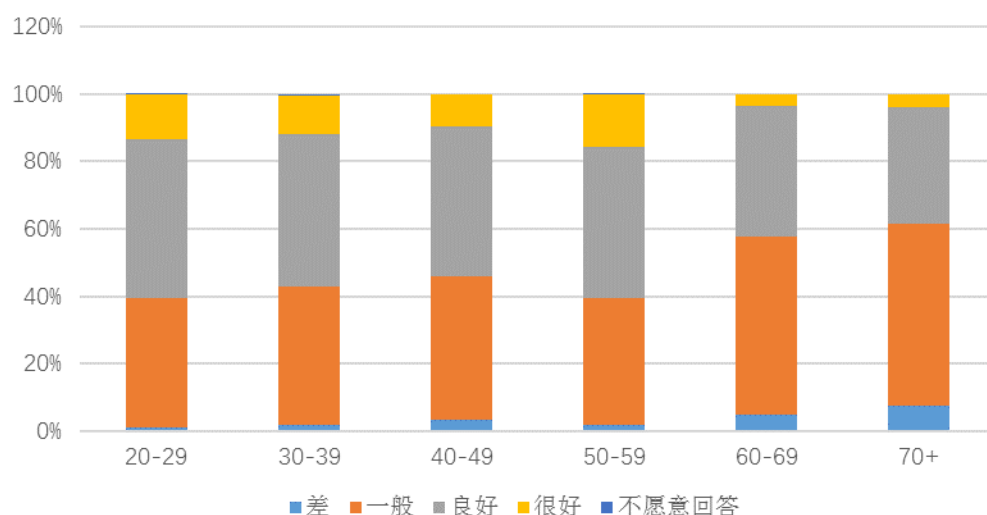


图 6.6 不同年龄段的人对自身健康水平的评价

总的来说，年龄越大者对自身健康水平的评价越低。生于 1946 年之前（70 岁以上）的受访者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的健康水平很好，认为健康水平较好的比例也大幅下降，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

况较差的比例也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达到 7%。值得注意的是 50-59 岁的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评价与 40-49 岁以及 60-69 岁相比更高。这可能与此年龄段人员刚刚结束繁忙的工作，自身处于更年期，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健康有关。此外，无论按照工作状态划分还是按照年龄段划分，男性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评价均高于女性，但差异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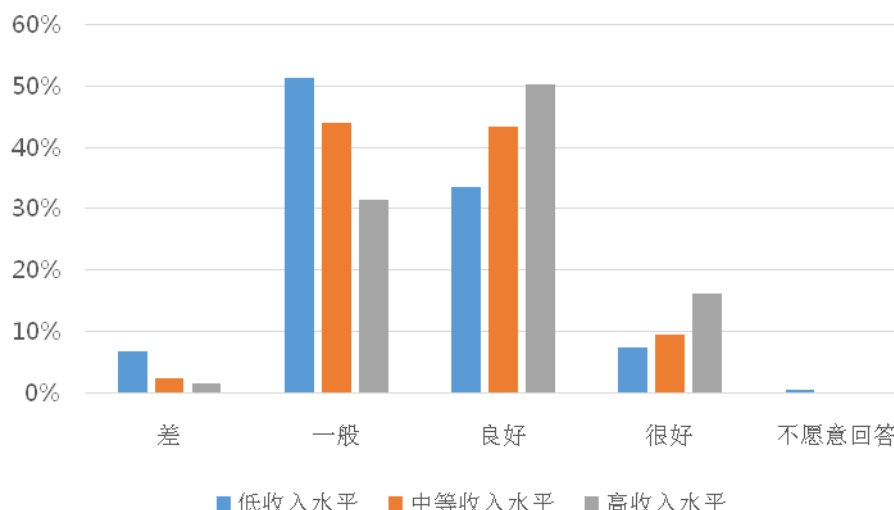


图 6.7 不同收入水平下健康状况的比较

总体来看，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对自身健康水平的评价都较低。结合调查中有关被调查者看待生活方式对将来健康状况的影响的数据，低收入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所接受的由工作环境提供的健康保护一般比其他人群弱，用于健康保护上的花费也低于其他人群。

6.2.2 对健康状况的关心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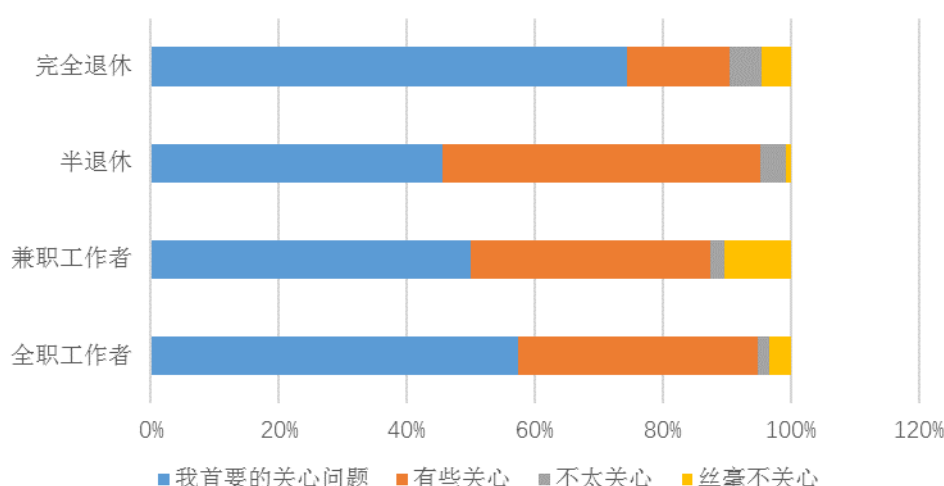


图 6.8 不同工作状态的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的关心程度

全职工作者比兼职工作者对健康的关注程度更高，半退休者对自身健康关注程度总体不如完全退休人员，同时完全退休人员中将健康问题列为首要问题的比例更高。

图 6.8 显示的调查结果为我国养老金融产品的提供商提供了营销方面的参考，对完全退休人员和全职工作者的健康服务营销往往更简单，更容易取得成效。在所有人中，兼职工作者对自身健

健康状况的关心程度最低，这可能是因为较差的健康项目覆盖、对精力的更高要求对寻求兼职工作的人群起到了一定筛选作用。数据还显示，半退休者对自身健康关注程度总体不如完全退休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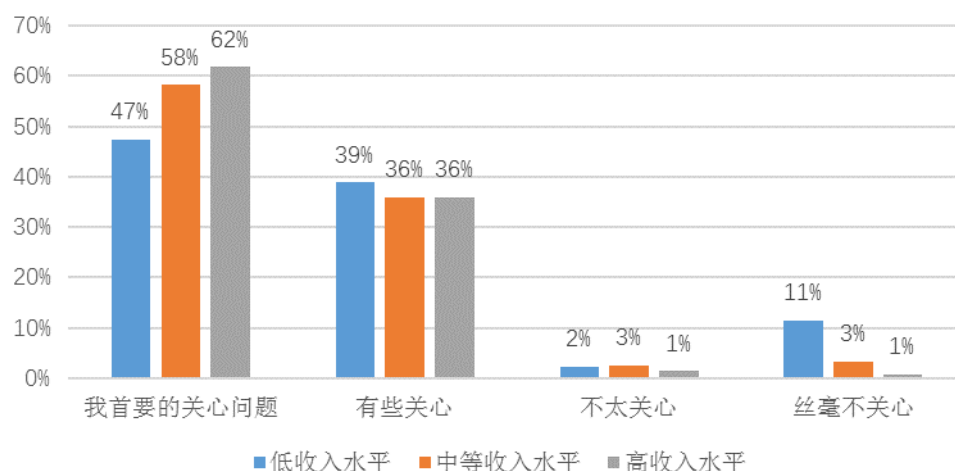


图 6.9 不同收入的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心程度

图 6.9 表明，低收入人群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心程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我们分别计算个人收入水平不同的人群对自身健康关心程度的综合指数，指数越高者说明对自身健康的关注程度越低。结果显示，低收入群体对自身健康状况关心程度的综合指数 1.78，明显高于中等收入人群的 1.51 以及高收入人群的 1.41。这表明关注健康状况、参与健康训练的意识与能力同收入水平有一定关系。

为了区分和比较男性和女性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心程度，我们分别按照年龄对男性和女性对比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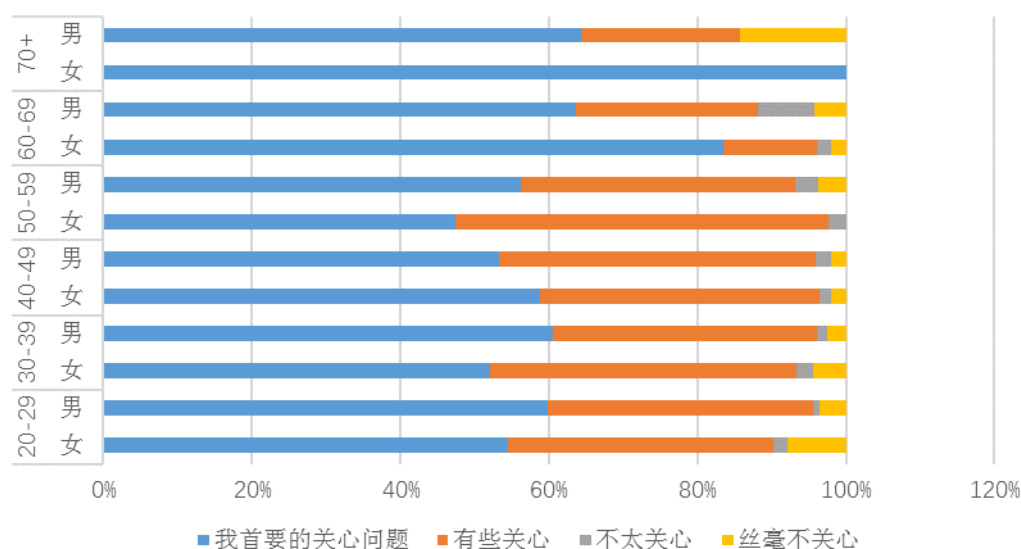


图 6.10 男性和女性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心程度

从图 6.10 中我们看到，青年男性比青年女性更关心健康问题，老年女性对健康的关注程度显著高于老年男性。从平均指数上看，随着年龄增长，女性对健康不关心的比例在下降，而男性对健康不关心的比例在上升。值得注意的是，70 岁以上男性对自身健康状况不关心的比例显著上升。因此，对年长女性进行健康保险宣传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效果。

6.2.3 工作和生活中的健康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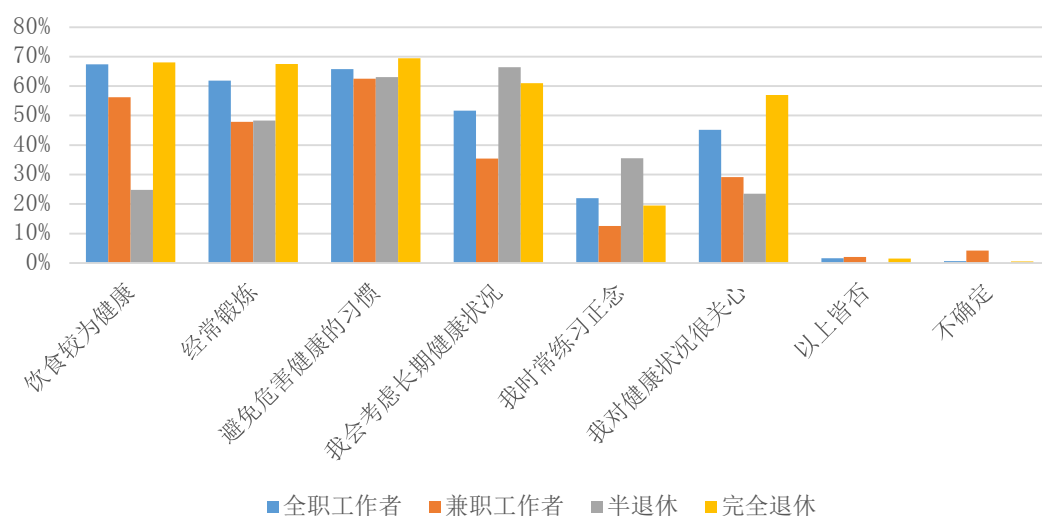


图 6.11 不同工作状态人群的健康生活习惯

数据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拥有健康饮食、经常锻炼以及避免危害健康行为的健康生活习惯。此外，兼职工作者的健康生活习惯普遍比全职工作者和完全退休人员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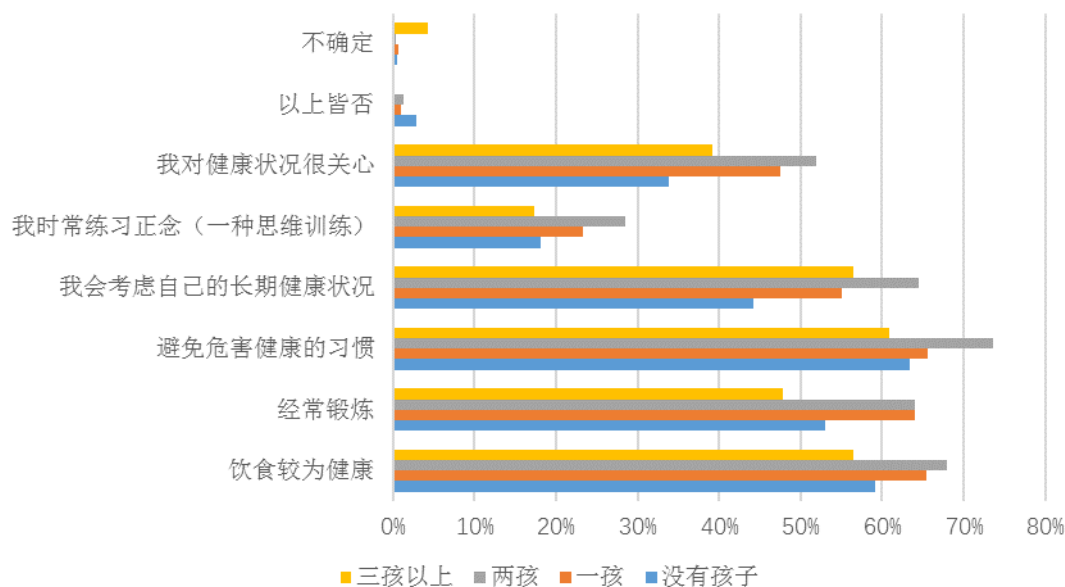


图 6.12 生育子女数量不同的人群的健康生活习惯

如果按照生育孩童多寡来划分人群，则生育两孩的人群的健康行为习惯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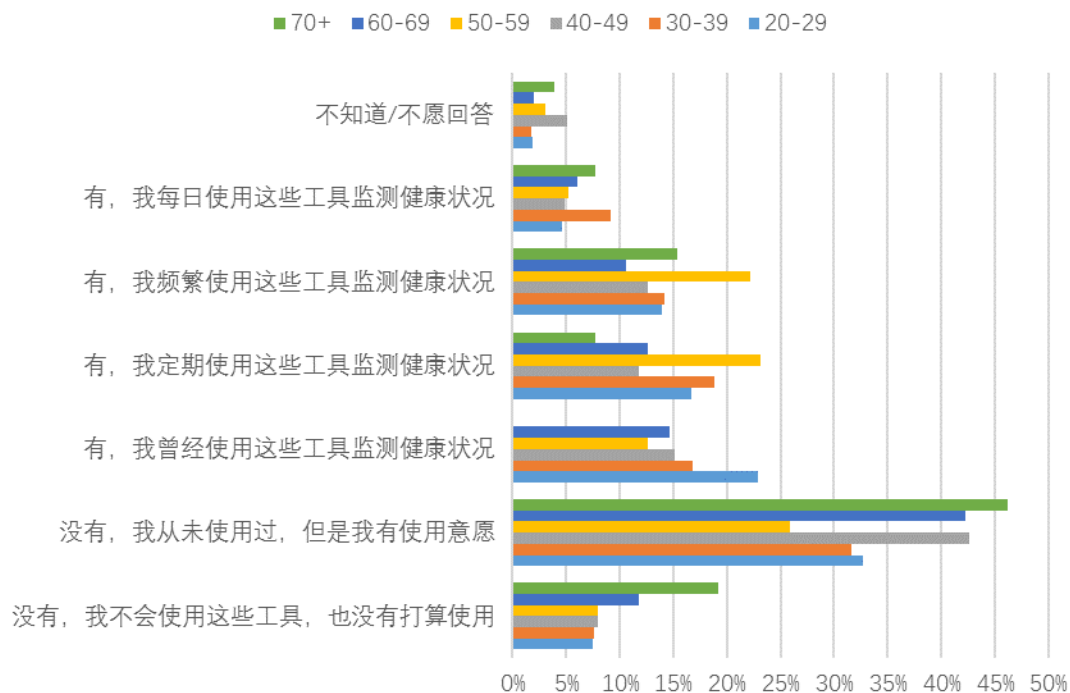


图 6.13 使用智能设备监测健康的情况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使用智能设备监测健康的经验，但是有此意愿。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智能设备的接受程度越低，使用比例也越低。另外，50 岁到 59 岁以及 30 岁到 39 岁年龄段受访者使用智能设备监测健康的频率较高，女性使用智能设备监测健康的比例比男性高。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电信网络的逐步发展成熟，物联网发展势头渐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电信运营商对此也提供了相应支持。在 2017 年 4 月发布的《电信网编号计划（2017 版）》中，140-144 号段全部被分配用于位长 13 位的物联网网号，物联网应用进入国家规范化的实质性阶段。年末，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已相继布局运行 NB-LoT 网络。用于健康监测和健康服务的可穿戴设备未来有望通过窄带网络直接传输健康数据，方便佩戴者和医疗机构采集和分析健康数据。与此同时，APPLE WATCH、小米手环等智能产品已经为大部分消费者所接受，2016 年智能产品的销量继续保持着较大幅度上涨。

据调查，目前中国城市的手机覆盖率超过 97%，72% 的中国城市消费者都拥有智能手机。与此同时，Keep 等一系列以利用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为载体监测健康、督促运动的应用程序逐渐显露头角，受到部分青年人的欢迎。向年轻人推广监测健康的智能设备一方面能够推动年轻人的健康预警，提升健康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保险公司对于客户健康水平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进行差异化定价，推出差异化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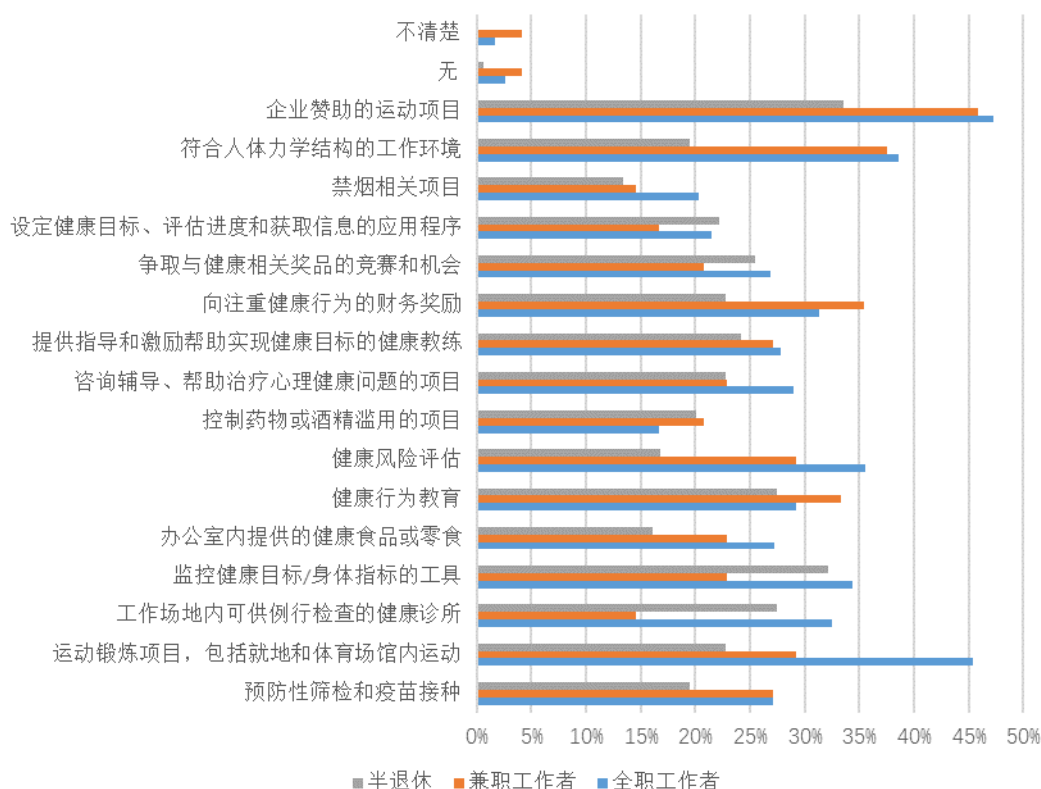


图 6.14 企业在工作场所为员工提供的健康福利项目

对比不同的健康项目，覆盖比例最高的是由企业赞助的运动比赛项目，其次是健康风险评估和工作环境的人性化。从受访者的工作状态看，全职工作者、兼职工作者、半退休人员受健康项目的覆盖水平依次下降。另外，男性和女性受健康项目覆盖的差别不大。针对酗酒和药物滥用的项目以及在工作场所内提供食物的项目对男性的覆盖比例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与女性的生活偏好和生活习惯不同有关。

对企业来说，赞助慢跑、骑自行车等运动项目是采用最广泛的一种健康项目。其具有一定的宣传代表性，举办活动的要求也不高。健康风险评估和工作环境的人性化改造居于其次，也是实施较多的健康项目。对药物滥用和酗酒的管控则是采用较少的健康福利项目。

6.2.4 对生活方式直接影响未来健康的认可度

为了了解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如何看待生活方式对未来健康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如下的调查，结果见图 6.15。相比于未退休人员，退休人员更加认同生活方式会对未来的健康状况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群，55 至 64 岁年龄段人群对于生活方式影响未来健康的说法认可度有较明显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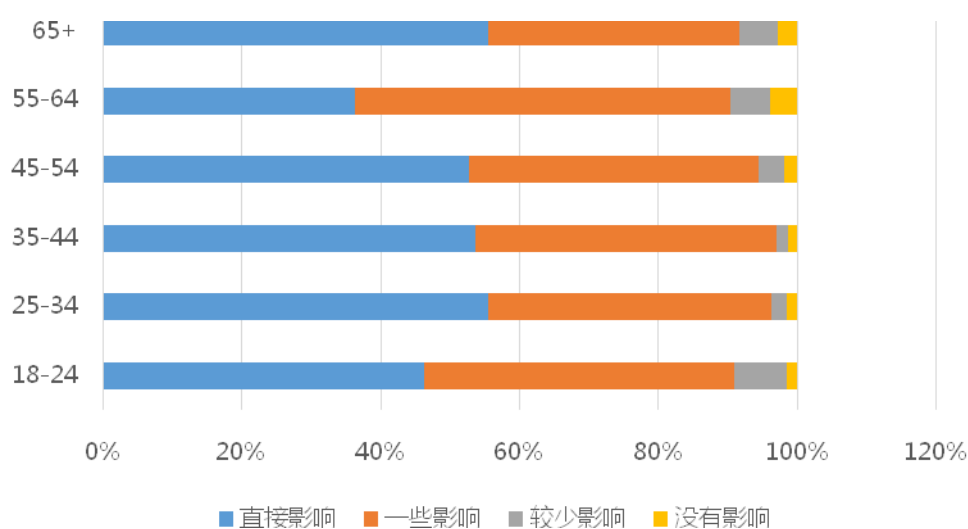


图 6.15 不同年龄段的人看待生活方式对未来健康的影响

6.3 长期护理保险

6.3.1 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根据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数据，2008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人中度以上失能率为 12.3%。而《老年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后的照料方式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老年人口的失能率为 11.2%，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为 17.22 岁，平均失能存活时间为 2.53 年。

随着预期寿命的不断提升，未来失能老人的规模将不断扩大，老年人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不仅导致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下降，也增加了老年人生活护理费用，给老年人带来一定的支出压力。根据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数据，80 岁以上的调查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子女支持，拥有退休金的人数比例不足四分之一，有一部分人的主要生活来源甚至仍然来自自身的工作。这预示着向不同年龄段推广长期护理保险所面对的“投保人”不同。

长期以来，中国延续着家庭式养老的模式。家里的子女亲戚承担着照料失能老人的支出和任务。但是，如今女性就业人数攀升，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得家庭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传统家庭中“女主内”“子女照顾老人”的护理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从国际上来看，美国通过 1996 年出台的《联邦健康保险可转移与说明责任法案》等法律法规推动保险公司、政府机构和医院之间的合作，建立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化解失能老人长期护理的财务风险。德国、日本、韩国等则通过建立起强制性的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高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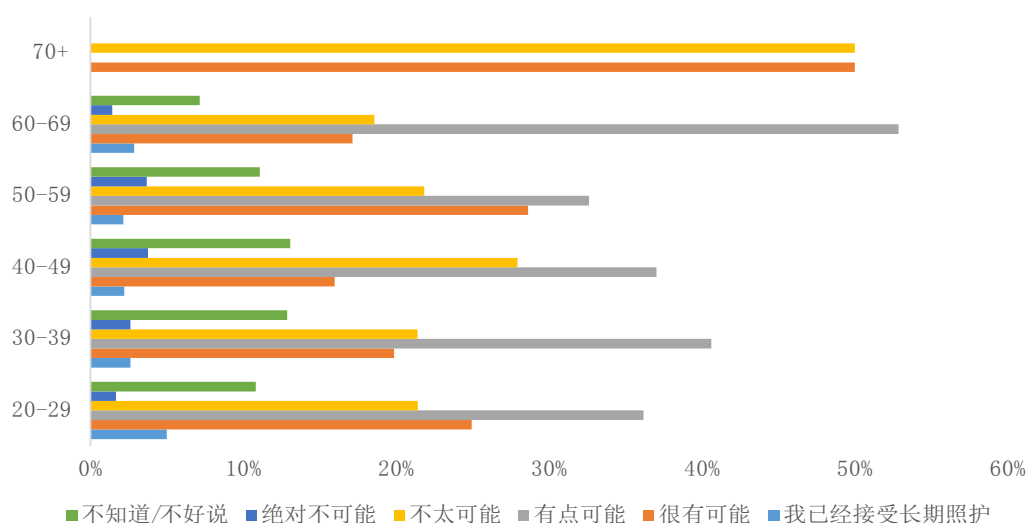


图 6.16 不同年龄的人选择长期护理的可能性

长期护理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新型服务，当前的需求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调查结果显示，20-69岁人群中，认为自己有点可能需要长期护理的比例最大。值得注意的是，40岁之前，随着年龄增加，认为自己不太需要接受长期护理的比例在增长。在40岁以后，随着年龄增加，觉得自己有可能或已经接受长期护理的比例不断增加。结合对接受长期护理障碍的调查数据，我们认为在40岁前后出现的对于接受长期护理态度的变化可能与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子女工作状态变化有关。当子女踏入社会，家庭经济压力逐渐减小，受访者表示接受长期护理的可能性有一定的提升。

以当前人口死亡率和增长的预期寿命计算，20世纪50-60年代的婴儿潮将带来2030年以后高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到2050年中国8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将达到1亿人以上。建国初期的婴儿潮与改革开放时期的计划生育影响效果叠加将导致这一时期中国将面临极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2030年到205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将达到60%至70%，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到40%至50%。中国老年人不仅面临着膝下少子的问题，还面临着疾病的威胁。2015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率为51.80%，这一数值为全人群的4.04倍。65岁以上老年人人均患有2至3种疾病，49%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失能。随着失去生活自理能立的老年人口增多，社会老年护理服务的需求必将相应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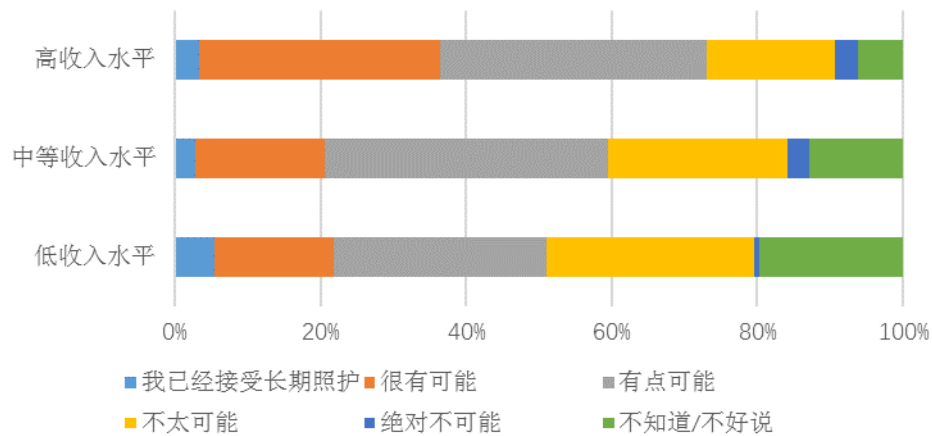


图 6.17 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选择长期护理的可能性

调查结果表明，高收入人群选择长期护理的可能性要高于低收入人群，表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可能是一个带有收入门槛的保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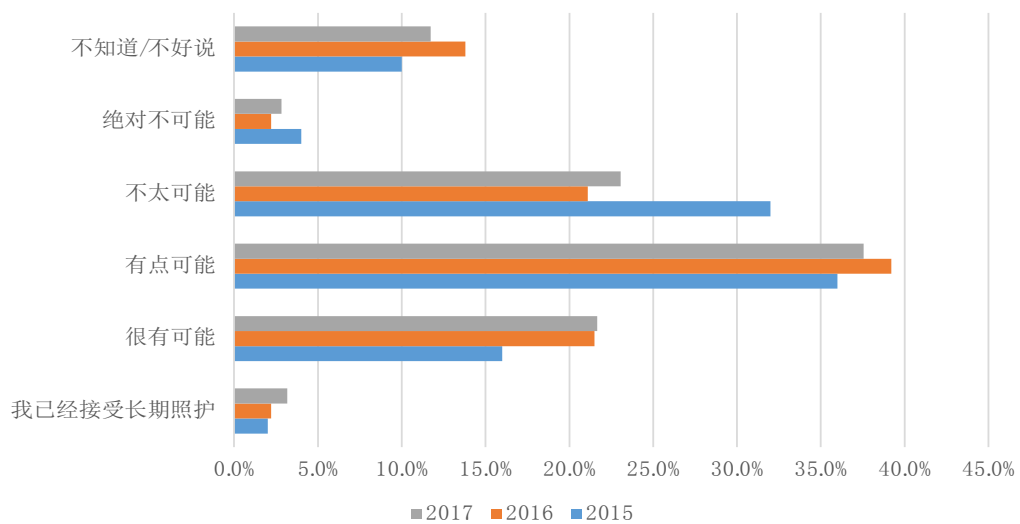


图 6.18 2017 年与 2015 年、2016 年退休后需要长期护理的可能性的对比

调查结果表明，2017 年的被调查者中正在接受或者认为自己有可能接受长期照护的比例达到 62.4%，2016 年这一数字为 62.9%，2015 年为 54%。这表明长期照护的接受程度有了较好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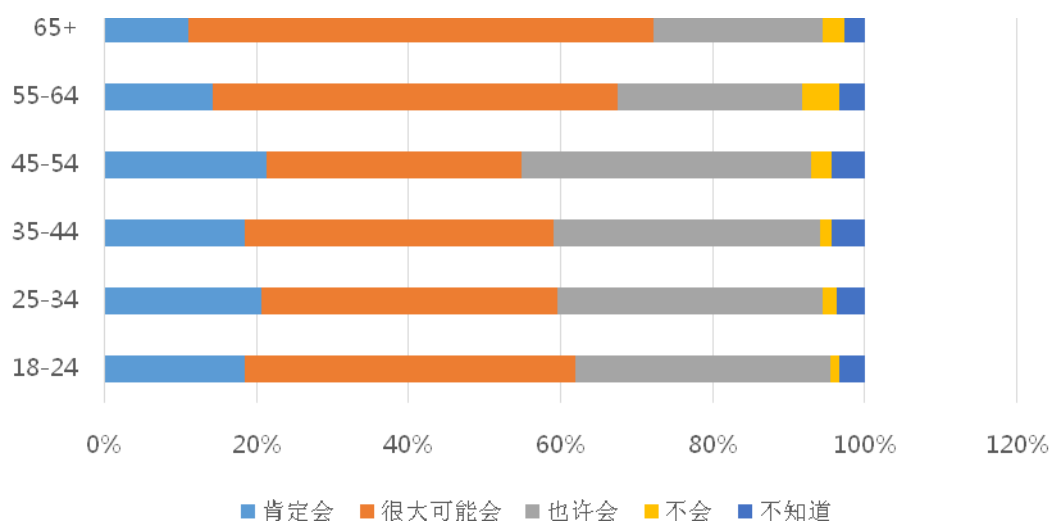


图 6.19 购买可以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或经济补偿的保险产品的意愿

图 6.19 表明，约两成的人群肯定会购买该类保险产品，超过九成的人群不拒绝购买。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增长，55 岁以上人群中选择“肯定会”“也许会”的比例下降，选择“很大可能会”的比例有了很大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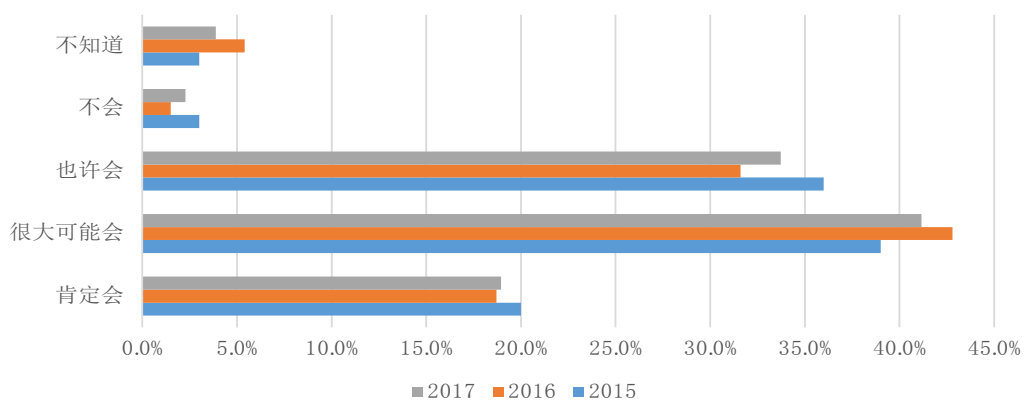


图 6.20 2017 年与 2015 年、2016 年对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或经济补偿的保险产品的购买意愿对比
与 2015 年和 2016 年持平，2017 年倾向于购买长期照护保险产品的比例为 94%。

6.3.2 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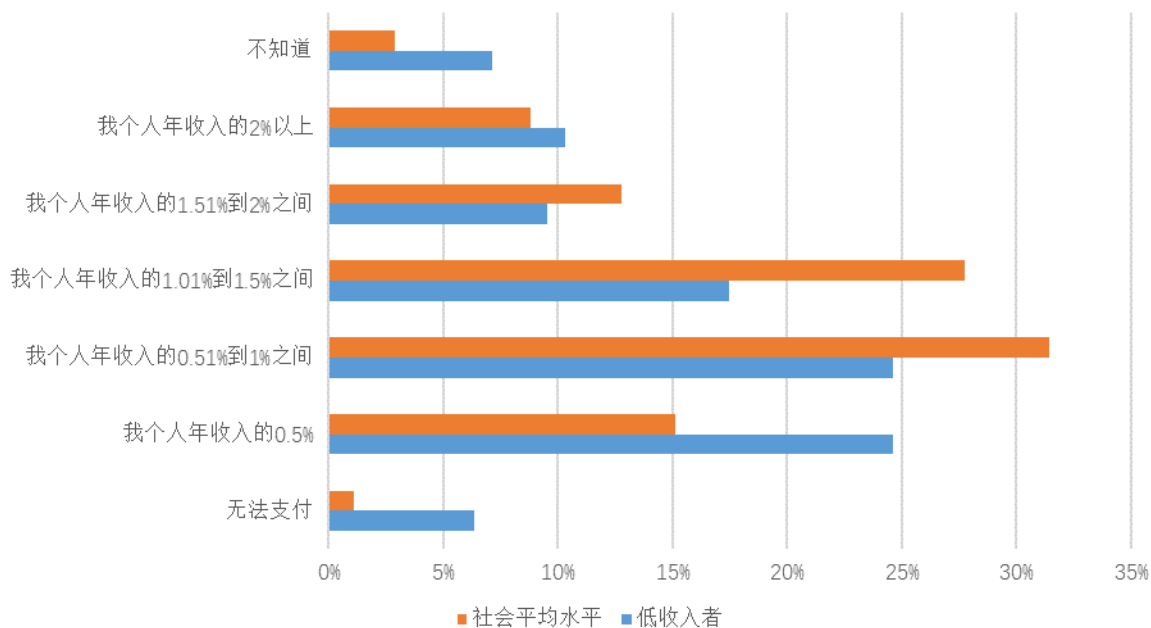


图 6.21 低收入者愿意为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的费用占年收入比例

调查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低收入群体为保险产品支付的年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保费水平高和政府参与度弱对长期护理保险市场构成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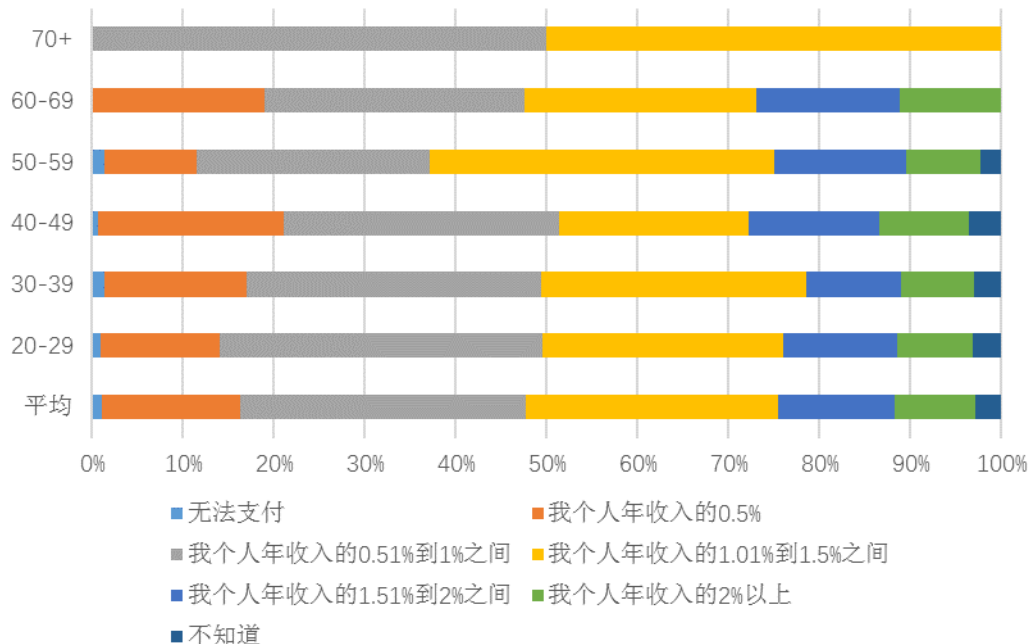


图 6.22 能够为购买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的年收入比例

调查结果表明，除 50-59 岁以外人群中，选择个人年收入 0.51%到 1%之间作为长期护理保险支出的受访者的比例最大；50-59 岁人群选择个人年收入 1.01%到 1.5%之间作为长期护理保险支出的比例最大。而在 2016 年的调查结果中，除 20-39 岁以外，选择个人年收入 1.01%到 1.5%之间作为

长期护理保险支出的比例最大，20-39 岁人群选择个人年收入 0.51%到 1%之间作为长期护理保险支出的比例最大，说明人们对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意愿有所下降。

6.3.3 阻碍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因素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中国的家庭结构逐渐向一家三口的小型化方向演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平均每户家庭的人口为 3.1 人。近年来，空巢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等家庭组成形式逐渐增多。家庭规模趋小使得传统的家庭式护理变得困难，子女面对着抚育子女和抚养老人的巨大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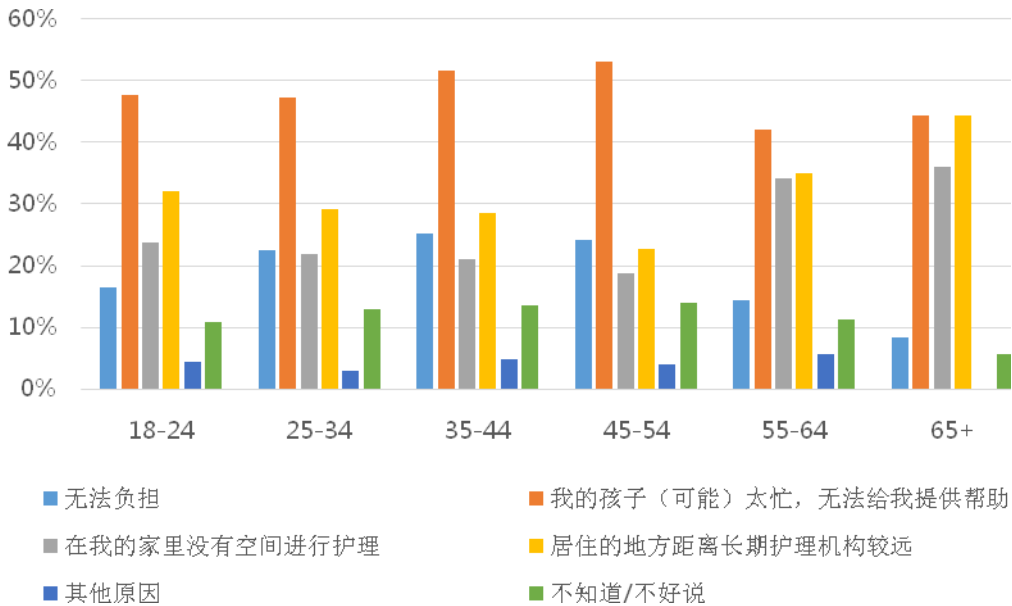


图 6.23 不同年龄段对接受长期护理的主要障碍的认知

图 6.23 表明，退休后接受长期护理的最主要障碍是我的孩子（可能）太忙，无法给我提供帮助，其次是无法负担。《2016 中国长期护理调研报告》显示中国 7%的家庭有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实际接受的护理时间中的绝大部分是由家庭成员提供的。79.9%家庭的主要护理服务提供者配偶、子女或亲戚，第三方服务占比仅为 21.1%。此外，在 53%的家庭中，家庭成员提供的护理时间占比大于 50%。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当前中国老年人群的长期护理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依靠子女。

居于其次的因素是居住地与长期护理机构距离较远。这体现出现实中提供长期护理相关服务的医疗健康服务机构仍然十分缺乏的现状。如何将长期护理推向民间、实现社区化管理，是接下来中国仍然需要解决的问题。

年龄小于 45 岁的人群中，越年长者认为接受长期护理的最主要障碍是“无法负担经济费用”以及“担心子女太忙，无法提供帮助”的比例更高。而在年龄大于 45 岁的人群中，越年长者认为接受长期护理的最主要障碍是“无法负担经济费用”以及“担心子女太忙，无法提供帮助”的比例更低。在 45 岁以上人群当中，与长期护理实施相关的具体操作问题成为阻碍长期护理的主要因素，如长期护理机构与居住地较远、家庭内可供进行护理的空间狭小。且选择这两项原因的比例随着被调查者年龄的增加有增大的趋势。提高长期护理机构的覆盖能力和业务水平，推动保险和长期护理机构的对接有助于增强长期护理保险的业务推广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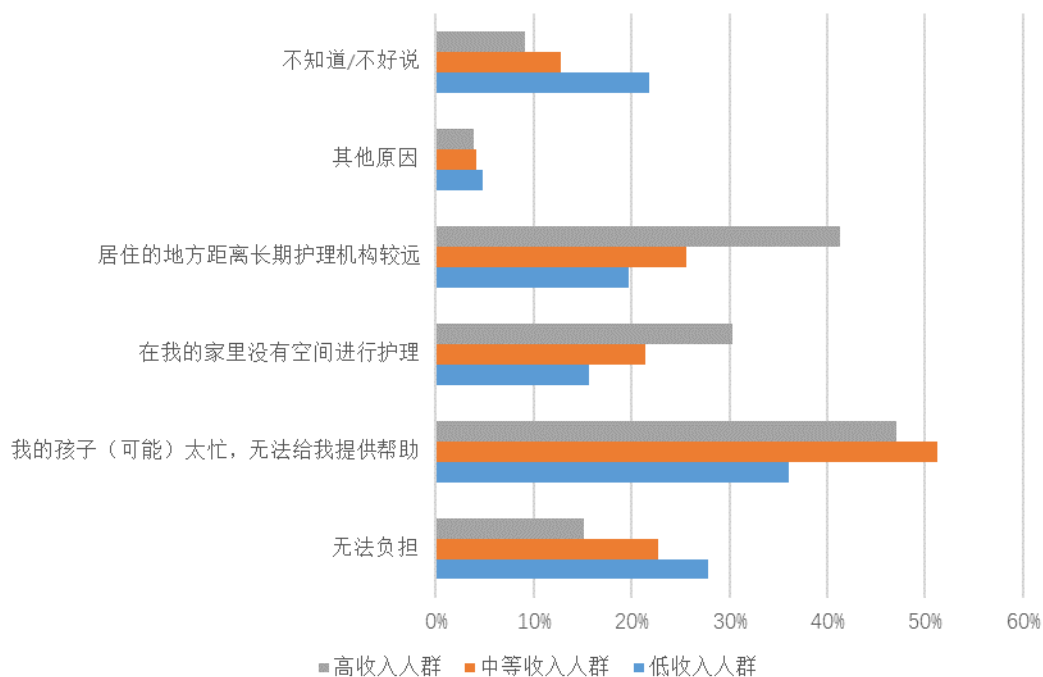


图 6.24 不同收入的受访者对退休后接受长期护理的主要障碍的认知

不同于 2016 年的调查结果，2017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低收入群体认为“子女太忙，无法提供帮助”是阻碍退休后接受长期护理的主要因素，而非之前结果显示的“无法负担”。经济压力对长期护理的影响因素越来越低，这可能与退休金的逐渐普及有关，老年人的财务自主能力在逐步增强。此外，个体收入较高者选择“子女压力太大”“家内缺乏护理空间”“远离长期护理机构”等选项的比例更高，而选择无力承担的比例更少。这表明，高收入人群相对于其他人群更加看重实施长期护理面临的现实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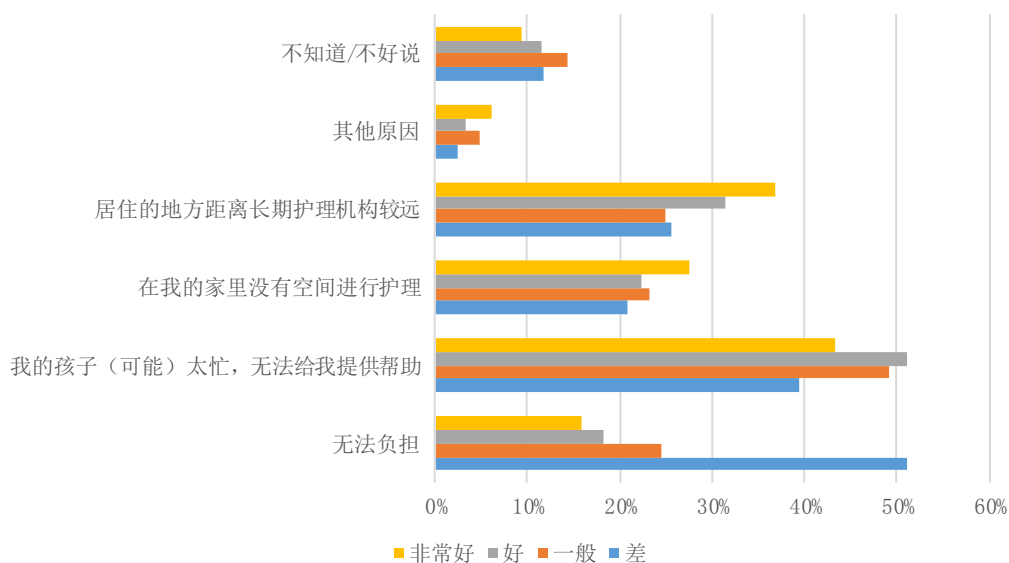


图 6.25 不同健康状况的受访者对接受长期护理主要障碍的认识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身体健康较差的人群来说,无法负担成为退休后接受长期护理的主要障碍。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选择“无法负担”的比例达到 51%, 远高于总体 21%的水平。且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人群选择“无法负担”的比例越低, 这表明身体健康状况与被调查者自身对长期护理的费用了解程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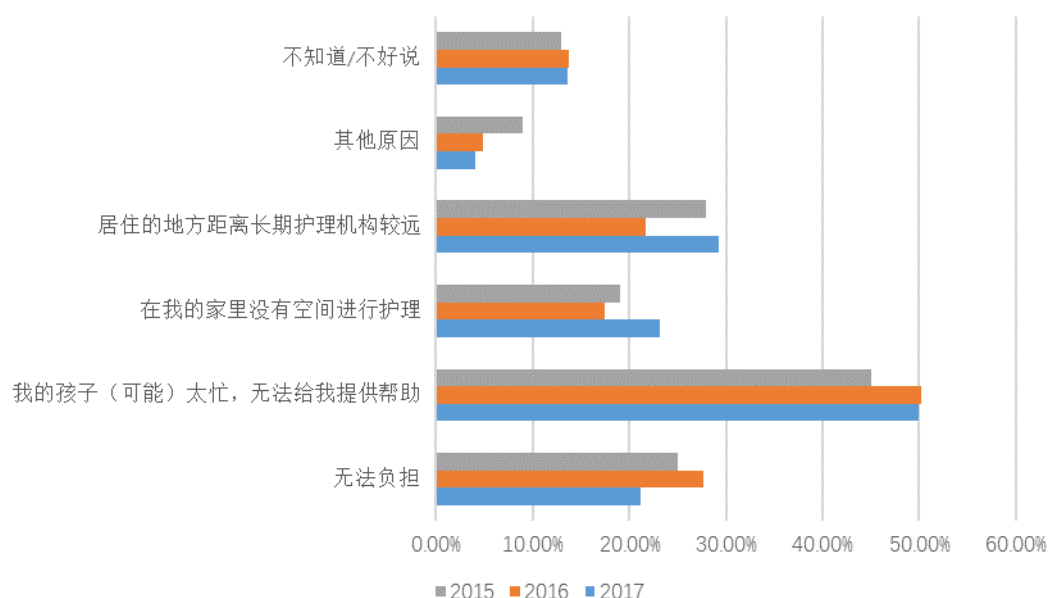


图 6.26 2017 年、2015 年、2016 年调查中受访者对接受长期护理主要障碍的认知对比

相比于 2016 年, 2017 年对接受长期护理主要障碍的调查结果表明, 选择“居住地距离长期护理机构较远”的比例上升了 7.5%, 选择“家里没有空间进行护理”的比例上升了 5.8%。这表明人们越来越看重长期护理机构的缺乏以及长期护理实施困难等操作层面的问题。总的来看, 三年来, “孩子太忙”和“无法负担”、“居住地距离长期护理机构较远”成为接受长期照护的最主要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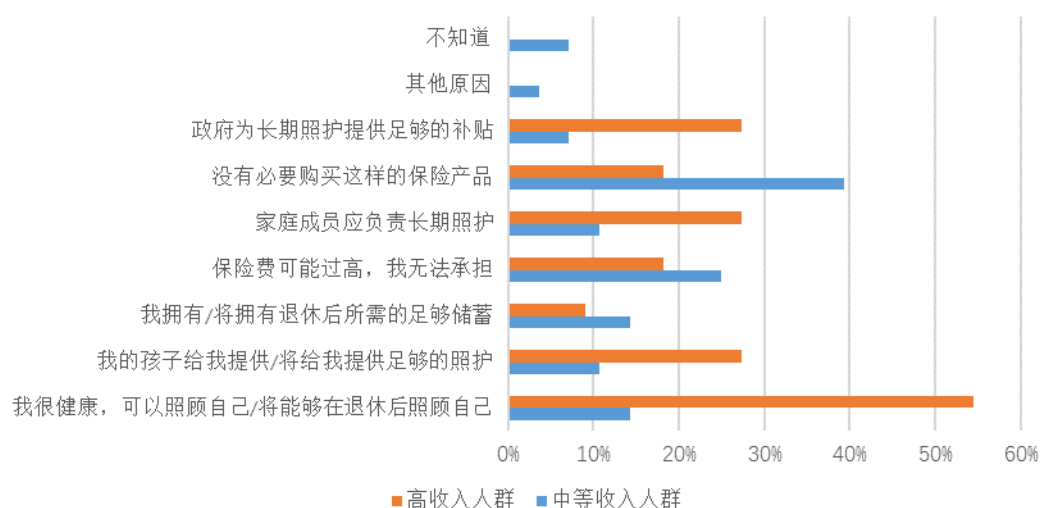


图 6.27 不考虑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原因

调查结果表明，高收入群体可能有更多的养老保障，不购买此类产品的因素主要是认为没有必要购买。而中等收入人群购买此类长期护理保险的主要障碍因素是必要性的缺乏以及资金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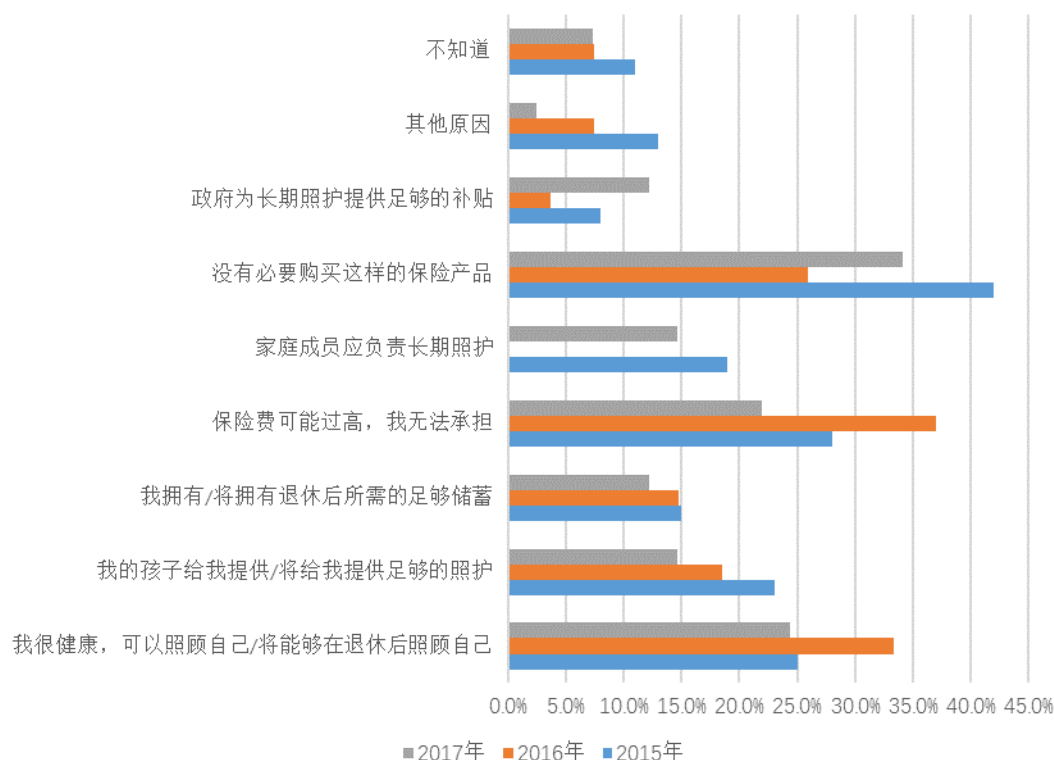


图 6.28 2017 年与 2015 年、2016 年不考虑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原因对比

人们不考虑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原因集中于对购买这一保险的必要性的认知。2017 年的调查问卷不限定勾选原因的数量，因此结果并不能反映出每一项原因的重要程度。在调查结果中我们发现，不购买这种产品的最大原因是认为没有必要购买长期护理保险，其次是认为“自己很健康，可以照顾自己”、“无法承担保险费用”等。

随着医疗费用上涨，护理服务的成本也有所增加。长寿意味着人们可以享受更多的晚年生活，但年轻时的积蓄往往不足以支付这种更长时间的开支，并且长寿会带来很多医疗费用开支。在目前中国的养老金体系还不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健全的形势下，养老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形式。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观念的转变，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依靠子女养老会使子女面临很大的负担，尤其是在发达城市，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生活成本更加重了子女的负担。这些都增加了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

发展长期护理保险的关键在于改变人们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认知。调查结果显示，很多人认为家庭成员应该负责长期照顾，而这也是阻碍长期护理事业推行的主要原因。与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不同，长期护理保险采用风险评估的手段，结合医疗护理机构，用市场化的方式让被保险人接受外来人员的护理或者到专门护理机构接受护理服务。一方面，老年人认为这种长期护理方式缺乏亲情，缺乏人性关怀；另一方面，子女也担心将老人送到护理机构会被人们看作不孝敬，而更多的人也觉得把老人送到自己无法看管照顾的护理机构或养老院，在心理上会让自己感到愧疚。

此外，还有一部分受访者认为保险费过高，护理服务应当由政府提供足够的补贴。老年人对政府的惯性依赖意识较强，这也阻碍了人们对长期护理保险乃至整个商业医疗保险的认识。目前我国

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保费较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缺乏健康保险方面的精算数据，风险控制技术落后等。

6.4 金融素养

退休准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退休规划，而退休规划的重要内容又是退休储蓄规划。如何作出科学合理的退休储蓄规划，和消费者本身的金融素养密切相关。金融素养指个人进行金融决策的能力，包括如何进行储蓄、投资、借款等金融交易行为，以及如何进行退休规划等。为了提高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能力，我们认为应该大力提高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

6.4.1 较高的金融素养有利于提高居民的退休准备

在本次调研中，尽管没有直接测试金融素养的问题，但其中的部分问题可以体现居民的金融素养。如在第 66 个问题中问道：“当选择如何为退休进行储蓄时，您使用或会使用以下哪些信息和**建议来源（如有）**？”选项有：**银行顾问、专业理财顾问、保险代理人、个人理财网站/在线退休计划工具、个人理财媒体、政府网站、我的雇主、会计师、律师、退休计划提供方的网站、理财服务提供方的网站、工会/贸易或专业机构、朋友或家人、以上皆否**。这些选项可以多选。我们构造了 13 个 0-1 变量，并以退休准备指数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选择**银行顾问、个人理财媒体、会计师、律师**对退休准备指数有显著正向影响，选择**朋友或家人**对退休准备有显著负向影响。常识告诉我们，消费者在进行退休储蓄决策时，如果是向银行顾问、会计师及律师寻求建议，说明其具备较高的金融素养；如果只依靠朋友或家人的建议，则说明其不具有较强的金融意识，金融素养也不高。

6.4.2 大力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素养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金融素养与退休准备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探索如何通过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来帮助其作好退休准备。另外，提高金融素养还可以帮助消费者提高财务决策能力，有利于其家庭财富的积累，可以有更多的积蓄用于养老。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都非常重视对各层次居民的金融教育，鼓励人们为退休后的生活积累足够的金融资产，包括根据生命周期资产组合的理念，劝说老年人购买并持有一定数量的年金保险以及相对低风险的资产组合；包括对当前和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分析，以方便老年人选择推迟退休、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调整投资计划、削减旅游休闲项目，或应适当增加消费、扩大开支等。

在我国由于“养儿防老”的传统意识根深蒂固，通过个人退休规划筹集积累资金供退休生活之用对广大居民还比较陌生，特别是即将面临退休的中老年人群。另一方面，年轻人群中有相当部分对养老问题态度淡漠，并未意识到养老问题的紧迫性。这就需要政府、社区等相关部门针对普通老百姓进行金融理财等方面的金融教育，增强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养老意识，加以合理引导，结合个人实际，通过退休规划方式，合理配置资产以实现退休理财目标。

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方面他们的金融素养相对欠缺，另一方面却无法正确评估自身的金融素养水平，致使他们盲目进行金融投资，使老年人遭到欺诈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要提高老年人的金融素养首先是要让老年人认识到自身金融知识的不足，从而激发他们学习金融知识的热情。

老年人一般都退休在家，社区居委会在老年人金融教育中应起到主导作用。社区可以定期为老年人举办一些金融方面的讲座，此外，还应该建立社会公众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方面的工作岗位，并由专人负责该项工作的策划、推广、监测、反馈以及考核评估，促进金融普及工作的有序进行，取得实质成效。对金融机构而言，不但应该丰富金融服务品种，提高金融服务质量，还应该不断进行创新，多角度、多形式地为公众提供更优质、更有效的金融知识服务。广大金融机构应定期深入企业、社区、街道等，以生动有趣、寓教于乐的方式为老年人介绍银行卡、信用卡、银行理财、基金、保险、个人贷款、自助设备、电子银行业务及其他金融知识，帮助他们通过学习、使用金融工具为家庭理财发挥作用，使他们能够主动资源的学习和普及金融理财知识。

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是一项可以造福全社会的活动，应积极推动相关部门、教育机构、新闻媒体、专业组织和居民社区等各方面共同参与，并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开展广泛的沟通与协作，使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因此，要运用群众都能理解语言和方式，大力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建设和谐金融环境。

6.5 智慧养老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模式主要有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日趋减弱，机构养老因其入住成本高、老人接纳程度低而不能满足广大老年人多层次的养老需要，社区养老也存在着社会服务资源利用率不高、服务人力资源供给不足、服务信息不流畅等问题。

6.5.1 智慧养老的概念

智慧养老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是传统养老服务与互联网高度融合的新兴养老方式。智慧养老的本质是借助互联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物联网技术，实现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智慧养老的载体是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通过平台实现对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智慧养老”是对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和老年服务技术的综合运用，是没有围墙的虚拟养老院，是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健康、舒适、便捷服务的现代化养老模式。

“智慧养老”的核心理念是在对老年人生活及精神需求区分的基础上，运用智能设备实时传递需求与风险信号，达到需求识别、风险预警和即时服务的目的。

现代养老服务产业不仅局限于医疗护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传统领域，在“互联网+”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探索智慧养老服务，养老服务正在向各个领域延伸。老年地产项目、老年金融项目、老年旅游项目、老年理疗项目等层出不穷，“互联网+”养老产业链逐渐形成。养老服务产业正朝着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6.5.2 发展智慧养老的建议

1、养老服务数据库建设

数据库是养老服务系统运营的核心。因此，社区养老服务管理中心需要通过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收集大量的养老需求信息、服务信息、供应者信息等，运用计算机系统将海量的零碎信息分类整理，形成系统化的养老服务的需求与供给数据库。运用云技术分析并挖掘数据库信息，通过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为老人提供可靠的养老解决方案。从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分析到应用的过程，形成智慧养老的大数据生态链。

2、智能软硬件设备和产品的研发

智能设备与产品是智慧养老模式运行的载体。智能装备和产品的制造企业需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养老”的运作模式，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开发各种适合现代养老服务的智能设备。例如，智能手机、智能洗澡机、智能电视机、智能血糖仪、智能血压计、智能跑步机等设备，为老年人享受高品质养老服务奠定硬件基础。由于老年人观念保守、使用互联网产品的知识和能力不够，加之对互联网智能产品的风险预期较大，导致智慧养老的开展比较艰难。因此，企业要简化智能养老设备的复杂程度，降低互联网产品的操作难度，提高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认可度。

6.6 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

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分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大支柱。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属于养老保险的第三支柱，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在税前列支保费，在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有效地减轻了人们的税负。有关数据显示，**19%的受访者希望能将一次性获得的养老金投入新的延税投资工具。**

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与养老保险金目标替代率 70%的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开展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促进养老保险的需求十分重要。通过购买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个人当期税收支出减少，只需要在未来领取养老金时缴税。这有助于刺激个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对保险行业而言，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拓宽了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能够带动保费的快速增长，带来可观的长期资金增量，弥补商业养老险这一短板。对政府而言，由于个人所得税在当前政府税收中的占比并不高，税收的暂时减少不会对财政体系造成过大压力。

6.6.1 税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尽管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但其发展过程十分漫长而坎坷。早在 2007 年，天津滨海新区就开始了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试点。但在 2008 年，国税局对试点中“30%税前列支”的个人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异议，涉及个税优惠部分的试点工作因此被叫停。2009 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保监会同上海市一起研究了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2012 年，上海市政府将论证方案递交财政部。之后，国务院等部门相继提出有关优惠政策建议，但由于没有就相关政策和技术问题细节形成统一认识，始终没有得到落实。2017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提出，在 2017 年年底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当前，各大保险公司正在发力，设计和准备推行以万能险和分红险为主的税延型养老保险产品。

6.6.2 税延型养老保险对提升居民退休准备的作用

按照现在最为通用的“EET”型征税模式，个人在购买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时，缴纳的保费从个人的税前收入中扣除，在领取保险金时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和个税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忽略其他因素，以扣除完五险一金后收入为 5000 元的人为例，如果按照 3500 元起征点，3%的边际税率和 10%的投资年收益率计算。如果不购买保险，个人当期应纳个人所得税为 45 元。如果缴纳 1000 元购买税延型养老保险，应纳个人所得税 15 元。5 年后保单累积 610.51 元的投资收益。如果个人收

入和税收征缴水平保持不变，则需为领取保险金缴纳 48.32 元个税，实际得到保险金 1562.19 元。如果购买 1000 元的普通商业保险，投保人当期应纳个人所得税 45 元。5 年后投保人实际可得 1610.51 元收入。由于个人所处生命阶段发生变化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预期，被保险人在领取保险金时收入通常不高于工作时的收入，且个税起征点相比于购买保险时也会有所上升，因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通常会较低。考虑到时间价值，购买同样金额的税延型保险会比购买普通商业保险产生更大的效用。

税延型养老保险可以有效地降低投保人当期应纳个税，这能够刺激个人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张岩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影响因素分析》调查显示，50%以上的受访者愿意参保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并且年龄越大的人群参保意愿越强烈，20 至 35 岁人群愿意参保比例达 17.24%，36 至 50 岁人群愿意参保的比例达 46.3%。调查结果还显示个人参保意愿与工作单位性质关系不大。刘美洁的《我国递延型养老保险税收政策探讨》预测认为，如果在 EET 模式下，企业年金在 5%以内列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可以税前扣除，个人的企业年金制度中企业缴费全额免税，个人缴费于 4%以内实施税前扣除，在此税收优惠限额下，企业年金的养老替代率为 6.01%，上海市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替代率的预测值为 5.68%。税延型养老保险有助于提升居民的退休准备。但是要提高税延型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水平，还需要提高税收优惠率。

7 建议

7.1 居民自身应做出的努力

- 在退休预期方面，居民应更加重视未来的养老责任，更加理性地分析自身和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收入、健康、子女教育等，及时为退休生活做好有针对性的准备。另外，在选择创业、去国外生活等不确定性较强的生活方式时，也应当对未来可能遇到的情况进行预判，对可能的负面情况做好防范。
- 在退休准备方面，居民应当理性对经济发展形势进行预期，避免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合理地进行退休准备以抵御潜在的家庭经济风险，通过提高个人退休生活的责任意识、培养良好的储蓄习惯、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与理财产品等方式，来改善自身退休准备情况，避免在退休后面临收不抵支或无法抵御经济风险的处境。
- 在退休规划方面，个人应当更为主动地认识到自身在承担退休后经济保障的责任，并且改变传统上过于薄弱的财务规划方式，通过采取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来充分消化风险并进行合理投资。此外，个人也应当根据工作方式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调整自身的养老观念，更多地接纳商业医疗、护理保险。在进行退休规划时应当尽早考虑购买人寿保险，选择合适的寿险产品。

7.2 政府可做出的改善

- 在退休预期方面，政府应稳定经济增长，引导居民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困难，帮助居民理性做出退休规划。同时，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推进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养老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居民实现享受型退休愿景做好准备。
- 在退休准备方面，现阶段，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政策引导，调整养老金、年金相关税收与导向政策，引导居民利用金融工具做好退休规划，为老龄化社会提供政策保障。应当完善职工养老保

险体系的“三大支柱”，在稳健发展基本养老保险的同时，提高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作为第二支柱的保障作用，增加民营企业在企业年金方面的计划制定和监管。

- 在养老产品的发展方面，政府应当重视商业保险的保障作用。商业养老保险是对社会保险的有效补充，能够在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的基础上提升养老保险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满足不同人群的养老和医疗保障的需求。针对商业养老年金保险，政府可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教育的力度，帮助消费者认识到长寿风险的严重性，推动递延纳税政策的施行，使得年金保险产品更具吸引力。
-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现存的各类定义在护理服务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异。其次，对于护理等级、护理机构的界定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这些因素势必会造成护理保险赔偿范围、赔付额度等指标的模糊。由于缺乏行业标准的护理法的指导，不同保险公司难以就相同问题做出相近的评判，这将对长期护理行业和长期护理保险行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护理人员、护理机构的缺乏与民众对于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认识不足也影响到长期护理保险面向市场推广。针对长期护理保险，政府应该意识到阻碍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主要现实问题，调整人才培养和医疗投资的引导方向，培养专业护理人员，建立专业护理机构，实现护理的深度覆盖。另外，政府可以推动民间护理机构与社区服务的结合，满足轻度护理需求，提升护理服务的覆盖广度。此外，政府还应当完善护理行业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引导护理等级、长期护理保险赔偿范围、额度与方式等行业规范的建立，推动护理行业和护理保险的发展。

7.3 雇主可做出的改善

- 在退休准备方面，雇主应当提高对雇员的责任意识，在参加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同时，努力建立雇主与员工共同缴费的企业年金制度，尤其是民营企业，应当为员工建立合适的福利制度，改善员工与其他就业单位之间的退休准备差距。
- 提高人身保险、职业养老金等员工福利的覆盖率和多样性，满足员工个性化养老需求。

7.4 金融机构在产品与服务方面可做出的改善

目前市场化的金融产品在居民退休生活中的重要性还不够高。一方面，这与居民的认知有关；另一方面，这也和金融机构宣传力度不足、产品未充分契合居民需求和市场环境有关。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金融机构应当充分利用信息优势推广宣传，同时寻求接入医疗机构或社保系统的数据资源，针对不同人群灵活设计或匹配对应的金融产品，推出不同的增值保障服务，促进居民主动咨询购买金融产品。

例如针对 40 岁以下青年人应加强营销，尤其是具有多重保障和保费调节功能的寿险产品；在企业难以提供帮助时，保险公司可以以咨询服务和产品提供商的角色介入其中，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退休收入规划，促进保险产品的销售。

表 7.1 受访者对金融产品的偏好

产品类型	偏好特点
养老金融产品	·满足疾病保障和年金需求 ·提供长期护理保险服务

	·提供医疗保险、医院绿色通道等增值服务 ·能产生退休收入，万一有急用，也能从投资中提取一整笔款项
中国企业年金	·利用年薪的固定比例作为养老年金 ·退休时分段领取固定收入（例如年金） ·70 岁以上的人群更愿意收取一次性付款并将其全部重新投入至延税投资工具中
长期护理保险	·低收入群体购买最大的障碍是保费负担 ·高收入群体购买最大的障碍是认为功能非必需

8 附录

8.1 统计分析方法说明

(1) 预期水平的定义

为了衡量受访者对中国经济的总体预期，我们引入了“预期水平”概念，并在多处使用了类似概念（如赞成水平等）。对于只有恶化、保持不变和好转三个选项的单选题，预期水平=选择“好转”的比例-选择“恶化”的比例。

我们认为受访者对中国经济的总体信心是由每一个受访者的信心加总平均得来，同时给恶化赋值为-1，保持不变赋值为0，好转赋值为1。如果每一个受访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将好转，那么社会的总体信心就达到最大值1。现假设选择恶化、保持不变和好转的比例分别为 x, y, z ，则很显然社会总体的信心值为 $x \times (-1) + y \times 0 + z \times 1 = z - x$ ，恰好就是我们前面定义的预期水平。因此我们定义的预期水平可以真实反映受访者总体预期。

(2) 多元排序选择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

传统的线性回归只适用于影响因素研究对象为连续变量的情况，而在本文中，影响因素研究对象多为离散变量，因而需要使用多元离散选择模型。而且由于离散变量的取值大小具有实际意义，因而使用了O-Probit多元排序选择模型来进行回归。

(3) 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方法

为了直观地描述居民的退休准备程度，同方全球人寿定义了退休准备指数。将退休准备方面三个态度层面的问题以及三个行动层面的问题作为自变量，将居民为今后退休采取的储蓄方式作为指数因变量，计算退休准备指数。首先将每个问题的选项由准备不充分到充分进行打分，分值分别为0、2.5、5、7.5、10，然后将自变量问题与因变量问题得分的相关系数作为权重对每个问题的平均得分进行加权，最终得到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根据中国区2000份问卷，我们计算六个问题的相应权重如下表所示：

表 8.1：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权重

变量	退休责任意识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退休计划完善度	退休储蓄充分度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权重	8.0%	17.9%	15.3%	23.3%	24.7%	10.9%

退休准备指数=退休责任意识×8.0%+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17.9%+财务问题理解能力×15.3%+退休计划完善度×23.3%+退休储蓄充分度×24.7%+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10.9%

需要注意的是，个人退休准备指数只需对这六个问题的具体分数进行加权，而城市退休准备指数则需先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数求平均值，再进行加权。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六个自变量问题依次平均得分为7.63、7.83、7.43、6.36、5.98、5.37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北京市退休准备指数等于：

$$7.63 \times 8.0\% + 7.83 \times 17.9\% + 7.43 \times 15.3\% + 6.36 \times 23.3\% + 5.98 \times 24.7\% + 5.37 \times 10.9\% = 6.69$$

退休准备指数结合了三个态度层面问题和三个行动层面问题的回答，适当调整加权后得到了一个衡量总体退休准备水平的指数，是对居民退休准备程度的合理估计。在所赋权重中，“退休计划

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问题，更偏向于衡量居民退休准备的实际行动。